



上海南京 保衛戰

李君山◎著



本書的中心思想就在於：軍事終
究是政治的延長，一場這麼大規模
的決戰絕不會只是單純爲「打」而
「打」，其中必然鎖定了某些終極
的政治目標……。所以想要對這場
戰役做所謂「全方位」的探討，就
不能只著眼戰術、戰略的作爲，而
忽視了「政略」的運用。

——本書作者

軍事叢書 87

上海南京保衛戰



李君山著

軍事叢書 87

上海南京保衛戰

作 者 李君山
發行人 蘇拾平
出版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396-5698 傳真：357-0954
郵撥：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F,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369 號
初版一刷 1997 年 9 月 15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08-519-9

售價：290元

Printed in Taiwan

628.52
844622

目錄

自序	7
前言	13
第一章 和戰關頭	21
第二章 山雨欲來	37
第三章 戰幕初啓	61
第四章 決戰高潮	83

83 61 37 21 13 7

國家圖書館



001625420

1008141465

第五章 八百壯士

107

第六章 九國公約

127

第七章 「國防線」上

149

第八章 乾綱獨斷

175

第九章 德使調停

197

第十章 南京爭奪

219

第十一章 死亡撤退

239

第十二章 誘敵東來

259

第十三章 此役何價

277

【附錄一】 「京滬地區作戰」參戰部隊一覽表

293

【附錄二】 參考書目

299

表目錄

表一	上海開戰前國府所接獲的日軍動態報告	56
表二	滬戰各期參戰部隊派系分布表	88
表三	抗戰開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時「中央軍」各師番號與控制狀況	90
表四	民國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三期「整編師」番號與參戰狀況	93
表五	「南京保衛戰」國軍兵力一覽表	225
表六	東戰場日軍兵力動向表	279
表七	江南各地內遷工廠分布表	284

地圖目錄

- 圖一 南口決戰要圖（民26·8·12 } 9·24）
- 圖二 開戰前的上海特別市（民26）
- 圖三 淞滬會戰戰鬥前狀況要圖（民26·8·13）
- 圖四 匯山碼頭攻勢（民26·8·19 } 22）
- 圖五 反登陸及羅店之戰（民26·8·23 } 9月底）
- 圖六 國軍蘆藻濱反攻及市區撤退（民26·10·1 } 27）
- 圖七 日軍登陸金山衛及國軍撤退（民26·11·5 } 8）
- 圖八 「國防線」作戰要圖
- 圖九 南京周邊要圖
- 圖十 南京城防要圖
- 229 188 161 153 115 96 73 65 42 28

自序

《史記·孝文本紀》裏頭有段耐人尋味的記載，說漢文帝剛被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迎立的時
候，車駕到了渭橋，周勃就迫不及待地想談條件、開暗盤，「願請閒言」。結果文帝身邊的智囊，
中尉宋昌馬上讓他碰了根軟釘子：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在歷史系裏讀久了書，總有些許無奈。因為學界裏的規矩，就是「王者不受私」，不容許文
章中間有所「言私」，於是正文已經寫得夠厚了，卻還得再添個〈自序〉，才能把若干「閒言」
收容進來，不然有些話就沒個去處了。

如果把這個題目比喻為公寓，算算自己也在這裏住了十幾年了。最早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是
在台南一中唸書的事。民國七十一、二年，那時整個社會，容許批評的東西是不太多的，身為一
員「軍事迷」，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個犯禁的題目，竟然和班裏的公民老師，易世宗先生，在操場
的沙地上討論了起來。易老師很開通，教我以後有機會，再拿它當碩士論文。不過我想，那時大

概沒人當真罷！

隨著自己上大學、唸歷史系，對於這個題目的關心，也開始聚焦。本來中學時代，自己所問的，只是「這場仗值不值得？」等到浸淫久了，能夠鳥瞰到的視野越來越廣，才慢慢體會，其實戰爭所在的那個社會，以及那個社會所培養出來的軍隊，是更值得了解的。同時拜資料開放之賜，可以閱讀到更多親身經歷者的回憶，戰場殘酷的感受與「人謀不臧」的慘害，就成了本書最後定稿時的重點。

記得是黃仁宇先生說的罷！八年艱苦抗戰，其中「艱苦」，實在有許多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寫作本書時，感觸最深的，就是當時基層士兵所受到的待遇，以及隨時會被遺棄的命運。因為八年抗戰在本質上，是驅使著一個「前近代」的社會，去迎接「現代化」的戰爭，其間落差，再經過戰場壓力與生活匱乏的擠迫，往往就變成殘酷的根源。

例如士兵們教育程度太低，訓練本有困難，而國家平日所能提供、助其成長的資源又少，結果一旦遭遇日軍現代化裝備的碾擊，多數就以「砲灰」的姿態，在歷史上一閃而過，成了眾多「無名英雄」中的一員。曾經在緬甸戰場作戰的黃仁宇先生還記錄了一則故事，說史迪威(Stilwell, J. M.)有次大發雷霆，因為辦事的人把所有陣亡者全部埋在一個坑裏，上面立塊「無名英雄墓」的木碑，就算了事了。史迪威要他們把屍首再挖出來，一個個分別埋好，把名字寫清楚。

當社會中的人們，還習慣於「前近代」的做事方法，卻要去面對「現代化」的戰爭時，確實是很殘酷的。

本書完成是在五年前，五年以來，內外環境有了許多改變。最明顯的，像「抗戰」這樣的歷史，就由「民族主義」的象徵，變成了「統派」的象徵。而最近三年，在南部教工專學生「現代史」課程，也感受到研究現代史，是越來越寂寞了。看到學生們漠然與茫然的表情，常會回想起自己在和他們同一年紀時，與易老師討論的情景。我想，整個社會關懷的重點，是真的改變了。在「閒言」說完之前，還是要先感謝一些人。啓蒙我的易老師，自然不在話下；研究所的指導教授李守孔老師，也是必須致上敬意的。由於他的開通，允許我「胡作非爲」，不用死抱所謂「史學規則」，本書才得以順利誕生。當然，書中所有文責，都應由作者自行負擔。

另外，還要感謝我的父母。會對現代史有一份感情，主要就因爲那是他們生活過的歲月；而且讓兩個兒子都去唸「不生利」的歷史系，他們的開通，也是難得的。最後，「麥田」願意出版這麼一本不成熟的作品，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做爲一張介紹作者的名片，這本書其實是讓自己常懷愧怍的。

錢鍾書先生曾經嘲笑，說書裏的致謝詞，好像魔術師手裏的飛刀一般，要來要去，總是在自己手裏，沒有真正送出去過。可是舞文弄墨的人，真正送得出手的物事，實在是不太多。我想，誠意是最重要的罷！

容我掉最後一個書包。張大春先生在《公寓導遊》結集出版時，曾以「我已經試著離開『公寓導遊』」壯語作結。我想，在這個題目裏住了十幾年，也該是試著離開這間公寓的時候了。

上海南京保衛戰

前言

開場白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經過了血腥而艱苦的九十天抵抗，淞滬地區的國軍開始全面向南撤退。由於情勢緊急加上準備倉促，幾十萬的軍隊和難民僥倖在一條公路上，洶湧澎湃地向西奔流。

第二天夜裏，重砲第十團團長彭孟緝拖著德製十五釐米砲退到了一座公路橋上，沒想到國軍自己的工兵竟然已先在橋頭埋下了地雷，弄得砲隊都過不了橋。這個團是當時中國唯一德式裝備的摩托化重砲團，所以彭孟緝聽說到砲隊無法通過時，急得哭了起來，說：「中國就只這個像樣的砲團，怎麼辦呀！」沒人想得出飛渡的辦法，最後只好忍痛把大砲統統推進河裏去。可是當徒手心的砲兵小心翼翼走過橋上時，還是被炸死了不少。

類似的場景一遍遍上演著。桂軍一七〇師的連長藍中民，十日清晨退到了瀏河橋上，看到中

央軍的工兵正準備了幾十桶煤油，打算時間一到，立刻放火燒橋。由於大半部隊都還沒有通過，藍中民和這些工兵起了衝突，最後只好率部擁槍，發起衝鋒。人雖衝過了橋，可是馬匹、輜重和行李，過不了河的都丟了。

另一邊，中央軍第九師的砲兵見習官金柏源，也跟著大軍擠在一條路上向後撤。部隊起初爲了防空，騾馬都留在後方，等到現在兵敗如山倒，道爲之塞，拆卸下來的砲件就只好靠人來抬，著實是步步維艱。他們看到師長李延年換了長衫、扮成了老百姓，超越他們揚長而去，也看見許多走不掉的傷兵躺在路邊，向他們哀求：「做做好事呵，補我一槍！」溪塘裏到處漂著被水浸泡多日，已經腫脹的屍體。這一切都讓金柏源想起王粲的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近代第一劇戰

在抗戰初期「京滬作戰」的全過程中，這趟混亂的撤退，只是最受爭議的主題之一。這場以上海和南京爲主要舞台的鏖戰，無疑是抗戰期間、乃至近代以來，中國政府投入兵力最大、傷亡最重的一次。在投入的兵力方面，國軍四個月間先後調集了七十二個師、十個獨立旅、稅警總團、教導總隊，以及若干砲、工、憲兵、保安團隊，人數在七十五萬以上^①。另外對手日本也投入了九個師團、兩個支隊，和原駐上海的陸戰隊四千人，兵力也在二十五萬以上^②。雙方合計，就已經是百萬大軍的對決了。

再從傷亡上看，單淞滬戰場，軍事史家劉馥(F. F. Liu)就估計華軍犧牲了二十七萬人，這還不包括後續的「國防線」作戰、以及「南京保衛戰」的損失。特別是在戰事結束以後，日軍又在南京城裏屠殺了幾萬名已經放下武器的華軍戰俘。另外日本官方則宣稱，他們在上海損失了九一一五人，重傷了三一二五七名官兵^⑤。

正因爲雙方動員及傷亡的數字都如此突出，所以事後隨之而來的爭議也特別地多。尤其是那用鮮血鋪出來的淞滬戰場，雙方上百萬部眾所爭奪的，竟然只是一條南北長約四十公里的戰線。中國軍隊在那幾個月，可以說是排著古希臘軍的方陣(Phalanx)隊形來接受二十世紀砲火的洗禮。這樣密集的犧牲，使得國軍精銳大半都在這裏消耗掉了。就長期抗戰的角度來看，自然不免引人疵議：國府在一個可能持續數年的戰事之初，就把做爲國家基礎的中央軍，毫不保留地投入這麼不理想的戰場，讓它遭受如此慘重的損失，是值得的嗎？

得失問題的爭議

這項得失問題，從戰時到戰後，一直都是引起爭論的公案。過去的「日本通」龔德柏曾經在文章中表達不滿：香港《新聞天地》的卜少夫也和戰時擔任「前敵總指揮」的陳誠辯論過：連戰役最主要的決策者與直接指揮官蔣委員長，都在講演中爲自己辯護。而正由於層峰抱持肯定的態度，所以戰役結束六十年來，更有許多學者、將領發表文字、創作新說，來爲這場犧牲背書作證。

但是作者認為，這些背書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從事論述者，往往都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人員，所以在探證上既多人云亦云，在解釋上也是盲點叢出。尤其軍方單位所撰寫的戰史，常常又負有「宣揚國威」的任務，所能發揮的空間自然更加有限。

二、由於官書是採取正面的評價，於是許多「後見之明」就陸續被加工出來，用以合理化當初的決策。結果在戰役的解釋上，造成了「歷史層累」的現象。許多價值被追加、附會到原有的事實上面，有如滾動的雪球，反使真相模糊不明。

三、由於舊說多半只從單純的「戰史」層面來著墨，未能進一步解釋國府的「政略」到底何在。於是「為何而戰？」就沒有得到全面的解釋，甚至發生偏差。完全忽略了當初對日政策中「抵抗」與「交涉」並行的本質，而將作戰原因單純化。

因此本書的中心思想就在於：軍事終究是政治的延長，一場這麼大規模的決戰絕不會只是單純為「打」而「打」，其中必然鎖定了某些終極的政治目標。尤其抗戰初起、「和平未到絕望」的時期，國府作戰行動的背後，往往不是「軍事之戰」，而是「政治之戰」。所以想要對這場戰役做所謂「全方位」的探討，就不能只著眼戰術、戰略的作為，而忽視了「政略」的運用。

「軍隊社會學」

除了對於「政略」的重視之外，作者在書中的另一構想，是希望能在「軍事史」的研究中，尋找特殊的「軍隊社會學」視野。蓋「軍事史」在台灣學界的地位，正如軍事史家劉鳳翰所說，是一門「冷僻學科」。然而這種研究者「寥若晨星」的現象，並不表示這個範疇沒有任何空間可供發揮。相反的，這門學科正亟待著我們去拓展領域。

一般人談到「軍事史」，多以為它所涵蓋的，不外「軍史」與「戰史」兩種。事實上，一場戰役的展開與成敗，所關係到的變數與課題，何止千百，絕非只是戰術、戰略上的進退趨避而已。這些變數之中尤其不可忽視的是，雙方軍隊與其所處社會之間的運作關係。這種關係包含了後勤、補給、徵兵、動員等各個面向，無一不影響到戰場的最後勝負，也無一不值得學者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比起單純戰略、戰術的得失檢討，甚且更能說明爭戰之所以勝敗的深層因素。

其次，由於「兵以戰為主」，所以軍隊內部往往自成一套迥異於外界社會的行為規範。從官兵之間的互動關係，到士兵彼此的相處之道，從儀式符號的制定執行，到口令動作的簡潔要求，在在都是小型社會的體現，也都是值得我們鑽研的課題。軍隊內部的緊張關係：包括下級對上級作戰決心的信任、同僚之間利害衝突的考量、軍紀軍法貫徹的程度，乃至官僚體系自保的慣性，一旦在戰場上發酵出來，都足以左右戰事的結果。

所以筆者認為，所謂「軍事史」的範疇與視野實在有加以擴大的必要，不該只是以軍事行動的進行來劃地自限，而應積極地以「軍隊與外在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軍隊做爲一個小型社會」的角度，來將一場戰役的過程與整個政治、社會的大背景作有機的連結。這樣的「軍事史」才有發展的縱深，也才會有成長的可能。這也是本書所希望努力的方向。

此役的評價

基本上，作者對於「京滬作戰」的評價是負面的，但也並非全盤否定。因爲在作戰的動機與構想上，此役確實有它微妙的地方。特別是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輿論，迫使國府有追求緒戰勝利的需要，而以上海做爲緒戰戰場，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固然這裏地勢平坦，臨江近海，日軍容易發揮海空軍優勢；但形勢單純、易於掌握；又經過國軍幾年的著意部署，後方擁有「國防陣地」的屏障；同時河渠交錯，可以遲滯日軍的進攻。更重要的，外人耳目集中，足以牽動國際視聽。就這些考量而言，上海作戰的發動，實在有其高明處，並非「意氣用事」一詞可以盡蔽。

可惜的是，國軍在上海作戰雖然英勇，但從「軍隊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畢竟距離現代化太遠。不僅軍隊內部種種計畫、訓練、裝備、後勤，都無法勝任擊破敵人的目標，其與整個社會之間的互動，也嫌不足。再加上身爲最高決策者的蔣委員長，過度狃於「政略」上的考慮，不顧國軍結構性的不足，頻頻加碼，企圖強渡關山，終使元良斲喪、精銳挫傷。而其中等待《九國公約》

會議結果，又爲軍機延誤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源，則實爲統帥自己誤信列強制裁日本的決心所致。因此滬戰的癥結，不在戰事的發動與戰場的選擇上，而在於對國際情勢的誤判與拘泥「政略」的過甚上。雖然「非戰之罪」，終究「人謀不臧」。這是不可不辨的一點。

至於南京的決意死守，則可說是蔣委員長乾綱獨斷的結果。蓋南京左環大江，右阻鍾山，全城如在釜中，守軍迎敵，勢必背水死戰。但殊死戰的成功，首先賴於官兵士氣如虹、視死如歸；其次須要訓練有素，能行小單位的獨立戰鬥。而國軍當時狀況，實在已經無法負荷這項使命。但委員長再次忽視部隊在結構上的弱點，試圖向不可能挑戰，以致八萬殘軍，逼城而守，內無準備，外無救援，前後苦撐八日，終告易手。最後還因撤退工作沒有妥善的規劃，演成混亂的悲劇。數萬將兵後退無路，或沒頂江中，或束手就縛，犧牲之可惜，視滬戰而有過之。

所以作者在本書中，將特別著重「決策」(decision-making)過程的探討，以說明此役的「原始動機」與「最初目標」。畢竟只有瞭解了「原始動機」之後，整個戰役的發動才能有真實的解釋；只有確定了「最初目標」何在，才能回頭去評估它的實際價值。相信這對整個京滬地區作戰「戰役史」的釐清，將會有所幫助。

註 釋

①關於華軍參戰部隊的番號、師數與人數，衆說紛云。以上數字係根據《附錄一》所列爲準。

② 日軍參戰的師團計有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一〇一（以上隸屬上海派遣軍，在京滬正面）；六、十八、一一四（以上隸屬第十軍，在金山衛登陸）等九個，外加第五師團分遣出來的國崎、以及原台灣守備隊的重藤等兩個支隊。

③ 淞滬戰役雙方的傷亡，迄今也沒有定數，各方估計出入甚大。蔣委員長曾在二十七年三月的講演中，提出十九萬人的犧牲數字。但劉馥則估計，四十五萬參戰華軍的傷亡率大約為百分之六十，也就是二十七萬，日方則損失了四萬人。孫元良的估計是：日方死傷五萬人，華軍則為十八萬。但親與斯役的曾振卻強調，十八萬的數字顯然過於低估。他認為應當有五十萬人的傷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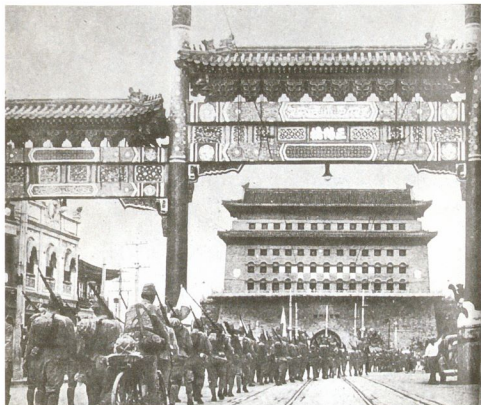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和戰關頭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中、日兩軍在盧溝橋頭發生衝突已經超過三個星期，中午，北大教授胡適應蔣委員長之邀，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人，共赴南京黃埔路官邸午宴。席間氣氛慷慨激昂，張伯苓更因南開燬於日機轟炸而老淚縱橫。蔣也打破七月中旬〈廬山談話〉時的曖昧態度，語氣堅定地宣言抗戰決心，強調國家「可以支持六個月」。一貫主張和平的胡適夾在其中不好說話，幾天之後寫了封長信，勸蔣「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之一是：

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戰的歧路

這段被胡適寫入日記裏的談話，或許就是「八一三」上海戰役最早的徵兆。裏頭值得我們玩



七月二十八日，日軍自正陽門進入北平。北平的易手，成爲中、日兩國開戰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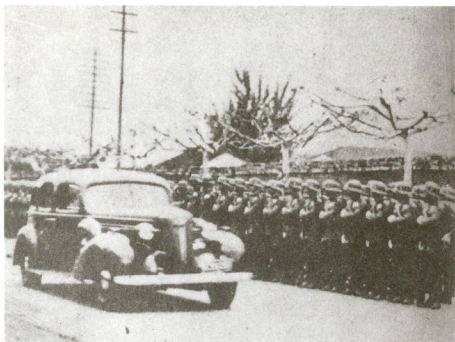


廬山談話會。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此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

味的：第一，早在七月底，蔣委員長就已決心抗戰；第二，在最初的規劃中，國府只估計需要支持六個月，而不會意會到，這將是八年長期戰爭的開端；第三，蔣委員長當時似乎已有腹案，要投注麾下「新式中央軍力」做乾坤一擲，所以胡適才會勸他「不可輕易毀壞」。

正和胡適矛盾的心情一樣，「七七」事變後，中、日雙方決策者都曾在和、戰的歧路上徬徨過一段時間。國府作戰的決心下得相當遲。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時，基調仍是希望和平、「應戰而不求戰」的。但隨著華北情勢的步步惡化，七月二十六日，中、日兩軍在北平近郊的廊坊發生衝突。接著二十八日，由於主政河北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誤信和平」，北平在出人意料的情況下提早失守，局面就此急轉直下。因為北平的放棄，象徵的是「九一八」事變六年以後，中國方面再一次不戰而失名城，民情輿論都已沸騰到非戰不能解決問題的地步。所以蔣委員長才會在北平易手的三天後，對胡適等人做出抗戰到底的宣示。

就蔣當時的考慮來看，舉全軍做乾坤一擲，實在是政治上不得不然的選擇。因為北伐完成以後，「中國統一，而國民黨不統一」的局面，曾使南京政府長期深陷黨爭、內戰的泥淖，威信大受打擊。再加上「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對日和戰的問題上，南京始終是採取「抵抗」與「交涉」並行的「戰略性模糊」策略，更使民衆對國府抗戰的誠意產生嚴重的懷疑。所以胡適在會見蔣委員長的那天，寫信給駐俄大使蔣廷黻，強調中國無法像蘇聯一樣「避戰」，因為「只有強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中國沒有這個條件。



「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戰前蔣委員長巡視「中央軍校」。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由於他「誤信和平」，致使北平意外失守。

追求緒戰的勝利

就因為在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上，不夠強固到足以「避戰」，所以一戰以明志，就成為國府穩定民心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由於平津的不戰而陷，輿論初時對南京中央並不諒解。蔣委員長在八月一日中央軍校的講演中，就曾經自問自答地說：

此次平津戰爭，外邊一般民衆，不免懷疑到中央空軍和陸軍爲什麼不增加上去？

同時上海方面「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也在請纓電報裏要求：

職見一般對空軍似有微詞，如能於此役發揮我空軍極大威力，則可稍一振中外人士之觀聽，幸甚，禱甚。

都說明了外界當時對於國軍的質疑，以及國府追求勝利的需要。

所以七月底以後，國府內部越來越傾向於緒戰時，就給予敵人迎頭痛擊。八月六日軍政部長何應欽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會談時，閻錫山就認爲：現在日軍甚爲驕傲，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香月清司竟然揚言，中國軍隊再多的師，都等於一個師，因爲華軍師長以上的，都不知有國家，只知有個人。因此閻主張在戰術上，最好趁敵傲慢之時，能夠在第一次會戰上求得勝利，以正世

力主「爭取緒戰勝利」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



揚言「中國軍隊再多的師，都等於一個師」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香月清司。



界觀聽。然後再把軍隊疏散，實行持久戰。蔣委員長自己後來回顧時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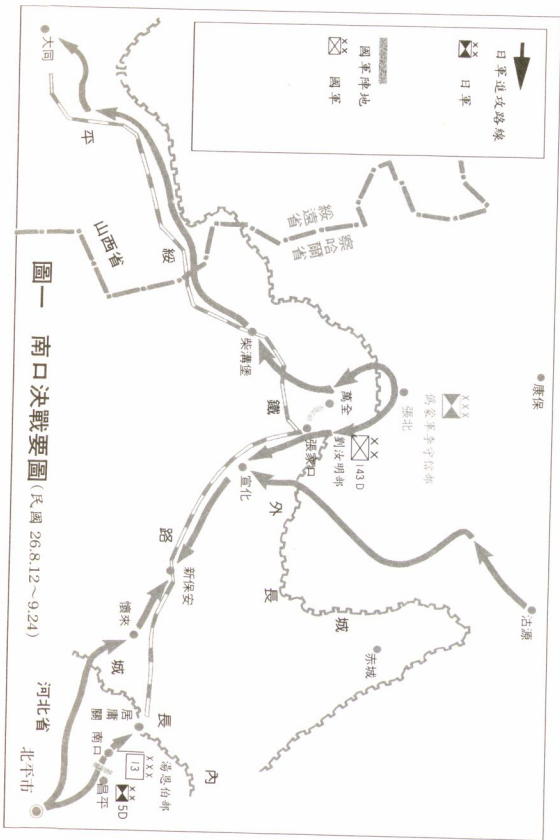
大家試回想在未開戰以前，敵人氣勢驕橫到什麼樣子？那時在他們心目中，簡直以為不要三個月，就可以消滅中國全部的軍隊。他萬不料在淞滬激戰竟至三個月之久，使他使用了現役兵力至十二個師團之多，還要想盡各種方法，始得在金山衛偷渡登陸，從側背威脅我軍，那時我軍才作戰略上的退卻。這三個月的緒戰，他已受了意想不到的傷亡，無異先給他當頭一棒。

南口決戰的構想

既然想給日軍當頭一棒，戰場的選擇就必須慎重。國府最初基於軍事上「不擴大」的考量，重點是放在華北的平、津，目標則鎖定察哈爾的南口。對於華中，因為顧慮軍隊集結的不易，以及資源、港口暢通的必要，而抱持不輕啓戰端的態度。

八月十八日，蔣委員長在評論「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時強調，南口決戰的構想在於：第一，維持中蘇連絡，以待時變：

現在倭寇佔據平津，他這個戰略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攫取平津作根據地，俾其主力於長城



圖一 南口決戰要圖 (民國 26.8.12~9.24)

一帶，來對付其另一強敵的蘇俄。……因為我們已有抗戰準備，他對俄的主力、作戰的正面，就不得不移到平津以南，對蘇俄西伯利亞的主戰場，不得不分散實力，甚至要完全放棄，但亦決不能一刻放棄，這是他戰略的失敗！……

第二，牽制平津日軍，不使南下：

再次，在戰術方面，他現調運大批陸空軍隊，分布平津一帶，想用速戰速決方式，一直南下，攻佔冀南，來統一河北，……但是自從我十三軍（湯恩伯部）及其他多數部隊，到達南口，集結實力，堅築工事以後，倭寇就不敢南下，就屯兵危城，不得速戰……。

兩天後，國府大本營頒布了《大本營訓令·令字第三號》，判斷日軍動向在攻取南口。所以在下達給南口正面「第二（晉察綏）戰區」的《作戰指導計畫》裏，就嚴令戰區「要固守南口」：

本戰區為華北唯一之屏障，務須永久固守，以為國軍爾後進出之軸心。

平綏路為第二戰區之生命線，亦中蘇連絡之生命線，更為我國軍旋迴作戰之能實施與否之中樞線。應以南口附近為旋迴之軸，以萬全、張北、康保等地方為外翼。要固守南口、萬全，國軍作戰方有生機；要攻略張北、赤城、沽源，國軍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線始終為國軍保有，則平津方面之敵決不敢冒險南下。……



由於察省作戰不利，省主席劉汝明曾備受指責。這是戰前演習中的二十九軍，圖中可見每人背上均攜有大刀，是聞名當時的「大刀隊」。

目光南移

但是南口戰局的發展，並未如預料般順利。由於開府察省的劉汝明想保存實力，揚言中央軍不來，日軍就不會進攻，拒絕湯恩伯部隊入察。而劉本身又沒有準備，以致南口後方的張家口被日軍迅速佔領，平綏鐵路遭到切斷。結果八月二十七日，國軍在二十天的抵抗之後，放棄了南口陣地^①。

南口的失敗，暴露了國府在華北作戰的各項困難：第一，華北在戰前的準備並不充分。蔣委員長曾經在講演中，對著中央軍校的學生們提到，當時平津一帶，「不僅地方政府平時毫無防空設備，就是中央要去訓練空軍，按地設防，也感受許許多的困難」。

不但沒有堅固適用的飛機場，中央空軍要想北上作戰，連加油、補給都成問題。

第二，華北形勢複雜，不是南京所能完全掌控。各省軍閥的割據已經根深蒂固，中央的軍事部署常受掣肘。蔣曾以平津戰役為例：

說到陸軍增援，我們在盧（溝橋）案發生的當時，就派了二十六路（孫連仲部）等各部隊北上。這些部隊到達河北以後，我們北方一般負責將領，以為此事還有和解希望，不僅不願中央軍隊前進，而且希望後退。等到敵人通牒進攻，我們在保定的部隊要想運輸到平津前線，至少亦需三天。但不到兩天，平津又告陷落，救援亦來不及……。

當時由於宋哲元「誤信和平」，又有保持地盤的想法，不願中央援軍進入河北，終致錯失軍機，平津淪陷。現在連部署良久的南口決戰也礙於當地軍人的不肯合作，而歸於失敗。這就使得國府不能不正視這些困難，而把注意力轉向華中，落在已經開戰半個月的上海戰場。

決定在上海作戰

相對於華北，在華中決戰，不論位置或地形上，對國府都較為有利。上海開戰前夕，南京軍事委員會管理部部长姚琮就上過條陳，主張「宜于淞滬一帶決戰，而以平津為副」：



民國二十一年的「一二八」之役，使上海成為抗戰的「聖地」。這是當時的憲兵第六團。

其利有五：指揮利便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補給較便三也；江南多港灣不利于敵四也；易動列強觀感，而得多助五也。

京滬一帶，是國府畿輔所在、政權統治的核心地區。在這裏作戰，指揮上距離既近，又不會受到干擾；加上交通發達，部隊運送便利；江南又是財賦所出，補給也不成問題。同時五年前「一二八」鏖戰的經驗，更證明了江淮地區交錯的河渠，正是阻擋日軍機械化部隊最好的障礙。蔣委員長當時就曾電告在上海作戰的張治中說：

滬上地形複雜，敵方或將捨正面之攻擊，而向我側背著眼。我陣地附近河流縱橫，到處便於扼守，日軍若取攻勢，其犧牲非有一與十之比，決難奏效……。

此外，「一二八」抵抗的成功，已使上海變成國

人心目中抗戰的「聖地」，所象徵的意義，張治中在催促中央開戰的電報裏有言：

若迎戰不能一舉破敵，又不能持久支持，則使國人回憶「一二八」之役，薄現在中央軍之無能矣。

所以在這裏發動緒戰，不僅具有戰略上的條件，還能符合政略上「供國內消費」(domestic consumption)的功能。這些無疑都是選擇戰場時重要的考慮。

聳動國際視聽

然而除了「供國內消費」的考量之外，上海還有另一項其他戰場所無法比擬、「供國外消費」的背景，那就是它的國際地位。上海是通商巨埠，各國僑商雲集，要「正世界觀聽」、要「動列強觀感」，捨此之外別無更佳的地點。

蓋當時中國的國際處境極為困難，各國面對日本的凶悍霸道，都敬而遠之，不願開罪。而對於中國，又多抱持漠視的態度，以為這是個四流國家，必然承受不了日本的攻擊。當時擔任駐法大使的顧維鈞就描述了西方人的看法：

西方人士，不僅是普通民衆，甚至西方的首腦們，往往從一開始就認定，以中國這樣一個

政治上不團結，經濟、交通不發達，而軍事上又陷於組織渙散和裝備惡劣的國家，要抗擊像日本這樣一個現代化和武裝精良的強國，無論如何是沒有成功希望的。所以他們認為中國的抵抗無濟於事。他們覺得日本終究是要佔領中國的，那麼向中國提供援助又有何用？中國政局是如此之不利，以致西方所能提供的援助既不會滿足其需要，也不會那麼及時。

所以中國要想尋求西方更進一步的援助、甚至起來對付日本，就有必要先展示一下自己抗戰的決心與力量。至於展示的場地，自然要選在各國關係最深的地方，才能收到「聳動」的效果。上海正好能夠滿足這個要求。開戰之前，駐英大使郭泰祺曾經警告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說：上海是英國在華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國在這裏戰敗，日本將控制整個中國市場。因此中國作戰不只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英國。一旦華軍戰敗，遏止日本擴張的重擔必將落在英國肩上，香港和其他在遠東的英國領地也將受到威脅云云。據說艾登當時就聽得「頗爲動容」。

基於這項因素，顧維鈞等駐外使節都極力主張死守上海：

從我們身在國外的角度來看，中國抗戰的犧牲是很大的；毫無疑問，在上海前線許多精銳軍隊是要喪失的。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後撤到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個地方不爲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表示關心，但是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麼地方，戰鬥是爲了什麼。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的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將仔細閱讀報紙上的戰況報導，馬上會得出印象。所以我們主張政

府盡可能堅守上海一線。

正就因為上海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方，爲了讓西方人了解到中國「戰鬥是爲了什麼」，這片十里洋場終於變成了決戰的戰場。這種「供國外消費」的功能，蔣委員長曾在訓練總監唐生智等人面前一語道破：

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

註 釋

①關於劉汝明在南口戰役的責任問題，當時的國防參議員傅斯年曾給胡適一信，中有妙文：「晉綏局面皆壞於劉汝明，二十九軍也。劉乃一準漢奸，最初拒絕湯恩伯入察；後來湯守南口，彼在後方潰退，以致中央軍大吃虧。」

第二章 山雨欲來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盧溝橋事變的前兩天——下午，「上海警備司令部」的參謀劉勁持突然接到蔣委員長從南京拍來的急電：「時局外弛內張，注意發生事變，暗中加強防範，適時報告。」大家都很驚訝，立刻打電話到處問情況，並通知所屬戒備。這樣過沒兩天，盧溝橋果然就出事了。後來他們才知道，原來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已經探知，日本大秘密由上海去了天津，預料日本外交人員要和軍隊結合，在華北發動事變，害怕上海也出事情，所以才急電告知的。

戰前國府的部署

上海會再次爆發戰事，一直是國府預期中的事。自從民國二十一年的「一二八」事變以來，這裏就處在一種微妙的狀態下。由於當時所簽訂的《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規定：中國軍隊「留駐」在安亭、太倉以西，以致上海附近被「默認」為「非軍事區」，中國方面不駐軍、不設防^①。

但相對的，日本在租界裏的虹口、楊樹浦一帶，卻駐有陸戰隊三千人，陸軍也隨時可以登陸，雙方實力極不平衡。上海本身又是中國第一大港，每年對外貿易總額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其之得失，關係到國家經濟的興衰，自然是國軍所必守，日軍所必攻的地方。所以國府也不能不設法鑽《停戰協定》的漏洞，預先布置，以防日軍乘虛而入。

首先，在駐軍問題上，國民政府於簽約之後，就命令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成立保安部隊，歸南京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下轄兩團，總團長吉章簡。部隊雖名「保安」，實際操練的卻都是些街市巷戰的技術，以備保衛國土。

接著，在上海郊區，國府還積極籌畫京、滬防衛體系。民國二十二年，參謀本部開始派人在京、滬、杭地區偵察地形、研擬計畫。到了二十四年，由軍令部次長林蔚主持，完成了自河南北部到徐州、海州一帶，加上京滬杭地區，布置防禦陣地的計畫。

其中，京滬杭地區是由訓練總監唐生智負責，下分「南京」、「滬杭」及「京滬」三個分區。裏頭「京滬分區」係歸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辦理。張爲此，還特地在軍校裏頭設立了「高級教官班」，做爲實際指揮的機構，後來變成「京滬警備司令部」的前身。西安事變以後，蔣委員長決心抗戰，張更辭卸了軍校兼職，專任警備司令，全心籌畫防務。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的「上海停戰會議」，使上海成為「非軍事區」。



戰前負責起草《上海圍攻計劃》及修築「國防工事」的「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

張治中的工作

張治中所進行的工作，主要是修築「國防工事」及草擬《上海圍攻計畫》。「國防工事」的建設是由參謀本部負責，自民國二十三年起，分期撥付一百幾十萬元，由張治中麾下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等師，窮三年之力構工，一直到二十六年春天才大體完成。工事は假定日軍會在上海和杭州灣北岸登陸，分兩路西攻南京。所以選定蘇州到福山鎮之間修築「吳福線」、無錫到江陰之間修築「錫澄線」，還以嘉興為樞紐修築「乍嘉線」（乍浦—嘉善）。另外南京周邊也規畫了「外圍陣地」和「複廓陣地」，以拱衛首都。

工事的硬體部分，則是由參謀本部城塞組進行設計，還有德國顧問參預意見。整座工事都以鋼筋水泥構成，並盡量利用天然障礙。陣地裏頭設有各種槍砲的射擊掩體、觀測所，以及彈藥庫等等。構築方式則是先在預定位置，個別修建碉堡，加以掩蔽，戰時再由駐軍挖掘交通壕，進行連絡。

其次，《上海圍攻計畫》的草擬，由於戰前日本在中國各地擁有多數租界，隨時可以變成作戰的根據地，過去國府聘任的幾位外國顧問都曾建議，一旦開戰，應該先予掃蕩。但是因為日軍虹口的陸戰隊司令部，以及楊樹浦附近的幾個紗廠，工事都非常堅固，所以張治中起草《圍攻計畫》時，就偏重「先發制人」，準備以第八十七、八十八和三十六三師駐軍，協同空軍強襲，先

聲奪人，爭取緒戰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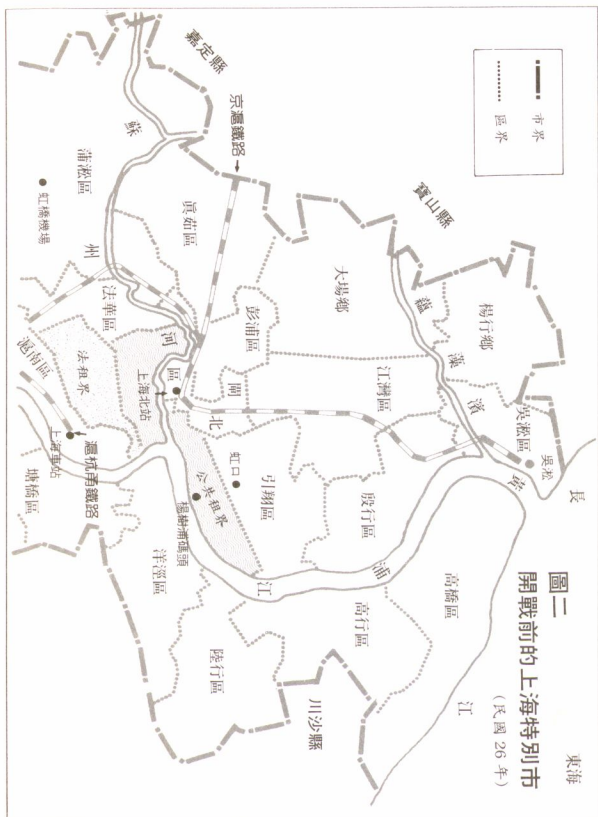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的危機

隨著國軍備戰的脚步，上海的氣氛也是一天緊似一天。這裏本來就是華洋雜處、是非糾葛之地，「一二八」以後，中、日兩國軍民相互仇殺，不啻火上加油。二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遭到狙殺，上海市面一度吃緊，接著過年後又陸續發生日僑萱生鎌作槍擊案、日本水兵遭襲案，日軍陸戰隊更是全數出動，在閘北一帶布哨搜查、進行演習，擺出戒嚴的姿態。

局勢緊繃至此，據說蔣委員長接到告變電報後，愁眉不展，低頭苦思，連飯都沒吃。第二天他電令軍政部長何應欽：

據昨今形勢，對方已具一逞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爲要。

張治中還一度奉命將三十六師、八十七師向「吳福線」推進，八十八師向「錫澄線」移動，一時戰機如箭在弦。不料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突然爆發，三十六師和八十八師都被調走，備戰的態勢才不得不緩下來。張治中雖然擔心「敵人乘我內部發生問題的時候，爆發淞滬方面的戰事」，但也莫可奈何了。



圖二
開戰前的上海特別市
(民國 26 年)

東海

這次危機雖然沒有演成實際衝突，但卻可視為「八一三」的一次預演。那年的十月四日，張治中曾經上書國府，說明自己的作戰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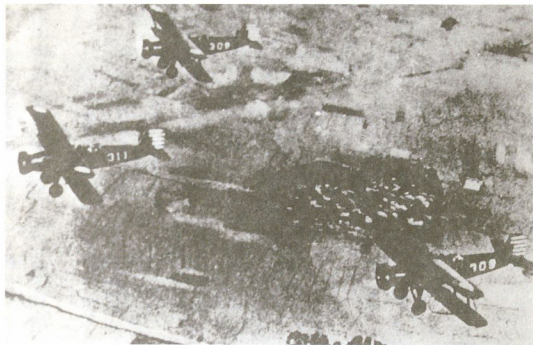
上海為我經濟重心，繫世界觀聽，我滬上武力僅保安一團，守土匪易。在事變之初，必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予以重創，至少亦須保持我與租界交通，取攻勢防禦。若自甘被動，雖占「蘇福線」或「錫澄線」，洵屬非宜；若迎戰不能一舉破敵，又不能持久支持，則使國人回憶「一二八」之役，薄現在中央軍之無能矣。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窺知他發動滬戰的最初想法：第一，上海是經濟重心，「繫世界觀聽」，必須要固守。第二，上海一帶守軍薄弱，「守土匪易」，必先發動預防戰爭，「取攻勢防禦」，才能禦敵。第三，戰事發動時，最好能「一舉破敵」，若求之不得，也要能「持久支持」，以符國人之望。

上海作戰的魅影，至此已經隱約若現了。

七七事變後的上海

盧溝橋的緊張，很快就傳染到這十里洋場上來了。一方面是日軍在撤退僑民、集結艦隊，積極進行演習；另一方面則是國府的保安總團在加緊訓練、嚴密戒備，甚至還從南京運來幾萬隻



戰前國軍飛行員常向日艦示威。這是當時的中國軍機。



上海戰前因情勢緊張，日本小學生放學都需軍警護送。

麻袋，開始構築工事。雙方官兵更是互不相讓，小動作頻頻。

當時保安總團的中隊長楊俊在防區裏看到兩個陌生人前來抄門牌，就出面詢問。對方不肯開口。因為日本人大脚趾大多叉開，衛兵就把他們的鞋子脫掉檢查，對方這時才承認是日軍的陸戰隊員。楊俊又從他們身上搜出日記本，裏頭記載著屋內有十多挺重機槍、兩百多名官兵，於是就把他們押起來，大伙你一拳、我一脚，飽打了一頓。事後日方提出了抗議，可是還沒等到事情解決，別處就又發生總團排哨把日本軍官捆在電燈桿上，打個半死的事件。日方自然又是抗議。

這同時，國軍的飛行員也常常故意在日本租界，或是軍艦上空，練習俯衝，向日軍示威。七月二十四日，日軍致函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說中國軍機飛越日本租界和兵營，作轟炸狀，要求制止。第二天張治中將這件事報告何應欽，何一面要他：「日人要求事項，我不可承認，尤不可有書面答覆，只可口頭答應，以『已轉航空機關』為覆。」敷衍他們；一面轉告航委會主任周至柔：「查上海為我經濟中樞，目前我空軍不可在滬挑釁，為要。」

小動作多了，楊虎怕出事，就和日本領事館約法三章，規定日軍官兵外出經過華界，必須先行通知，以便查照。但這樣到了七月二十四日，還是發生日本水兵失蹤事件。當天日軍突然宣稱，一名叫做宮崎貞雄的軍人在市區遭到挾持失蹤，要求市政府調查。日軍還出動部隊、坦克，四處設哨，搜查行人，有如戒嚴。一時謠言四起，情勢緊張。僵持了三天，二十七日宮崎忽然在鎮江被人從江裏救了起來。原來只是宮崎違反軍紀，外出「冶遊」，怕受處罰，所以當了逃兵。

這樣的虛驚，逼得國府也不能不開始布置若干預防措施。七月三十日，何應欽等軍事首長商

定應付上海日軍陸戰隊的計畫。八月四日，蔣委員長下令招商局，將船隻控置在長江裏頭，不要滯留上海。不過這時最讓人擔心的，還是虹橋機場。上海原有兩個機場，一在龍華，一在虹橋，前者民航，後者軍用。虹橋機場剛剛擴建過，把跑道拉長，以適應新式軍機的起降。現地卻只有一連保安隊把守，萬一日軍偷襲，就只有乾瞪眼的份了。

針對這問題，張治中一再反映，請派正規軍進去，冒充保安隊，以資增援。但何應欽卻不願再昇高上海的緊張局勢。張治中只好特地跑一趟南京，晉見蔣委員長，報告他的想法。委員長最後同意抽調一個團，乘夜進入兩機場，加強防務。事情敲定的這天晚上，何應欽和張治中一道從委員長那裏出來，何志忑不安地拍拍張的肩膀說：

文白（張治中，字文白），這是要鬧出事來的啊！

事情不幸而被言中。

虹橋事件

就在這樣風聲鶴唳的情況下，八月五日中午，正當一架飛機要在虹橋機場降落時，有日軍八人突然乘坐機車出現。場內衛兵誤以為敵人前來襲擊，慌慌張張拉起了警報。隨即卻見日兵轉彎離去，並無任何異樣，才知道是虛驚一場。事後大家都以為是個誤會，沒想到它竟會是四天後「虹



「虹橋事件」發生後，中、日雙方人員在機場大門勘查現場。



八月九日，日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橋機場前遭到射殺，成為「虹橋事件」。



「虹橋事件」發生後，上海局勢緊張，日方開始撤退僑民。

橋事件」的先兆。

長期鬱積的緊張終於在八月九日爆發開來。當天日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橋機場前被國軍開槍射殺，成爲「虹橋事件」。事件的經過，當時南京外交部收到的報告是說，大山硬闖機場，和場內衛兵互相開槍，因而致死：

今（九日）午五時，有日本陸戰隊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帶同水兵一名，乘一七〇五號，又特別照會五六號汽車馳至虹橋飛機場相近地方，被警察阻止，不服，又前進。方此時該處有保安隊令其停車，不服，致起衝突，互相開槍。結果保安隊死一人，大山中尉等亦均擊死。

但日後若干當事人的回憶卻慢慢透露出，問題其實還是出在張治中加派進去的那個團身上。

事發當天，大山勇夫帶著駕駛兵齋藤與藏，開了一輛軍車，打算闖進機場大門。這時守門的正是化裝成保安部隊的國軍士兵。或許是攔阻不住，或許是仇日心切，也或許是誤認敵人來襲，大伙群起一陣亂槍，把日本軍車打成蜂窩一般。事後還把大山的屍體拉出車外，剝去衣帽鞋襪，開膛破肚，弄得臟腑狼藉。守軍們本來還打算一埋了事，但被管區警察制止，才用電話通知了市長俞鴻鈞。

這時楊虎的警備司令部也得到了消息，參謀長董元亮就跟俞鴻鈞商量，把司令部裏一個死囚史景哲提了出來，讓他穿上保安隊制服，處決在出事地點上，就說是日本軍官要硬闖機場，先把衛兵打死的，好在交涉時留個立足的餘地。但那天夜裏日本軍醫前來相驗時，立刻發現屍體雖然

穿著軍服、打著綁腿，卻囚首垢面，頭髮、指甲都過長，綁腿也不像是軍人打的，中彈的方位也不對，識破他不是場內衛兵。雙方發生激辯，不歡而散。

到底大山硬闖機場，所為何來？至今還是個謎。因為出事之初，日本方面一時竟反應不過來。當俞鴻鈞向日本總領事館查詢時，他們都矢口否認有軍人進入華界，還勸俞鴻鈞「定係謠傳，請勿輕信」。直到楊虎的參謀打電話點明，有沒有「大山勇夫」這個人，日方才慌張起來，派人到警備司令部來了解，並說大山嗜酒，可能酒醉後私自外出云云。

由此看，則大山硬闖機場，似乎不是出於授意。然而也有我國學者主張，這「足證大山勇夫外出係執行機密任務」，只是「陸戰隊及總領事館均未明真相」而已。但如果負有「機密任務」，又哪裏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兩個人大刺刺地開了車硬闖呢？若是真的「意圖窺探」，就應該暗地打聽，不會蠻幹了。日本官書則記載說，大山是「視察中」在虹橋機場附近道路上，被中國保安隊所殺。同時辯稱，大山出事時，根本沒有攜帶槍械，何來「互相開槍」？換言之，就是連「硬闖機場」一事都不承認，而把事件簡化成中國「反日」、「仇日」的結果。但再說回來，如果是正式的「視察」，何以事先沒有知會華方？又何以日本人會久查不出？

儘管疑點這麼多，但至少未先知照、違約擅入華界，這一點仍該由日方負責就是了。

開戰前的交涉

虹橋事件之前，日方早已針對國府在上海構築工事，迭次提出抗議。事件發生，更是理直氣壯。出事的第二天，八月十日，雙方在市政府開會談判，重點還是保安隊問題。稍後達成協議：

- 一、請保安隊步哨暫撤若干距離，以免衝突。
- 二、日方表明態度，不願在上海有作戰行動。
- 三、俞市長提議此事由外交手段交涉解決，日方誠意接受。

外交部接到的報告說「經過情形尚未惡化」。同時俞鴻鈞也上電說：「現在雙方均嚴密戒備，惟目前尚無擴大情形。」

但只過了一天，十一日，或許是因為收到國內將要出兵的指示，日方態度轉趨強硬。下午四點，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向俞鴻鈞提出兩項要求：第一，撤退上海保安隊；第二，所有防禦工事概行撤除。並且威脅說：虹橋事件發生，穿著日本海軍服的軍官和水兵被華人慘殺，是「對皇軍重大侮辱」，以致「全國憤激」。俞也不甘示弱，表示日方要求之事，都已主動辦理。但當日方要求會勘撤退距離時，俞則斷然拒絕。雙方反覆辯論了三個小時，毫無交集。

十二日以後，國軍開進市區，對峙局面已成，但談判桌上的對話仍在進行。這天下午，基於

日方的要求，租界各國所組成的「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召開緊急大會，商討和平事宜。會中兩國又是針鋒相對，陷入僵局。

到了十三日下午，上海衝突已起，但在南京的日本參事日高信六郎，還是接受「共同委員會」的敦促，晉見了國府外交部長王寵惠，作最後談判。日高要求的重點，仍是撤退在上海的中國保安隊與正規軍。王寵惠則強調，當此民氣激昂之時，要中國單方面撤軍，決非民衆所能允許。最後會議在王保證「華方不會首先開槍」之後，無果而終。

這時，上海市長俞鴻鈞已經爲了日軍開火，向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日本政府也在緊急會議之後發表聲明，謂華方蹂躪《停戰協定》，以正規軍開入上海，當地情勢惡化，責任全在中國云云。直接交涉到此乃告停頓。

日本陸軍反對出兵

和一般印象相反的，當上海局勢日趨緊張之際，東京的日軍參謀本部卻還在爲要不要出兵而猶豫。原來日本雖然也視中國爲假想敵之一，但其陸軍是針對俄國、海軍是針對美國來籌畫戰備，對於中國則始終沒有認真安排過。甚至前一年六月，陸軍在制定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的《年度作戰計畫》時，還因面對蘇軍強大的壓力，無法考慮對華全面作戰，而做出「中國方面也正以全力加強統一，大概不敢冒險開戰」的大膽判斷，寄望於萬一發生衝突，可以用小規模的有

限戰爭來應付。

日本之所以這麼輕忽中國，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軍人還抱著侮華的主觀想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防俄」的客觀需要。

從「九一八」以來，日軍對華的作戰構想一直就停留在：國府做爲一個尙待統一的政權，其機能還無法發揮，軍閥割據、地方自治色彩濃厚，應該無力挑起全面戰爭。因此出兵的目標，只需限於維護日方權益與日僑安全。同時對於中國民衆作戰意志的提昇，又完全漠視，以爲必要時，派出個「偏師」，就足以逼和。所以整個對華作戰的計畫，既沒有像對俄計畫那樣嚴肅檢討過，也沒有應付全面戰爭的準備。陸相杉山元曾經向天皇報告，只要大兵壓境，短期內必可摧毀中國的抗日勢力。天皇當場反問：「果能如預料般成功嗎？」竟然陸相自己也不能明確回答。



是否出兵上海，曾在日軍內部發生爭議。圖爲當時力主侵華的日本陸相杉山元。

另外，客觀的「防俄」需要，也絆住了

日軍向大陸擴張的脚步。爲了保留兵力防備蘇聯，日軍被迫必須極力限制對華作戰的規模，務求在最小兵力下，盡速達成作戰目標。當時日本軍部判斷，遠東蘇軍的常備兵力是：狙擊師二十八個、騎兵師四個半、裝甲旅六個、飛機一五〇〇架；另有蒙古騎兵十個師。戰時更可增加到三十一至五十個師。

面對如此龐然的對手，曾經任職參謀本部的井本熊男回憶說：

對華兵力使用限度的約束，不用說，是來自對於蘇俄的考慮。當時的想法，對蘇兵力，加上預備隊，是二十三個師團，而總動員兵力是三十個師團。所以對華使用兵力只能有七個師團。因此並沒有向華北增兵的餘裕。若有個萬一時，是想就近從華北方面向東北轉用兵力，但也覺悟到，這樣的兵力轉用，幾乎是不可能的難事。

連增兵華北都已如此拮据，自然更談不上把兵力分散到華中、南了。這樣做不但會和英、美等國利害衝突，萬一對俄戰事爆發，兵力的轉用也將出現困難。所以對於上海地區，日本陸軍一直興趣缺缺，希望盡可能避免出兵。

但和陸軍相反，日本海軍一向是以長江流域權益和僑民的保護者自居，對於上海局勢寄予高度關切。這樣的歧異，使得兩軍之間始終爭執不休。當初在制訂《昭和十二年度對華作戰計畫》時，海軍就鑑於「二二八」的經驗，要求把「上海出兵」的項目列入，但遭到陸軍強烈反對。雙方僵持到最後，眼看趕不上奏呈天皇的期限了，陸軍才勉強加上「必要時得向上海出兵」的但書，作為敷衍。可是骨子裏仍然抱持推拖的態度。所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參謀本部擬訂《處理華北時局要領》時，還是規定：

如抗日實力行為波及華中、南時，亦以不出動陸軍兵力為原則。

意思就是要海軍單獨處理，陸軍不願介入。

這樣拖到「虹橋事件」爆發，海相米內光政在八月十日的閣議上，再次要求陸軍出兵，陸相杉山元雖然表示了解，但參謀本部的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以及陸軍次官梅津美次郎都堅決反對，強調陸軍只能集中華北，上海、青島方面應由海軍負責。最後經過協調，才決定在「保護僑民」的目標下，派遣最小限度兵力。他們不但沒有料到國府會集結重兵，對於上海附近軍事設施的情況也完全不清楚，一味以爲這只是「一二八」的翻版，而抱著一種不得已的心態，幻想在「不擴大」的原則下，派兩個師團前去「制壓」一下就行了。

國軍進駐上海

正當日軍內部爲了派兵與否僵持不下時，中國方面也在爲著同樣的問題猶豫不決。南口棄守之前，蔣委員長本來不願意上海輕啓戰端，所以事前一再訓令地方當局嚴加防範，避免不幸事件發生。這也就是楊虎的警備司令部會在七月五日收到示警電報的原因。

但是七月以來，上海前線日軍蠢動的報告就紛沓而至，內容從日軍增援、日艦集結、作戰計畫的擬定，到兵力的部署，林林總總（見表一）。同時上海市區又只有保安團隊，所呈現的半真空狀態也讓人不安。加上國府高層主張在這裏和日軍作戰的，不乏其人。其中尤以上海正面的指

表一 上海開戰前國府所接獲的日軍動態報告

日期	拍發者	摘 要	來源*
7.9	張治中	蕩茜口日艦二艘發砲五十餘，已下駛。	2：247
7.20	何應欽	日領館托工部局調查上海我軍防地員額。	2：248
7.24	俞鴻鈞	宮崎失蹤，日戰車在天通庵設哨搜查，似戒嚴，謠言多。	2：248
7.27	滬市府	日人擬破壞上海國際電臺。	4：5
7.28	歐陽格	日艦在南通青天礁逡巡。	4：6
7.30	張發奎	日艦砲擊泥城鎮。	2：249
8.1	張發奎	日機偵察川沙。日艦窺測金山、全公亭。杭州日僑全撤。日將有事於杭州灣。	2：249
8.2	張發奎	上海日軍運來汽車百數十輛，有深入內地企圖。	2：250
8.5	方唯智	上海謠言盛，虹口華人紛避蘇州河南。日便衣將巡視虹口地區。日方已擬計畫，東攻吳淞、西取龍華與虹橋機場。	1：163
8.5	蔣堅忍	日方決定先發制人，轟炸我方重要城市、飛機場、儲油地、彈藥庫及飛機，佔領上海公共租界，制我經濟死命。	1：163
8.5	張治中	空軍發現海岸有敵艦五、六艘，並商輪共十七艘。	1：163
8.5	張治中	空軍發現吳淞口外有敵母艦，似「能登呂」號。上海日軍運來野砲三十六門、木梯多架，至日軍司令部。	1：164
8.5	周 珏	日軍九日演習，遠及虹口及越界築路。現已禁止士兵外出。吳淞口有日艦十二艘、商船六艘，恐有大批陸、空軍到。	1：164

8.6	俞鴻鈞	日方各報渲染通州事件，挑撥日華惡感，恐為生事預謀。	2：250
8.9	張治中	日方在滬陸戰隊五千、在鄉軍人三千、義勇三千五、水兵三千、日艦十二艘。第二艦隊已動員。本田正向東京請兵。	2：251
8.11	張治中	日艦十六來滬，合原泊者共二十九艘。日海軍十六驅逐隊已至、第二艦隊發自佐世保。日陸軍下動員令。	2：253
8.11	外交部 辦事處	日軍急運軍械。海軍因大山案憤激。今日二千人登岸，總合已四千。	3：274
8.11	辦事處	在滬日艦原十二，今再增十六，分屬第二、第三艦隊。	3：273
8.11	張發奎	日機偵察寬橋。杭州灣口出現日艦。日艦窺金山衛、乍浦。	2：254
8.12	方唯智	水兵二千已登陸，砲三十六門入司令部。施高塔路日僑已疏散。計在滬日艦十六艘，軍力七千人。	1：167

- *來源：1.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二編〈作戰經過〉(二)
 2.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
 3. 《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
 4. 〈蘆溝橋事變後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長官會報第一至三十三次會議記錄〉

揮官張治中，主戰最力。

盧溝橋事變後，張治中就非常自信，認為應該「先下手為強」：

這時候，我對上海敵情的判斷，自信很實在、很正確。同時我有一個基本觀念：這一次在淞滬對日抗戰，一定要爭先一著。我常和人談起，中國對付日敵，可分作三種時期：第一種他打我，我不還手；第二種他打我，我才還手；第三種我判斷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這叫做「先發制敵」，又叫做「先下手為強」。「九一八」東北之役，是第一種；「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是第二種。這次淞滬戰役，應該採用第三種。

基於這種「先發制敵」的構想，他在七月三十日向南京提出意見：

則因我主力軍遠在蘇、常以西，輸送展開，在在需時，且上海保安團抵抗力薄弱，諸種關係，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較為有利。

然而電報呈上以後，軍事委員會的答覆還是力持慎重：「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

由張治中的這份電文，以及表一所列，各方傳達給蔣委員長的訊息，不難看出當時前線將領們躍躍欲試的態度，以及國府情報混淆的狀況。這些無疑都對國府的決策造成了壓力。雖然我們無法就此斷定，蔣有「誤判」(misperception)的情形出現，但卻足以懷疑這些訊息有誇大不實之嫌。蔣雖然審慎持重，但身處如此混沌的環境之中，恐怕也難以把持。

八月十一日夜裏九點，蔣委員長終於下令，在「吳福線」待命的國軍向上海推進。雖然不得已，卻也不得不然了。

註釋

①其實停戰線以東，中國軍隊不再進駐之約，並未見諸明文。《停戰協定》第二條只是說：「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但因爲約中對於所謂「常態恢復」並未加以界定，因此戰後日軍堅持停戰範圍繼續有效，華方迫不得已才加以承認。

第二章 戰幕初啓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夜裏九點鐘，坐鎮蘇州的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接到南京的電話：「進軍上海」。霎時，駐紮京、滬之間的所有部隊都忙碌了起來。自從上旬以來，國軍第八十八師就已移駐鐵路沿線、八十七師則集結公路兩側，露天紮營，以待前進。這個溽熱的晚上，進軍命令終於下達，鐵路馬上停止客運，旅客分別在各站下車，列車調充軍運。公路上則有各地徵用來的三百多輛汽車，連夜分途奔赴上海。第二天黎明，八十八師便在北站布防，八十七師也進駐江灣新市區，出現在敵人面前了。

前線官兵躍躍欲試

傳令進軍雖然代表了蔣委員長「打」的決心，但他也還沒放棄「和」的希望。尤其重要的，他不願意惹上「開釁」的罪名，弄到外交上站不住腳。因為儘管「七七」以來，上海一帶就謠言、衝突不斷，但市面還算平靜。即使發生了「虹橋事件」，日軍也仍是一如往常，並沒有加強戒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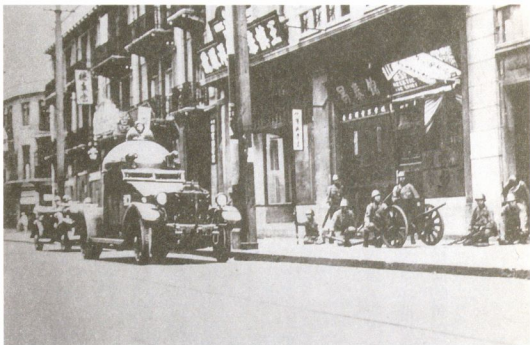
的跡象。如果這時貿然將軍隊開入租界，勢必得罪列強，甚至還會被指為挑釁。況且此間各家外國報紙持論都很模稜，還有公然贊同日本的。像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警告國府：

日本人的黷武行爲不論怎樣令人難受，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人倘若用武力抵抗，則不但不能阻抑，而且將使他們格外前進，其結果必完全毀滅中國的一切資源……。

所以剛開始，蔣曾猶豫再三。十一日當夜下達的命令，也只是要八十八師開到真茹，八十七師則在大場待命，還規定沒有遭到攻擊以前，不得先行開火。真茹和大場都在上海郊區，真茹離市中心的北站還有七公里多，大場距江灣新市區也有五點二公里。這個距離顯然是要留做「甌脫」地帶：一方面防止兩軍過度接近，鬧出意外；另一方面也在避免刺激租界裏的列強和日本，斷了轉圜的希望。

可是這時，張治中以下的前線官兵卻沒能充分「上體君心」，個個躍躍欲試，急望和日軍決一死戰，所以都沒有遵守原初的命令。由京滬鐵路向上海輸送的部隊，到了距離市區還有十公里的南翔時，弟兄們都不肯下車，一定要直開閘北。上級勸告他們，閘北在日軍火炮的射程裏頭，他們卻回答：「怕砲火還來幹什麼？」

而當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到達真茹時，也發現當地一片平原，無險可守。上海地勢又是西低東高，越向東建築物越高聳，留在真茹，將來必成仰攻、攻堅之勢，前線要點也將盡委敵手，於是立即決定「應於當面情況」，「將部隊逕開上海閘北車站」，佔領了北站——八字橋一線。



八月十一日，國軍進駐上海。日軍陸戰隊在北四川路上警戒。

八月十三日，戰火在閘北八字橋點燃。圖為當地的國軍陣地。



佔領完成以後，十二日清晨張治中就主動打電報給蔣委員長，希望速戰：

本軍各部隊在本日黃昏前可輸送展開完畢，可否於明日拂曉前開始攻擊？我空軍明晨能否同時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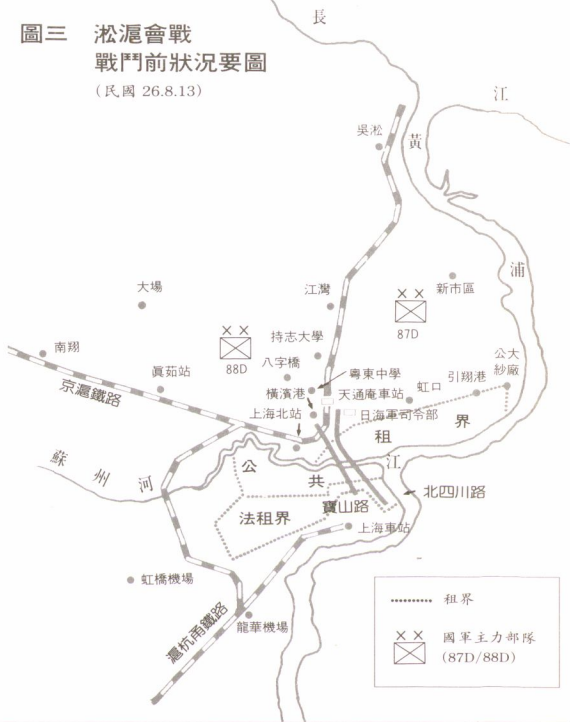
但蔣這時卻還在猶豫。因為一方面日軍在上午八點發表了聲明，強調「不擴大」原旨不變，日軍司令部附近也還靜謐，捕房也沒有特別警戒。同時另一方面，由於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的提議，列強正在醞釀停戰，要把上海周邊十二英里劃為「非戰區」。因此對於張治中等人「冒進」的表現，蔣飛急電阻止：

限三十分到。南翔張司令官文白兄：文已、文午電悉。○密。希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

這就是張治中在他的回憶錄裏，所提到的第一次「停攻命令」。不過嚴格說來，這並不能算是什麼「停攻」，因為原先就沒有「進攻」命令，何來「停攻」？但從這道轉折裏頭，卻可以看出，張治中在戰役的發起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蔣委員長在開戰前的態度了。

圖三 淞滬會戰 戰鬥前狀況要圖

(民國 26.8.13)



衝突開始

在上位者雖然猶豫，前線官兵卻迫不及待。北站和江灣都密邇公共租界，對峙的緊張加上求戰的心理，衝突根本不可能避免。楊虎的參謀劉勁持在國軍進駐當天早上去見張治中，就勸他盡快搶攻：「今天是『八一二』，過去『一二八』滬戰，我們挨了打，吃了虧，今天要狠狠地回敬它一下。《掃蕩計畫》規定夜間襲擊，今晚就可全力進攻，旗開得勝，首建奇功」。

當場張治中回答說，委座的指示，要等敵人先動手打我們，我們才能還擊，否則國際輿論將會對我不利。劉順口就說：

那很容易，部隊進攻部署好後，到晚上派便衣去打響幾槍，一面進攻，一面向上報告敵已進攻就成。

張自然沒有答應。不過這段對話卻說明了，在那樣的形勢下，想要控制衝突，實在是緣木求魚。事實上，對於國軍十一日晚間開進市區，日軍確實是措手不及。記者楊紀十二日清晨跑到閘北一帶觀察，看到國軍方面防禦工事都已就緒，而日軍沿華界一線「一點準備也沒有」：

北四川路上，日軍的機器腳踏車都不斷往來，顯見得笨拙的日軍，布置配備，一點都沒有

頭緒。

劉勁持也在同時，領著換了便衣的國軍幹部們，到開北、江灣偵察。下午回來說：「進出很容易，我們攜帶手槍到日本司令部附近看了一圈，摸清大街小巷，均未遭到檢查，今晚只等待進攻」云云。

十三日這天，上午還平靜無事，日軍虹口司令部附近也通行無阻。正午時分，日軍開始越過租界，到寶山路、北四川路等地布防，衝突隨之而起。這段經過，我國官書的正式記載是說：

八月十三日九時，我第八十八師當面，有日軍三百餘人，越界強佔我八字橋、持志大學及粵東中學等處。此時，天通庵車站、橫濱路之敵，亦向我射擊。……迨十八時頃，敵又以步砲射擊我橫濱港、八字橋附近守軍，我以迫擊砲還擊，戰鬥約三小時。

南京在等的，就是日軍的第一槍。所以前線一開火，俞鴻鈞立即通知各國通訊社，指責日方「首先啓釁」：

限急到。南京軍事委員會鈞鑒、軍政部何部長勳鑒：七二〇〇密。今晨九時十五分，北區日陸戰隊水兵一小隊，衝入橫濱路、東寶興路地段，向我隊伍射擊。……鴻鈞立即通知「路透」、「美聯」及其他通訊社，飛電各國聲明日本首先啓釁，違背不先攻擊之諾言矣。謹聞。

市區爭奪戰

八月十三日這天，前線衝突雖然頻傳，但還只是雙方衛哨以步槍、迫擊砲互射的小型接觸，真正的攻勢是等到十四日才展開。十三日夜裏，蔣委員長下令張治中發動拂曉攻擊。第二天一早，空軍出動轟炸，地面部隊則在午後三點下達總攻擊令。上海戰事乃告爆發。

開戰之初，張治中的構想，本來是希望能先迅速掃蕩日軍在上海的重要據點，進佔租界，然後封鎖海口，使來援的敵人無法登陸。所以八十八師奉命圍攻閘北的日軍司令部，八十七師則由江灣新市區進取日僑大紗廠，整個任務預計一個星期完成。

可是攻勢發起以後，進展卻意外艱難。雙方一接觸，就在租界外圍死纏爛打，重蹈「一二八」的膠著狀態。八十八師在十四日下午，首先陣亡了旅長黃梅興。接著第二天，由於戰鬥慘烈，前鋒團傷亡官兵五百多人，只好換下來整理。隔天，又在同一處地方犧牲了一個營，終究只能推進到日軍司令部外圍，攻不進去。

緒戰之所以不如人意，張治中是歸咎於統帥部的猶豫：

上海之未能一次總佔領，統帥部失機於先，三次叫我停止攻擊；後來大戰展開，除陸軍外，又沒有配合有力的空軍。在開戰前，蔣問我：「有沒有把握？」我的答案就是：「一定要有

空軍和砲兵的配合。」而自開戰以後，因為這一個條件的缺乏，以致未能達到佔領全滬的目的。

不過這段話恐有卸責之嫌。統帥部固然有其責任，但張治中自己也不無「準備不周」之咎。裏面所說的三次「停止攻擊」，第一次就並非所謂的「停工」；至於後來的兩次，張治中自己在當時上呈的電報中，也都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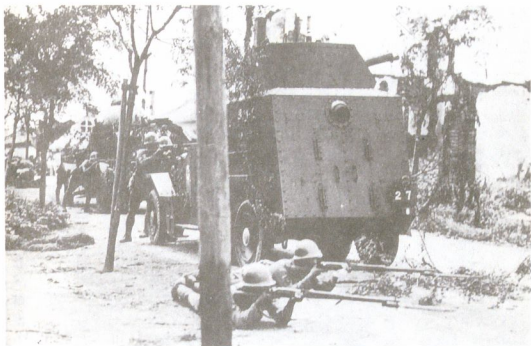
今昨兩日，雖奉諭停攻，但仍命各部以小部隊伺機出擊。

換句話說，前線並沒有真的停火，各部隊還是照樣「伺機出擊」，而且這還是「統帥部」認可的。

日本租界久攻不下，問題確實是出在空軍與砲兵的缺乏，但這並不是統帥部支援不力，而是力有未逮。因為日軍的據點多是鋼筋水泥外帶沙包構成，非有大口徑火力不足以摧毀，而國軍當時缺乏重火器。這點蔣委員長早經注意，還特別在開戰之前叮嚀張治中：

倭營鋼筋水泥之堅強，確如要塞，十五生的重榴砲與五百磅之炸彈，究能破毀否？希再研討。與《攻擊計畫》一併詳復。

十五釐米的榴彈砲和五百磅的炸彈，已經是國軍威力最大的火器了，所以蔣才要他「希再研討」。可惜後者似乎不曾措意，他的作戰科長史說後來追憶說，當時部隊的訓練根本不夠：



日軍陸戰隊的裝甲車在八字橋附近戰鬥中。

十五公釐重榴砲與五百磅炸彈均未能摧毀的閘北日軍陸戰隊司令部。



部隊方面，必須學會對堅固據點的攻堅戰術，但當時部隊軍官缺乏攻堅知識與經驗，又沒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只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訓練。……初期攻擊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砲直接瞄準，去破壞和壓制日軍火力點，以及接近爆破。以後抵抗日軍進攻，對砲兵與坦克束手無策。

顯然開戰之前，張治中並沒有料到，連國軍最大口徑的爆破武器，都摧毀不了日軍司令部和公大紗廠，所以事先也沒有預擬對策，並做好訓練。結果執行圍攻的官兵們，只能單靠輕兵器和機槍逐步接近，再利用手榴彈一個個據點進行攻堅。寶貴的時間和戰力就這樣消耗掉了。

匯山碼頭攻勢

攻堅不成，張治中在十六日變更了進攻方式，要求將領們「遇隙突入，不在攻堅」，對於日軍堅固的據點，只留置必要的兵力加以監視，其他部隊就繼續前進。突進時要無孔不入，每攻佔一條馬路，就用沙袋作掩體，並放火阻塞敵人。

這天夜裏，八十七師的團長陳頤鼎受命加入突擊隊，由江灣向北四川路日軍心臟地帶進攻。突擊隊由兩個步兵營加上工兵、戰防砲組成，每人攜帶兩天份乾糧。他們奉命每佔領一處據點，就必須上繳門牌，以資證實。第二天凌晨，行動開始，當天就攻破碉堡十座，一部分隊員還滲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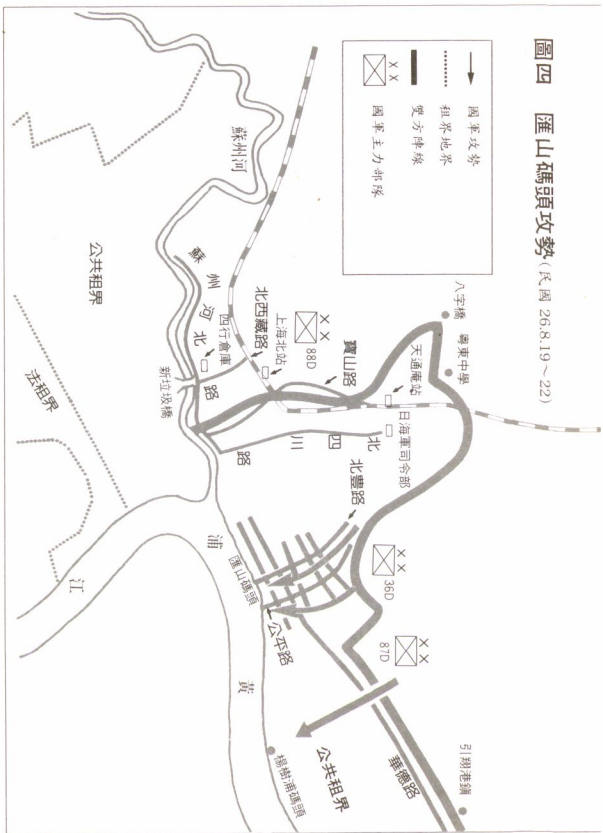


八月十九日，日軍在陸戰隊司令部頂樓據險還擊。

滬戰開始，國府空軍出動。圖為八月二十日，日軍在上海市政府招商局碼頭對空射擊中。



圖四 匯山碼頭攻勢(民國 26.8.19~22)



爲兩段，再向左右席捲，加以掃蕩。

十九日上午，八十七師在楊樹浦一帶突破缺口，朝匯山碼頭挺進。張治中報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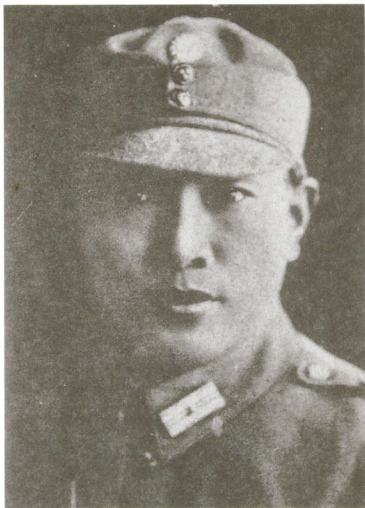
職以敵之弱點，既經我突破，擬於今夜即以有力部隊加入，由該突破口向兩翼擴張戰果，



活躍於上海市街戰的國軍戰防砲。

到黃浦江岸。但是因爲日軍陣地已經經營多日，「每一通路皆爲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爲活動堡壘」，最後「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而國軍的武器又差，對重點工事根本沒有辦法。十八日夜裏，突擊隊還是撤出來了。

這時，甫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的陳誠，奉蔣委員長命令到前線視察。他和張治中商量之後，決定改變重點，將新到的三十六師和九十八師投入戰場，直指匯山碼頭。試圖先作中央突破，把日軍截



負責突進匯山碼頭的國軍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

以期迅速為整個之解決。

這時三十六師剛由西安趕來，不及集結完畢，就匆匆加入戰鬥。從二十日夜裏開始，配合戰車，沿著公平路和兆豐路向南推進。但由於攻擊發起線到匯山碼頭，之間還需經過四、五個路口，而每個路口日軍都已經布置了火網，從四、五層高的樓頂交叉瞰射，逼得攻擊部隊只能借助戰友的屍體做為掩護，匍匐前進。不但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進展也極為緩慢。

同時日軍艦砲火力異常猛烈，師長宋希濂的指揮所就被擊中過兩次，貼身的通信兵都被打死。先發的戰車連雖然一度突進到碼頭，伴隨的步兵卻被阻截在半路上。攻勢又發動得過於倉促，後續部隊沒有來得及增援。這樣苦戰到天亮，進抵碼頭的部隊終究無法立

足，又退了回來。一夜的戰鬥，師裏就傷亡了官長九十多人、士兵一千一百多名。

二十一日夜裏，攻擊繼續。三十六師在戰車的支援下，再次攻抵碼頭。但是因為平日國軍缺乏步戰協同的訓練與經驗，戰車一進了市街，步兵就任其單幹，不加掩護，以致衝進去的戰車第一連全數被毀，連長都陣亡了。而伴隨的三百多名步兵也受到阻隔，無法脫出，反遭日軍用戰車堵住巷子兩頭，悶起來用火焰器放火，而全部犧牲。

這天的戰鬥是「市區爭奪戰」的最高潮。二十二日，國軍雖然又調集新的戰車及榴砲，張治中也下令各部隊繼續進攻，但日軍松井石根所率領的「上海派遣軍」已經抵達上海北郊吳淞、獅子林、川沙口江面，準備登陸了。此後戰場逐漸北移，國軍主力也紛紛轉用，市區就不再是重點了。

張治中去職

市區爭奪的失利，自然影響到蔣委員長對張治中的信任。同時隨著戰事擴大，國軍指揮系統漸趨複雜，將領間的衝突也日益嚴重。開戰之初，戰區本來是張治中以「第五軍軍長」兼「京滬警備司令」名義，主持作戰，馮玉祥則掛「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空頭，不負責實際責任。但蔣似乎並不滿意張治中的作戰處置，開戰當天就訓令他：

張司令官文白兄：對倭寇兵營與其司令部之攻擊，及其建築物之破壞，與進攻路線、障礙之掃除、巷戰之準備，皆須詳加研討，精益求精。不可徒憑一時之憤興，以致臨時挫折，或不能如期達成目的之氣餒。

言外之意，竟是告誡他不可輕敵了。

而張治中自己又愛接待記者、發表談話。當時在顧祝同「副司令長官部」工作的參謀曾振，就說張「確實會吹」：

他在上海初期作戰時，喜歡在報紙上發表戰況。他頗以英雄人物自許，無非是想出出風頭，博得好評；報紙也有些替他吹的。委員長見報，便屢次告誡，不要發表談話，他那裏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記者，偏偏每天必來。這樣，上海各報每天有張治中的戰況談話記載。委員長見報，便來電話斥責，我們聽到張治中在電話中答覆說：「報告委員長，我明天不說了……。」但是第二天的報紙上仍然有張治中發表的談話。這樣一斤一答有好幾次，最後大概是受了委員長一頓罵，同時顧副司令長官也勸他不要再說了，張治中才不再發表談話了。

或許就因為這樣的摩擦，開戰才六天，八月十八日，蔣便下達手令，要陳誠擔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按規定，前敵總指揮可以指揮集團軍，所以蔣是打算用陳誠取代張治中，來統籌全局了。



因為與蔣意見不合，張治中在九月二十三日辭卸職務。圖為其在馮玉祥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晤談情形。

因此，日軍一登陸，八月二十三日，張治中就被改任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繼續圍攻市區；而陳誠則以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身分，負責反登陸作戰。但這項任命卻沒有及時傳達給張，加上作戰指揮上有所歧見，張治中在電話裏跟蔣正面衝突，氣得連話筒都砸了。二十五日晚上，蔣親臨張治中司令部舉行會議，當面批評前線將領指揮失當。於是部隊紛紛傳說，蔣曾在電話裏斥責張治中，不該突進到匯山碼頭，致使官兵傷亡過重云云。

除了與蔣的摩擦之外，張治中和陳誠也積不相能。接受陳誠指揮，對張治中來說，斯可忍，孰不可忍！張揚言：「陳辭修資格太淺，怎麼能指揮我！」陳誠也不滿意張治中，說：「張治中只會吹牛！」而兩人的直屬上司馮玉祥，又和中央將領素無淵源，對

兩人的齟齬無法調和。於是蔣委員長又任命顧祝同掛名戰區副司令長官，駐錫張治中的司令部，負責統攝這兩個集團軍。

於是同一個戰區，有一個司令長官部，又有另一個副司令長官部，底下還有兩個集團軍總司令部，其中一個還兼前敵總指揮。這樣疊床架屋的指揮系統，一直維持到九月中旬，蔣委員長終於把馮玉祥調到華北去，自己兼任戰區長官。張治中也不再管事，直到九月二十三日辭去職務為止。

依照當時國軍慣例，司令官換人，全體幕僚就要一道去職。所以張治中辭退後，雖然接任的朱紹良堅留原有人員，但大家還是一一離去。此後戰局就改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控，戰役的目標與性質也逐步轉變，終於演成一場決戰。

蔣委員長直接指揮

蔣委員長介入淞滬戰事，大致可以顧祝同就任戰區副司令長官做爲一個分野。在這之前，上海的作戰計畫是由張治中策劃執行，蔣雖也過問，但張多少還保有主導權。但八月十五日顧祝同受命以後，蔣的意志就越來越明顯地貫徹在這個戰場上。顧祝同自己回憶說：

我來戰區，只是臨時決定，僅帶有隨從一名，只得暫借張治中總部的人員及設備。我的辦

公室，也就暫設在張治中辦公室的隔壁，只裝了兩部電話機，應付前後方連絡的需要……。

當時顧、張合署辦公，所有文書、收發、通信、傳令，甚至吃飯和文具，都是由張治中供應。這樣的匆忙與侷促，自然談不上什麼指參作業了。顧祝同當時的角色其實就和「傳令兵」沒有兩樣。他身邊的參謀曾振說：

上海戰事，自開戰以後，實際上是委員長親自指揮的。每天的戰況，委員長隨時以電話向顧副司令長官詢問，並指示作戰機宜，有時涉及細部部署。

「有時涉及細部部署」，洵非虛言。十一月十八日，蔣曾經發電顧祝同，提到七十四軍逾濟時部隊的問題：

吳縣。顧副司令長官：○密。據報我五八師蘇村一帶前進陣地縱深較大，尚屬穩固。惟岳王廟以北前進陣地放棄後，未謀恢復，敵迫近至百餘米，致友軍受敵威脅。又敵軍每次敗退後或兵力單薄時，我未乘機予以奇襲，待敵增援後，再起應戰，五一、五八兩師均犯此通病等語。特電知照。中。

細讀這份電報，令人歎為觀止。「最高統帥」指示的事項，從部隊陣地的縱深、敵我防線的距離、到戰場上指揮官進退趨避的戰術作為，鉅細靡遺，「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別」。

但是這樣的指揮習慣，卻未必是件好事。當時擔任第一軍胡宗南部隊參謀長的於達，後來在臺灣就深致遺憾地說：

革命軍積下來一個很不良的習慣，使得革命軍很吃虧，其原因可能是委員長因為用的都是學生，把他們從無知的少年訓練長大，老是覺得這批毛頭小子會出亂子而不放心。蔣先生一直到现在都還看他們是小孩子，什麼事情都不能放心他們去做，而事事干預他們，而且干預得很厲害。

而這種干預所帶來的，又往往是作戰能力的低落：

打仗是瞬息萬變的事，前面一個情況，一直到師長曉得，起碼已經經過了十二小時，最快的也要兩小時才曉得。無線電的操作有一定時間的。師長得到一個情況後再由參謀長作報告也要一天。擬電報譯電報再交……去拍，拍到侍從室再譯好電給蔣委員長看，已經過了幾天了。加上又逢委員長休息、開會啦，等到他下命令，情況早變了。不是他的命令錯，而是情況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敗仗，則是必然的，我們指揮系統的大毛病就在此。並且還容易造成指揮系統內的摩擦與矛盾：

軍隊無法獨立作戰，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縛無從發揮，這是革命軍積習很深的習慣，也是一

個大病，此乃起源於「毛頭小子不放心」的心理。其次，委員長也常越級指揮下級，師長也常越級指揮團長，常使旅長發現兵不知被調到何處。指揮系統發生自相矛盾，指揮官和所屬幹部因此發生衝突磨擦而自壞陣營。「不放心」和「越級指揮」造成作戰指揮系統的混亂，和作戰能力的低落，這兩種特色構成「黃埔精神」，至今仍不能改變。

上海戰役就在蔣這樣的指揮習慣，以及「死守」觀念的帶領下，一步步朝向決戰邁進。

第四章 決戰高潮

上海的棺材行裏邊流傳著一則極為奇特的說法，說店堂存放的棺材要是有在夜裏軋軋作響的，第二天就會有生意上門。假如這是真的，那麼民國二十六年的秋天，上海棺材行裏所有的棺木一定都在夜半時分發出過軋軋的聲響。

反登陸作戰

從八月二十三日日軍登陸長江南岸開始，到十月二十六日國軍全面撤離上海市區為止，前後兩個月零四天，是整個滬戰的高潮。其間戰事一直集中在市區迤北到瀏河鎮的四十公里戰線上。雙方爭奪的焦點，分爲三個階段，先是沿江一線，接著是羅店，最後是蘊藻濱。

當日軍登陸之初，國軍曾經在長江沿岸發動強韌攻勢，企圖乘其立足未穩，殲之於灘頭，這是第一階段。到了九月十一日，因為耗損太大，改採守勢，將部隊撤到瀏河—羅店—蘊藻濱—江灣一線。日軍也開始轉移攻勢，把主力指向羅店，企圖中央突破。雙方激戰了半個月，是爲第二



八月二十三日，日軍在長江南岸川沙鎮登陸，開闢第二戰場。

階段。

十月一日，國軍北翼被迫後撤，南翼相形突出，戰線形成「S」狀，日軍於是向南迴轉，打算強渡蘊藻濱，進佔大場，包抄國軍後路。兩軍夾河鏖戰，是為第三階段。直到十月二十六日蘊藻濱河岸遭到突破，大場失陷，國軍南翼才放棄市區陣地，退往蘇州河南岸。之後砲聲才慢慢遠離上海。

滬戰的擴大始於八月二十三日。當天拂曉，日本「上海派遣軍」以第三及十一兩個師團為主，由總司令松井石根率領，在瀏河、吳淞、川沙口一帶登陸。對於日軍這次開闢「第二戰場」，蔣委員長顯然早有所聞，事先已命陳誠率領第十八軍赴援。所以日軍一上岸，雙方就在江邊演成持久膠著的消耗戰。

日軍當時戰術上憑藉堅船利砲，總是在登陸之前，先用艦砲、飛機夷平守軍陣地，再掩護步兵搶灘。國軍第一線官兵往往全營殉難，然後增援部隊再冒死向前，進行圍攻。雙方你來我往，層層包圍，持續了半個多月擲彈互炸，短兵相接的惡戰。沿岸村落無不經過多次爭奪，常常白天日軍佔領，晚上又被守軍奪回。國軍各部隊在劣勢的火力下，無不傷亡慘重，每每不到幾天就犧牲殆盡，必須換下整理。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長史說就親眼看到，教導總隊的一個團整整齊

齊上去，下來時只剩幾副伙食擔子。

由於戰場是一坦平陽的灘岸，國軍在這裏連個像樣的戰壕都來不及挖。地面近海，土質疏鬆，加上連日陰雨，即使勉強修建一些工事，也只是象徵性的，想要加固都不容易。一旦遭受砲火洗禮，不是全毀就是崩塌，甚至還將裏面的官兵震壓致死。而陣地毀損太快，又需要不斷翻修，材料接濟不上，只好拆用鐵路鋼軌、枕木和被毀房屋，邊戰邊建，以濟眉急。

這樣艱苦撐持到八月底，重鎮寶山形勢危殆，顧祝同秉承蔣委員長意旨，要求九十八師派隊死守。姚子青營乃在第二天入城接防。九月五日日軍總攻，全城被圍，翌日下午師部收到電報：「敵兵艦三十餘艘排列城東門江面，飛機十餘架轟擊各城門，戰車向我城門衝擊。」師長夏楚中覆電要他們「戰至一兵一卒亦須固守」、「準備充分巷戰，萬一城垣被陷，亦當與敵偕亡於城中」。當晚，城裏兩度告急：

職營官兵均抱與敵偕亡之決心，惟孤城無援，日久難支，人城俱亡，無補大局，仍懇速援解圍。

夏楚中只能許以援軍正在途中，堅其固守之心。天亮以後，日軍用戰車堵塞四門，集中火力轟擊。城內建築全毀，守軍開始巷戰。最後姚子青陣亡於東門，戰



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

門在上午結束。除了上等兵一名翻城逃出外，全營犧牲。

寶山之戰是首序曲，標誌著長期死守的開始。

龐大的動員

本來在上海，國府並不會計畫要死打硬拼，至少九月上旬以前，還是傾向於適當時機退守國防線。九月六日大本營頒布《淞滬抗戰第二期指導計畫》時就指示：

一、本戰區為保持經濟重心，鞏固首都，並有利於全局之持久作戰起見，務就現已形成之包圍態勢，對於上海及各處上陸之敵，運用優勢兵力斷絕其聯繫，……打破其包圍企圖，而收各個擊破之效。

二、如各個圍攻之目的不能達到，則依狀況逐次於後方佔領陣地，採取攻勢防禦，乘其海、陸火力不能協調之際，發揚我之精神與物質威力，一舉而擊破之。

三、於萬不得已時，則退守後方既設陣地，作韌強之抵抗，以待後方部隊之到達，再行決戰，期獲得最後勝利。

訓令中，對於戰事的規畫，最好是能夠以攻勢將日軍橋頭堡「各個擊破」；如果圍攻不成，

則準備轉移到敵人「海、陸火力不能協調」的後方，佔領陣地，改取守勢；到最後「萬不得已時」，就退守國防工事，「再行決戰」。可見在滬上集中精銳、死守到底，並不是原初的計畫。決戰的地點，也不是想定在上海，而是「後方既設陣地」。戰前國防線的構築，沒有選在上海近郊，反而遠在蘇、常一帶，就已說明了這點。

然而戰事的發展，卻完全出乎逆料。國軍的投入竟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由表二來看，日軍登陸之初，上海守軍只有七個師；九月十一日退守羅店時，增加到十九個師。此後數字更扶搖而直上，尤其蘊藻濱激戰的十月份，國府一口氣調來二十個師，前線兵力高達五十幾個師。整條京滬和滬杭鐵路全部轉為軍用，列車日夜不停奔馳，把一師師的部隊送來填補火線，維持住「寸土必爭」的形勢。這樣打到末期，參戰總數多達六十幾個師，超過當時全國總兵力一百八十個師的三分之一。

這些兵力徵調的範圍，可說遍及全國。國府在戰役初期，先是以德國裝備的中央嫡系部隊應戰，前後動員達十七個師。中期以後羅店、蘊藻濱爭奪激烈，何鍵的湘軍、余漢謀的粵軍；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相繼投入。蔣委員長還不斷手令各省主席派兵增援。於是各「地方軍」，從舊皖系、直魯軍、西北軍、東北軍，到浙、鄂、贛、黔、陝、豫各路部隊也都前來共赴國難（參見表二）。劉湘的川軍在上海撤退後不久，加入了南京外圍的戰鬥；甚至遠在西南的龍雲滇軍，也奉到開拔的命令，只因路途遼遠，才沒趕上這場犧牲。

表二 滬戰各期參戰部隊派系分布表

時間 派別	市區 圍攻	反登 陸戰	羅店 爭奪	蘊藻 濱	滬西 戰鬥	南京 戰役	不 明	合 計
	8.13- 8.22	8.23- 9.10	9.11- 9.30	10.1- 10.26	10.27- 11.11	11.12- 12.12		
中央軍	4	9		4				17
皖系	2	1	1					4
湘軍		1	4	3	3		5	16
浙軍		1						1
粵軍			5	1	1	1		8
西北軍			1	1				2
桂軍				6		1		7
黔軍				1	1	1		3
鄂軍				1	1			2
川軍				3		7		10
陝軍					1			1
東北軍					3	1	2	6
直魯軍					1	2		3
贛軍						1		1
豫軍							1	1
不明	1					1		2
總計	7	12	11	20	11	15	8	84

*關於各師番號、派系及參戰日期，請參見〈附錄一〉。

刻意調集精銳

這次調上來的六十幾個師，多數都是國軍的精銳。所謂「精銳」，大致可以用「中央軍」和「整編師」來做指標。「中央軍」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由黃埔軍校教導團、教導師、黨軍、國府警衛師、警衛軍等單位，衍生或擴編而來的「系統師」，像第一師、十一師，「血統」純正、素質整齊，戰鬥力也較強。另一種則是接管「地方軍」而來的「控制師」，也就是部隊裏頭的師、旅長是黃埔學生，但班底還是地方出身的老幹部，像六十師、六十一師，素質就較參差，士氣也難說。

由這項界定來看，抗戰爆發時，不含砲、工兵等配屬單位，「中央軍」系大約掌握了三十個師級單位，其中「系統師」和「控制師」各半。裏頭參加滬戰的，有十七個，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六·七），而且參戰的十七個師中，有七成（十二個）是素質較優的「系統師」（參見表三）。其中先是張治中所統率、打過「一二八」的第五軍（含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等三個師），接著是陳誠系統的十八軍（含十一、十四、六十七三師），以後胡宗南的第一軍（含第一及七十八師）、李玉堂的第三師、李延年的第九師、俞濟時的七十四軍（含五十一、五十八兩師）陸續到達。除了湯恩伯的十三軍和衛立煌的十四軍在山西，第二和二十五師在平漢路上外，中央嫡系部隊已經全部到齊了。

表三 抗戰開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時「中央軍」各師番號與控制狀況

番 號	主 官	編 制	滬戰	控制狀況	源 流
第一師	李鐵軍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黃埔教導團
第二師	鄭洞國	整編師		系統師	黨軍第一旅
第三師	李玉堂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黃埔教導師
第四師	王萬齡	整編師		系統師	教導第二師
第九師	李延年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黃埔教導第二團
第十師	李默庵	整編師		控制師	方振武舊部
十一師	彭 善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警衛師
十四師	霍揆彰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武漢分校教導團
二十一師	李仙洲			控制師	直魯軍劉珍年部
二十五師	張耀明	整編師		系統師	軍校教導第二師
三十六師	宋希濂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國府警衛師
四十九師	李及蘭			控制師	福建自治軍
五十一師	王耀武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新編十一師
五十八師	俞濟時	整編師	參戰	控制師	北洋山東陸軍
六十師	陳 沛		參戰	控制師	十九路軍舊部
六十一師	楊步飛		參戰	控制師	
六十七師	李樹森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十一師擴編
七十八師	李 文	整編師	參戰	控制師	十九路軍舊部
八十師	陳 琪			控制師	孫殿英舊部
八十三師	劉 戡	整編師		控制師	十、五二師合編

八十五師	陳 鐵	整編師		控制師	黔軍谷正倫舊部
八十七師	王敬久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國府警衛師
八十八師	孫元良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國府警衛師
八十九師	王仲廉	整編師		控制師	武漢要塞兵團
九十二師	陳 烈			控制師	湖北警備旅
九十三師	甘麗初			控制師	曾萬順舊部
九十五師	羅 奇			控制師	原三十五師
九十八師	夏楚中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五二師改編
教導總隊	桂永清	整編師	參戰	系統師	
稅警總團	黃 杰	(註)	參戰	控制師	原宋子文親軍

* 資料來源：1.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

2. 韋顯文、支紹曾等編《國民革命軍發展序列》

3. 王成斌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

註：稅警總團未列入調整，但其戰力比照「整編師」。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參戰的「中央軍」，多數都駐有德國顧問。戰前國府是聘請德籍軍官協助訓練軍隊，包括第三、六、九、十四、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等師及「教導總隊」、「稅警總團」都派有顧問。而這些部隊掃數參加了上海之戰。那時候還因為這批「德式中央軍」的參戰，使得這場戰役被若干日本將校挖苦為「德意志戰爭」。

其次，再從「整編師」的角度來看，當時全國有三十個「整編師」（參見表四），投入這個戰場的就有二十一個，也佔了七成。原來在民國二十四年，蔣委員長手定六十個師的《整軍計畫》，打算在三到四年之間，整編出六十個完全按照德軍兩旅四團編制的新師，做為抗戰爆發時的第一線部隊。所以從二十五年起，每年分兩期，每期調整充實十個師。到盧溝橋事作，第一期、二期的二十個師已經整編完成，第三期也正開始著手。每個「整編師」有一萬七千多人，輕重機槍、迫擊砲齊全，洵是當時國家的勁旅。蔣委員長一舉調集二十一個上來，著實說明了他的決心，不是為「守」而守，而是為了「決戰」而守。

羅店爭奪戰

寶山失守以後，國軍由於半個多月來的消耗，已漸感不支，乃在九月十一日後撤到瀏河—羅店—蘆藻濱—江灣一線。戰局至此攻守易勢，日軍開始指向羅店一帶發動猛攻。羅店只是一個小鎮，但因為寶山、上海、嘉定、松江幾條公路的樞紐，戰略意義極為重要。守住羅店，才能守住

表四 民國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三期「整編師」番號與參戰狀況

第一期整編師		第二期整編師		第三期整編師	
番	號	番	號	番	號
教導總隊	參戰	第三師	參戰	第一師	參戰
第二師		第四師		第五師	
二十五師		第九師	參戰	十三師	參戰
三十六師	參戰	第十師		十六師	參戰
八十七師	參戰	二十七師		五十一師	參戰
十一師	參戰	十八師	參戰	五十六師	參戰
十四師	參戰	八十三師		五十八師	參戰
六十七年	參戰	八十八師	參戰	七十八師	參戰
五十七師	參戰	八十九師		八十五師	
第二師補充旅	參戰	第六師	參戰	九十八師	參戰

* 資料來源：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

從九月到十月，羅店、蘆漢濱
爭奪激烈。圖為上海戰場中的
日軍。



九月十二日，上海市政府以東的戰場遺蹟。

嘉定、瀏河，也等於是間接守住了蘇州和上海的門戶，所以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曾在八月二十九日建議蔣委員長死守羅店：

目前最要害地點，莫如羅店。宜絕對在該處阻止敵人，使不能犯劉行，更不能趨嘉定。穩固由南翔經嘉定——太倉之連絡，極關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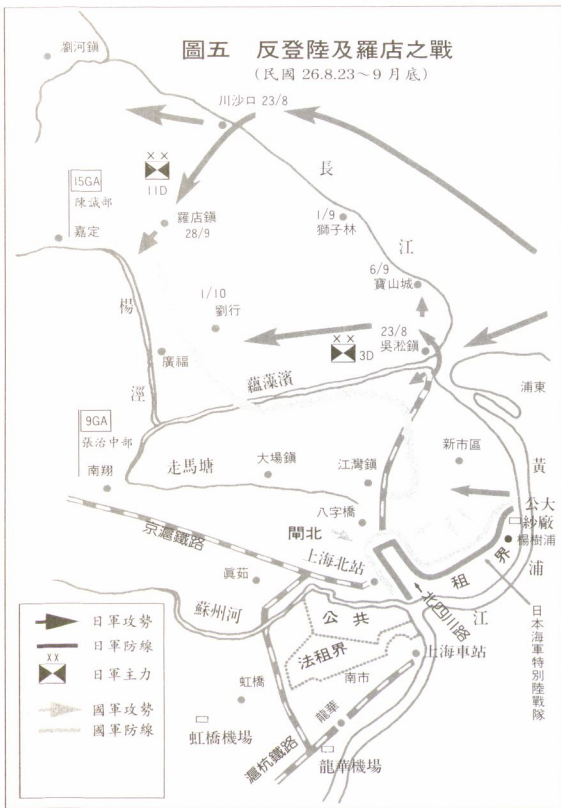
爭奪戰於焉展開。這時日軍增援的第九、十三及一〇一師團已經首途上海，前線總兵力達到十萬人。而國軍更已投入了三十幾萬之衆。

羅店的戰鬥，是以「肉磨之線」聞名。日軍進攻的模式總是分成三部曲：首先，是在天亮前後以飛機密集炸射，觀測氣球也同時升空，指示砲兵和艦砲作進一步射擊，徹底摧毀守軍工事。接著，便燃起煙幕，步戰協同，開始前進，砲兵則延伸彈幕，配合戰機，阻絕後方守軍的增援。最後，等戰車在國軍防線上切開缺口，向左右席捲時，步兵再緩緩前進，每進一小段就迅速構築機槍掩體，防堵守軍反擊。

面對日軍善用優勢火力的攻擊模式，國軍的表現也相當頑強。部隊先是乘夜挖斷公路、埋設地雷，乃至襲擊敵方衛兵、發動夜戰。天亮以後，就派遣少數兵力，在陣地前面組成戰鬥群，固守據點，大隊則在陣地後方休息。當敵人猛烈轟擊時，就躲進交通壕，盡力隱蔽，減少損傷，並加以監視。等到對方步兵吹起衝鋒號，再迅速進入陣地。日軍戰車開來，先引誘它陷入深溝，然後再和伴隨的步兵拚刺刀、打肉搏戰。白天陣地要是失陷，就依靠夜幕發動逆襲，趁敵立足未穩

圖五 反登陸及羅店之戰

(民國 26.8.23~9 月底)



之際，加以奪回。日方官書記載說，當時中國軍隊受到砲擊都死守不退，否則就會遭到槍決。總要等到日軍步兵出動，直接加壓，才能將之驅逐。

人力的大量消耗

羅店之戰的這段時期，國軍全線幾乎都成挨打的重心。日軍開戰之初，部眾都是現役，素質好、武器精，藉著空軍、重砲的掩護，每天發起衝鋒不下一、二十次。衝鋒得手，後續部隊就蜂擁而入；不得手，便退歸原陣，待機續攻。作戰盡量利用機械火力，減少人員傷亡。

相對上，國軍夜間必須修復工事，白天還得承受機砲轟炸，日復一日，困頓已極。同時指揮作戰的將領們，對於「持久戰」的理解又不夠靈活。當時在十四師代理旅長的郭汝瑰曾向師長表示，願意帶隊夜襲。但師長不敢作主，叫他直接請示軍長羅卓英。結果羅說，你不明白現在是持久抗戰，要一線一線地頂，以爭取時間。郭回答說，「以攻為守」一樣可以爭取時間，和持久抗戰並不矛盾。羅說，你沒有弄清楚上級意圖，不准亂動。

所以整場仗下來，國軍一直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一上火線，除了重傷或死亡，無論將校士卒，都不得稍離，必與陣地共存亡。這樣的死守，即便是第一流勁旅，最多也只能頂個七天，胡宗南第一軍守劉行，三天就犧牲殆盡。有的部隊上去，更是一觸即垮。換防時，一師兵力剩下一團回來，是常有的事，有的團還只能編成一個連。以當時的「整編師」，一師有四團，一團有九

連來看，人力耗損之慘重，可以想見。

而面對這麼孔急的人力需求，國軍的運輸、集結又很遲滯。當時駐紮鄞縣的第十九師奉命開赴上海，但列車走到蘇州就不通了，因為前線下來的傷兵太多，鐵路車廂缺乏。他們只好在蘇州車站坐催，等了一天才找到空車，數量卻不夠，部隊擁擠著，根本不能休息。途中又屢遇空襲疏散，人員、裝備上上下下，更增疲勞。後來車子走到半路，又被攔下等傷兵車，一停幾個小時，得不到開車命令。制空權掌握在日軍手上，列車只能夜間開行，等到早上四點，便得停開，人員下車，等黃昏以後再組裝。他們就這樣走走停停，耽擱了三天，才從蘇州趕到南翔。

轉運的遲滯，使得國軍在上海雖然動員了日軍三倍的兵力，卻仍然沒能以多打少。因為始終沒辦法一舉集中優勢兵力，只好來一師上一師，靠著全國部隊數量之多，來彌補素質和其他方面的缺陷。用自己的消耗來換取敵人的消耗，達到持久的目的。結果前線就演成了「車輪戰」，由閩北到瀏河，迤邐數十里，配置著二、三十個師，死守在陣地裏。一個師打完了，再補上第二個師，第二個師打完了，再補上第三個師。哪支部隊支持不住了，就把剛到的換上去。每天傷亡又很大，調來的部隊經常不遑喘息，原車就開上火線。後方既沒能留下預備兵團，還給了日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蘊藻濱之戰

戰鬥進行到九月下旬，羅店全鎮已然化爲焦土。國軍開始利用河汊一步一步地頂，將防線慢慢向後挪。日軍進攻的矛頭，逐漸接近到劉行。這時陳誠親在劉行指揮，判斷爲了長期抗戰，須要轉移陣地，但蔣委員長顧慮到上海市區的得失，「尚欲死守劉行」。終於又熬到九月底，劉行陣地全毀，守軍潰散，陳誠又向蔣報告，前線不堪再戰，如果沒有援軍到來，就應該撤退，調整陣勢。蔣才勉強同意退守廣福——蘊藻濱一線。

十月一日，國軍北翼撤離劉行，結果市區所在的南翼已相對突出，整條戰線形成「S」狀。日軍於是緊躡於後，將主力向南壓迫，打算強渡蘊藻濱，進攻大場。由於大場是通往市區要道，國軍後路所繫，得失關乎成敗，因此蘊藻濱沿岸就成了雙方注目的焦點。

蘊藻濱河幅不寬，屏障作用不大，無法阻止日軍強渡。所以國軍退守後，仍是重演過去一個多月來的消耗戰。從九月到十月，兩軍在五十公里見方不到的土地上，反覆著一莊一村的爭奪。李鐵軍第一師某團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四點，丟失了蘊藻濱南岸的王家宅陣地。部隊隨即反攻，一度奪回，但轉眼又告易手。團長於是連夜逆襲，二度奪回；但撐到第二天傍晚，還是失守。於是當夜三度進襲，村子奪了又失，失了又奪，雙方第四次進出。最後到了第三天下午，陣地五度失守。這時團裏已經傷亡殆盡，但還是在二十日凌晨零時，借助友軍的支援，重新加以佔領。前

後五十六小時間，演出十度進出，每次易手不過五個半鐘頭。

類似的場景，李文七十八師某團，九月底在蘊藻濱南岸進入塘西宅、塘北宅和北趙家角三處陣地。日軍來攻，塘西宅和北趙家角相繼失守，第一營全軍覆沒；而僅存的塘北宅，三面受敵，負責防務的第三營也死傷殆盡。這時前來接防的第二營仍在半路上，日軍卻已搶先進了村子。第三營陣地裏只剩營兵一名，對著敵人打了一排槍，摸不清虛實的日軍竟然就退了回去。這一遲延，終於使得第二營能夠及時趕到。但那位士兵最後還是陣亡，成了無名英雄。

整個戰鬥的過程中，日軍經常憑藉優勢的地面與空中火力，實施隔離射擊。密集的彈幕，使得國軍前進固然困難，後撤更加危險。每天每營都有許多官兵戰死在陣地裏，連屍體也運不下去。戰士們白天挨炸，難以活動，就靠夜間爬進戰壕，挪開屍體，連夜搶修工事，以便第二天繼續作戰。有的部隊索性將這些堆積如山、埋也埋不完的屍體，擺到戰壕前面充當胸牆，托槍射擊，或者當成沙包，構築掩體。

戰爭的本質，或許就是野蠻罷！

挨餓忍死

日軍砲火的猛烈還給國軍帶來吃飯與傷兵的困擾。當時部隊作戰全靠大鍋子做飯吃，燒火則是用稻草。上海秋季多雨，稻草一濕就點不著，做飯本來已有困難。加上制空權操在日軍手裏，



上海秋季多雨，日軍在雨中行軍。



制空權操在日軍手裡，他們的觀測氣球一早就高掛空中。煙火一冒、紅光一現，立刻引來砲擊。

他們的觀測氣球一早就高掛空中，煙火一冒、紅光一現，立刻引來砲擊，飛機也會循跡而至。弄到最後，國軍白天根本不敢舉炊，只能等到黃昏以後。做好送到陣地裏，往往已是夜裏十點，飯都凍起來了。但這樣的飯，火線上的部隊最多也只能在黃昏及天亮前各吃到一次，有的甚至一天只有一頓飯吃。

同時各部隊因為怕做飯的地方挨了炸，所以相率把廚房擺到遠後方去，結果又產生沒人送飯的問題。軍中沒有額外的閒員，做好的飯只能教炊事兵來送，但這些人又不曾受過軍事訓練，爲了送飯而和飯一起被砲火毀滅的，不在少數。前線還因而發生饑饉的現象。

據當時的十八軍軍長羅卓英回憶：曾經有統計，火線上餓死的士兵比戰死的還多。因爲飯送不上去，士兵身上又沒有帶乾糧，幾天幾夜沒有飯吃，不餓死還待如何？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雖然建議烙大餅作乾糧，但是大餅硬，啃不動，大家還是經常枵腹對敵。最後紅十字會長熊希齡又建議做「光餅」，效法戚繼光，製作一種中間有洞的圓餅，讓士兵們用繩子穿著，掛在脖子上當做乾糧。但爲時已晚，也沒能幫上忙。

此外，隨著戰事的持續，傷兵的醫療也成了問題。當時部隊多數沒有醫務人員，更沒有包紮所，連擔架隊都寥寥無幾。而砲火猛烈，衛生人員白天也不能上火線。因此官兵們受傷後，只能任其躺在戰壕或農舍裏，敵人機砲的掃射轟炸就顧不得了。傷員往往由輕傷變成重傷，甚至死亡；幸而不死的，也是沿途流落、自生自滅。

加上許多部隊都打光了，所屬的傷兵更是只能聽天由命。教導總隊的排長劉庸誠在作戰時，



戰場衛生極差，日軍還特設「防疫給水班」提供飲水。

經過幾間破爛的農舍，發現一位軍官帶著幾名傷員躺在那兒。據說他們的部隊剩下沒有幾個人，撤也撤不下去了。那時，一名健全的士兵想要下火線，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傷員後送呢？即使傷兵自己爬下火線，後方也缺乏醫療與後送的能力。鐵路白天挨炸，夜裏才能修，好不容易搶修通車了，傷兵仍然運不完。馮玉祥記載了一則故事，說幾個重傷的連長，從上海爬出來上了火車，一路到達南京下關，六天六夜沒換藥。到了車站，見有人來，含怨地說：

我們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連口水都喝不著。你們把我們槍決了，比這樣活著還好。

醫院裏的情景同樣慘不忍睹。稅警總團的營長胡英傑負傷以後，住在法國租界的醫院裏，鄰近樓下手術間：

時間鋸腿、斷臂等無數傷患，哀號楚鳴，鮮血淋漓。每日堆集腿、臂一大堆，令人不忍卒睹。

與水奮戰

除了挨餓、忍死，參戰的官兵還必須時時刻刻與身邊的「水」奮鬥。上海附近一片平野，無處藏身，最佳的掩蔽地點就是密布的溝汊和水田。同時戰區近海，地下水位高，隨便挖個工事，就會有水冒上來。加上正值雨季，秋雨連綿，一公尺的戰壕經常積上半公尺的水。所以部隊可說是終日與水為伍，泡在水裏連續作戰一個星期，毫不稀奇。將士們衣褲盡濕、著久自乾，連日常的漱洗也全免了，虱子滿身滿頭也不覺身癢。互月棲息在泥濘腥污之中，早已不知睡眠為何物，人人兩眼通紅、雙腿麻痺，還得不斷監視前方、準備肉搏。當時由於環境惡劣、飲食不潔，重以醫療缺乏，許多人就這樣被霍亂奪去了生命。

「水」所造成的困擾，還不只個人身心而已。陣地裏泥濘滿布，土木工程根本修不堅固。掩體裏既缺乏可供建構的木頭，又沒有牢靠的支撐，一旦遭到砲火擊中，官兵砸壓在下，非死即傷。戰壕底部冒水，不堪深挖，只好加高胸牆，稍補不足；但構築過高，又暴露位置，招引攻擊。

戰鬥中，戰士身上、手上沾滿泥土，有時連槍機都打不開。有些老兵在泥水溝裏待不住，乾脆就趴在壕口射擊，因而導致傷亡。當時兵站統計：整個戰役期間，每天平均要收容傷兵一萬名，絕大多數都是被槍、砲彈的碎片殺傷。原因就在地下水水位過高，掩體很快就變成小水井，無法久



最後，連日軍的砲彈也打到補給困難了。十月十五日，日軍竟企圖以「火箭」攻擊國軍陣地，結果被新聞單位蓋上「不許可」的檢查章。

待。而官兵又沒有鋼盔之類的防具，全身暴露在地面上，才造成這樣的傷亡。

戰場上，兩軍前沿密接，相距只有二、三十公尺，彼此說話都聽得清清楚楚。無論誰露出了目標，立刻就是一陣槍風彈雨，真可謂生死俄頃。而爲了厚積戰力，國軍強調縱深配置，以防敵人穿突。因此每個師的作戰正面都不過兩公里多。大家前後重疊，陣腳雖然穩固，但在密集炸射之下，傷亡也相對增加。

最後，連日軍的砲彈也打到補給困難了，就試圖向前挖壕溝，朝國軍陣地慢慢逼近。國軍也用綁腿帶子把手榴彈捆成一束一束，往這些壕溝丟去，來阻止他們。這樣的鏖戰從九月十一日打到十月二十日，總計四十天之中，國軍陣線只由東向西，讓出了五公里而已。

戰況儘管慘烈艱苦，參戰部隊的士氣還是高昂賁張。川軍一三三師九月底開到鎮江，正在候車。爲了要上火線，部隊發餉。第二天，團長陳親民就看見士兵們一手拿著膠鞋、一手提著滷肉，談笑而來。問他們：昨天才發

的餉，爲什麼不到上海再慢慢花？得到的答案是：

上海的情況，團長是知道的。我們大家抱定決心，吃好穿好，與敵人拚命。

滬戰像是一座熔爐，焦煉著兩軍官兵。

第五章 八百壯士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於後方大場鎮失守，上海市區的國軍放棄了堅持兩個多月的陣地，開始撤往蘇州河南岸。夜裏十一點多，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第一營營長楊瑞符接到團長韓憲元電話，冒著砲火抵達設在「上海北站」的團部。肅立了二十幾分鐘，團長卻一言不發。這時團附謝晉元神情緊張地從外面跑進來，遞了張紙條給他，原來是師長孫元良的手令：

著第五二四團中校團附謝晉元，率該團第一營（加強）楊瑞符部，於本晚先在北火車站附近，佔領掩護陣地，掩護師主力轉進後，迅速進入四行倉庫固守待命。

這就是後來名聞遐邇的「八百壯士」。

老兵犧牲殆盡

從羅店開始的陣地戰，打了四十天，對於國軍來說，代價太大了。戰況空前慘烈，每天總有

幹部和兩三成老兵勉強支持。

精銳部隊損失的慘重，和當時的「撥補」制度也有關係。這項制度據說是陳誠建議的。他認為有作戰經驗的部隊不要常換防，傷亡重大時，寧可在夜間將新到兵員送上前線，不要把整個部隊撤下整補，以免換防時發生狀況。這樣還可以盡量保留老兵，幫帶剛上陣的新兵，確保經驗的傳承。所以幾支勁旅三個月間都是無日不戰，始終在第一線上，所受的損失自然也比別的單位大了。

除了精銳斃喪之外，國軍還面臨另一項困難，就是兵源的不足。國軍慣例，兵員是由各部隊自行募補，一直要到民國二十五年中央才開始設立師管區，辦理役政。所以大戰一起，國軍馬上遭遇到兵員補充的問題。臨時徵集的役男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根本不能上戰場，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從後方部隊或各省保安團隊抽調現成的官兵了。



從羅店開始的陣地戰，打了四十天，對於國軍來說，代價太大了。圖為戰時閩北的斷垣殘壁。

數以萬計的官兵被擡下火線，部隊也始終得不到喘息整頓的機會，一上了戰場就只有全部犧牲。這樣撐到十月中旬，國家珍貴的精銳部隊十之八九都已經調了上來，甚至消耗殆盡了。像首義部隊的八十八師，參戰以後雖然補充了六次，但所剩的兵員還是不到原額的三分之一。新兵大半未經戰陣，有些連槍都沒放過，只能靠著

今天我們從檔案裏，還可以看到當初國府抽調範圍的廣泛。八月十八日，開戰的第六天，蔣委員長就分電鄂、湘、贛、浙、豫、陝各省主席：

希即抽調保安團及各師體格最精壯之老兵五千名，限十日內運京補充前方缺額。

到了九月九日，由於前線的損耗太大，蔣又遍令川、黔、陝、甘、豫、鄂、浙、湘、閩、贛各部隊：每師抽選老兵四到六營，其中戰鬥兵必須挑足兩營；各獨立旅抽選二到三營，戰鬥兵必須挑足一千名，以資增援。即使當時的「整編師」，戰鬥兵也只有十二個營，所以每師抽選兩營，至少就是六分之一以上戰力的釋出了。

此外，隨著犧牲的增加，部隊的抽調也變得極為急迫。蔣曾經爲了粵軍六十六軍葉肇部補充兵員的問題，致電廣州綏靖主任余漢謀：

……惟陣地戰傷亡極大，葉（肇）軍補充官兵，請兄從速籌備。務於留粵各師中抽調每師老兵一千二百名，分批運滬。一個月內，每星期運送三千名到滬爲要。

但命令下達不久，或許因爲前線傷亡太快，補不勝補，蔣又改變了主意，要余「再調三師來京增援」：

余主任勛鑒：此次抗戰，凡參戰部隊死傷皆在半數以上。我六十六軍以奮勇挺戰，犧牲甚

大。……兵員缺額太多，遠道補充不易。中（正）意由粵再調三師來京增援。……中央同人以兄部精強，急望多派部隊參戰，為我黨國增光……。

兵源的困窘，躍然紙上。

這樣應急而來的兵員，自然良莠不齊。好的，像由湖南保安團補充來的老兵，因為平日省政府有準備，訓練很久、能打仗，立即可以上火線，表現也很沉著。但是差的，也會像稅警總團第五團團附勞聲寰所碰到的：

上面調八百名各省的緝私隊隊員來增補。這種隊伍比警察都不如的，不能打仗的。名額足足八百，但沿途逃亡，帶到的不到三百。最荒唐的是，帶來的那個連長交出隊伍以後，回頭就跑。這是臨陣脫逃，死罪。為了維持軍紀，我立即開槍格殺。這才把帶到的部分穩住。

這麼大量的徵發，使得全國有經驗的老兵差不多都犧牲在這裏了。老兵的損失，要比帳面上各單位的傷亡，更影響到戰力的發揮。戰役到了末期，不只參戰的，乃至於全國的部隊裏，「老兵」——或者更廣義地說，「有作戰經驗的人」——都折損得快光了。這就給接踵而來的南京保衛戰，種下了悲劇的種子。

中下層幹部的損失

除了老兵的消耗之外，中下層幹部的損失，也是戰力的隱憂。這主要是由於士兵們訓練不足，臨陣容易退縮，如果沒有軍官親臨火線，在場監督，就不能死守陣地。所以中下級軍官往往負傷以後，還得勉力指揮，以隱住陣腳，最後遂致犧牲。桂軍一七〇師的團長沈治雙腳中彈：

我見情況危急，親往督戰，激戰中我兩足負傷，第三營陣地被敵佔領，第一營陣地後移。當時的情況，若我因傷脫離陣地，則第一、三兩營陣地恐不能守。敵人坦克一輛距我不過三百米左右，我如要人背負，目標顯著，亦難脫離敵人的火網。遂決定暫時不下火線，一面包紮傷口，一面交代……以特務排監督前線官兵，一律不准後退。就這樣支持到天黑後，我才由特務排黎排長背下火線。

當時因為防禦工事不牢固，官兵又不能擅自後退，所以都只有拚死與陣地共存亡。西北軍第三十二師進入陣地時，原本有十五個營、八千人左右。一上去就遭遇日軍總攻，四十八小時時間，營長以下軍官犧牲殆盡，八千名戰鬥兵也損失了三千五百，「陣地失守，幾被全殲」。湘軍第七師某團進入陣地十四天，三位營長陣亡了兩位，十五位連長傷亡了十四位，全團士兵生還的，只有五百七十三人。



桂軍的敢死隊。和「中央軍」的德式裝備不同，桂軍採用的是英軍裝備。士兵胸前是棒狀手榴彈的木質握柄。此為稍後在台兒莊戰役時所攝。



指揮桂軍進行反攻的副參謀總長白崇禧。

戰役期間，每個師每天總要遞補好幾個營、連長，有的步兵連甚至打到只剩三、五人。而補充來的人，爲了避開白天日機的轟炸，都是夜間送達連隊，立即加入戰鬥。有的剛上去就負了傷，擡進醫院還不知道自己所在部隊的番號。有的則連符號都沒來得及發，就陣亡了，姓名都不知道，戰爭結束後，家屬們撫恤也沒拿到。

反攻的失敗

由於長期的消耗戰，國軍深感難以爲繼，所以決定利用新到戰場的桂軍十個團，在十月二十一日夜裏組織一次反攻，以扭轉頹勢。

這項攻勢醞釀很久，早在九月間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就來過上海幾趟，和張治中商討反攻事宜。

戰前桂軍是誇張的，那時以兩廣爲中心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對南京中央始終意見不斷，所以「桂軍」在國內也是獨樹一幟：有自己的兵源、自己的裝備、自己的服裝、乃至自己的番號。這次開來上海作戰，自然不免有藉此舞台，和「中央軍」別別苗頭的意思。據說廣西「某將軍」——可能就是白崇禧——率領桂軍五個師到達上海，視察前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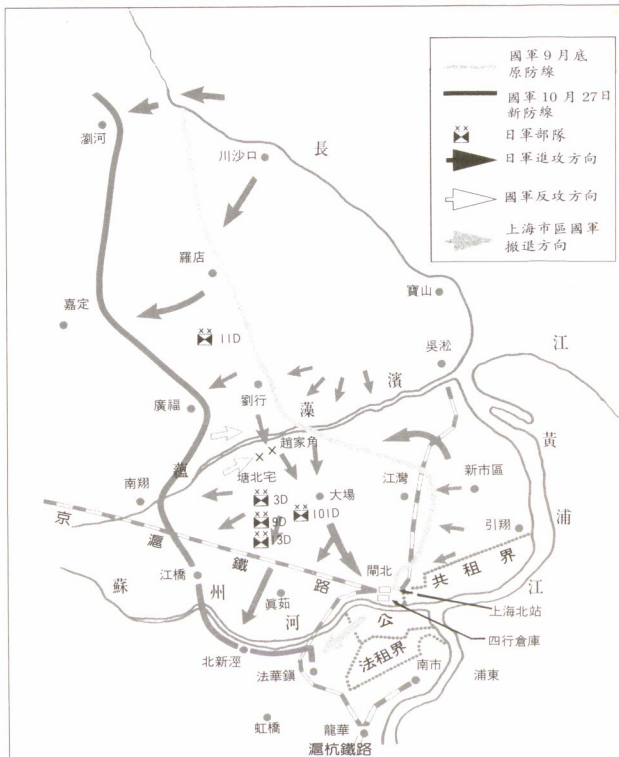
以後，信心十足地誇下海口：

羅店只有我才能把它拿下來的。

原先白的意見，是想等他麾下的廣西部隊集結完成，再從北翼向日軍側面出擊。但是由於戰線延伸很快，新攻勢進入具體規畫時，國軍北翼已經到了長江，南翼也靠著黃浦江岸，無從再迂迴側擊了。最後計畫只能做「中央突破」的打算。但中央突破首須空軍和砲兵的協助，以壓制敵人；還要有工兵開路，掃除障礙。這些國軍都付之闕如，不但缺乏空優，戰車、火砲的數量也不足。其次，中央突破必須選擇敵軍最脆弱的部位切入，力求突破面集中，才能一舉殲敵。所以本來計畫是要等桂軍集結完成，再相機出擊。後來卻因戰況緊迫，無法久延，而把作戰目標匆促改成乘敵軍疲憊之際，突予逆襲，以求擊破其蘊藻濱南岸的橋頭堡。整個行動就變成雙方主力的頂牛，這對於劣勢裝備的國軍，自然是要吃虧的。

另外，國軍在參謀作業上，距離現代化太遠。選定夜間反攻，卻不知道白天先做偵察；上級也沒有控制有力的預備隊；部隊剛剛到達，不遑喘息便受命出擊。這些都成爲後來失敗的原因。

最後，桂軍本身沒有現代戰爭的經驗，意氣太盛，衝鋒時很勇敢，但無持久力。不熟悉進攻的技巧，只是靠著莽勇和血肉之軀暴虎馮河，自然犧牲大而收穫少。當時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長戴笠就曾密電蔣委員長，說桂軍一七三師賀維珍部「意氣高傲」：



圖六 國軍蘊藻濱反攻及市區撤退(民國 26.10.1~27)

一七三師戰鬥力甚強，紀律亦佳。惟意氣高傲，對於友軍尤不可以切聯絡。近該師左翼之五十七師派兵往取聯絡，反而發生誤會。又：該師自擔任陳家行之線以來，僅注意敵進攻時之出擊，而忽略防守時之工事構築……。

所以攻勢發起以後，桂軍上下雖然力戰，但人力終非機械之敵，大砲、輕重機槍所構成的火網，不是單拚刺刀、步槍就能加以突破。官兵犧牲雖大，取得的代價卻不多。事後，南京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還對人說：「這些人不知道現代戰爭，只憑一股勇氣，拿著刺刀向坦克衝鋒，自招死亡，不敗何待。今後訓練部隊、指揮作戰，應當切戒。」

大場失守

十月二十一日晚上九點，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對攻擊部隊下達指令：

本戰區以擊破蘊藻濱右岸敵軍之目的，決由蘊藻濱兩側地區轉移攻勢。

這是國軍在上海戰場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豪賭。當晚，擔任主攻的十個團，分三路進擊，新到戰場的桂軍兩個師，更是精銳盡出。

然而一夜的戰鬥下來，進展並不如預期。許多部隊在夜暗中迷失了方向，和自己人打了起來。



十月二十五日，大場鎮終於失守。

拂曉以後，又遭到日軍砲火的側擊，部眾潰散。士兵們缺乏經驗，常把敵人的煙幕誤認為毒氣，自相驚擾，見煙就逃。而各級指揮官手中又都沒有預備隊，後繼無兵。結果雖然有一路曾將目標收復，但因河流交錯，不敢深入，最後只好撤回。其他幾路則完全沒有成果。

反攻的失敗，使日軍得以利用國軍出擊受挫所造成的心理震撼，大舉反撲。二十二日，大場鎮爭奪激烈，蔣委員長爲了確保市區後路，竭澤而漁，將可用之兵掃數派上。一時之間，在杭州灣守備的十八、十九、二十六、三十三各師，在後方休整的第三、五三各師，在北翼的十一、十四各師，以及在太倉的十五師，統統奉到嚴令，增援前線。

但是這些部隊的加入，不過讓戰局穩定了片刻，「數日以後又感危險」。大場被圍，負責防務的湘軍第十八師正面過廣、兵力單薄，陣地遭

到突破，師長自裁。二十五日，大場終告失守。這時國軍已經無力恢復，只好在二十六日黃昏，下令全線轉移：

本軍以達成持久抗戰之目的，除以一部據守鐵道沿線附近諸要點外，將南翔以東陣地逐次轉移於吳淞江南岸。

當晚，上海市區守軍紛紛西撤，放棄了堅守七十五天的閘北、江灣據點，退往蘇州河南岸。混亂中，卻有一支部隊逗留不去，乘著夜幕，悄然自上海北站南移到毗鄰公共租界的「四行倉庫」。天亮以後，他們就將變成全國民眾關注的焦點——「八百壯士」。

「孤軍」獨留

「八百壯士」與四十一號女童軍楊惠敏死獻旗的故事，是多數中國人從小耳熟能詳的英勇事跡。可是「八百壯士」為何會在大軍撤離之際，單獨留駐下來？這個問題卻似乎被人所忽略。當初由於事涉敏感，各種報導相當分歧。例如事後負責收容他們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那年的《年報》裏就只說：

北蘇州路某堆棧內曾駐有華軍一營，即嗣後報紙所稱爲「孤軍」者。在長時間之抗禦後，

准其進入公共租界，並由英軍解除其武裝。此項進入界內之軍人由本局擔收容，至戰事結束時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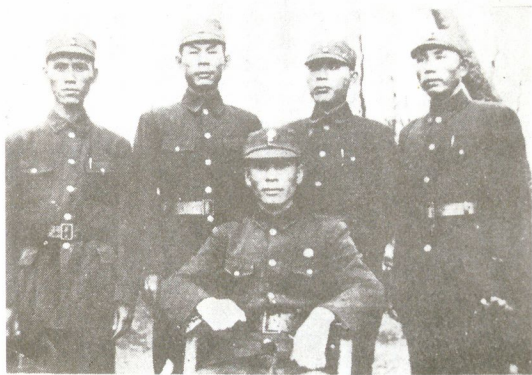
語焉不詳，似乎是有意避開這項話題。而國軍撤退後的第三天，十月二十九日，上海《立報》則報導：

孤軍一營屬八十八師××旅××團，「八一三」的一天最先開入開北，……到二十六晚上，奉令擔任掩護右翼撤退。……前晨四時，右翼撤退完畢，該營以等候撤退命令，與全軍失卻連絡。該營×百多人，即以四行倉庫爲保衛開北最後的依據，與敵作最後抗爭。

意謂「孤軍」獨留，是基於「掩護撤退」的戰術性考量，但由於戰場上的偶然，連絡斷絕，才不得不留置下來。這種說法後來變成最常出現的標準解釋。但是，「孤軍」的產生，真的是偶然嗎？事實上，上海當地報紙《申報》在稍後十月三十日所刊出的〈謝團長上孫師長函〉，已經否定了這種說法：

師座鈞鑒：竊職以犧牲的決心，謹遵鈞鑒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全達到任務前，決不輕易犧牲。成功成仁，熟計之矣，決不有負鈞座意旨，偷安一時，誤國誤民，負鈞座付託之重。

「決不有負鈞座意旨」八字，就說明了「八百壯士」的留守乃是奉命行事。而且二十六日當晚孫



留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與所部合影。



謝晉元的師長孫元良，影星秦漢的父親。

元良下給團長韓憲元的手令，是指定該營在「北火車站」執行掩護任務，待任務完成，再進入倉庫。可見留守四行並不是爲了「掩護撤退」之類的戰術性理由，而是別有目的。

任務是經過設計的

這個目的是屬於戰略層面，並且是和整個上海作戰的目標相接合。當時擔任軍委會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處長的文強，在撤退前夕去見戴笠，戴笠要他到宋子文公館領西門子電話機：

……請你親送四行倉庫交謝晉元團長安裝好，這部電話機既可以通外界，也可以與我直接聯繫。老頭子（指蔣介石）忙，但要隨時了解四行倉庫守戰的情況。與我聯繫好，也就是隨時都可稟報校長了。

說完便催他趕快去辦。

文強的工作說明了，整個留守計畫是由蔣委員長親自主導，而且是經過設計的。所以還特別勞動情治單位架設電話，以便將「守戰的情況」直達天聽。一般性留守任務是不可能如此辦理的。所以要了解「孤軍」獨留的目的，必須由他們受命的過程開始。

孫元良的回憶說，十月二十六日當天早上，顧祝同打電話轉告蔣委員長的意思，要八十八師全部留在市區，死守上海，問孫的意見如何：



上海北站。「孤軍」先在此處斷後，才進入「四行倉庫」。

我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爲什麼呢？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就願意留在閘北，死守上海。最可慮的是，我們孤立在這裏，於激戰之後，幹部傷亡了，連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

這裏透露出，最早被安排來留守的，不只是一個營，而且是一整個師！以當時的態勢，大場防線既遭突破，上海市區已在重圍之中，留守無異請君入甕。八十八師又素稱精銳，是中央嫡系中的佼佼者，蔣竟斷然以之行險，足見這次任務的不尋常。

由於是蔣委員長親自指定的任務，而孫元良又不同意，於是孫的參謀長張柏亭就奉命前往顧祝同的司令部，進一步「面報種切」。結果顧當面說明了留下部隊的理由：

大場情況變化後，閩北陣地側背完全暴露，必須調整態勢。但「國際聯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爲。所以，委員長有意要貴師繼續留在閩北作戰，把一連、一排、一班分散，守備市區堅固建築物及郊區大小村落，寸土必爭，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並相機游擊，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

因爲事隔多年，張柏亭的這段回憶出了一點錯誤：在十一月初召開的是《九國公約》會議，地點是在布魯塞爾。日內瓦的國聯大會早於十月六日就閉幕了。但無論如何，他點出了一項重要事實，那就是「孤軍」們犧牲奮鬥，爲的是「政略目的」，要把上海戰場的實況，帶到會場去：

……委員長訓示的是政略目的，是要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爲。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

把戰況帶到會場

這樣的「政略目的」，蔣委員長在「孤軍」獨留的第二天，十月二十八日，就對著蘇州河前線的將領們，親自作了解釋：

我相信我們如過去的一樣犧牲，持久抗戰下去，國際正義必然伸張，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們。

……我爲什麼還要留第八十八師五四團一團人死守閘北？外國軍人看見我們這一團人孤立死守，危急萬分，發出人類的同情，就力勸我們官兵由租界安全退出，但是我們官兵以未奉命令，謝絕友軍的勸告，寧願死守不退！這就是表示我們中華革命軍人的精神：有了一個根據地，非得命令，就該效死勿去，與敵人死拚到底。使各國人士知道我們中國軍人已有爲主義而戰、爲衛國而死的程度和精神。

「使各國人士知道我們中國軍人已有爲主義而戰、爲衛國而死的程度和精神」，這種想法正和他告訴唐生智的「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相接軌，都是希望經由死戰，來展示一下中國抗戰的決心與毅力。特別是在《九國公約》開會的這段期間，戰場上更需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才能在會場上爭取到有利的發言地位。

而做爲「展示」的戰場，「四行倉庫」確實是個能夠讓人印象深刻的選擇。它的位置正好在蘇州河的北岸，過了新垃圾橋，對面就是公共租界。女童軍楊惠敏回憶當時戰場的情況說：

……不過敵人似乎不敢過分亂放槍砲，因爲隔蘇州河對岸英租界裏聳立一排大汽油坦克，一顆子彈飛錯方向，全上海市民連日本人不例外，都要遭受禍殃！

這一排「大汽油坦克」，實際指的是樹立在新垃圾橋南堍，距離四行倉庫不過數十公尺處的巨大

煤氣筒。可以想見，一旦這一排煤氣筒遭到誤射，租界內數萬居民的生命財產就有毀滅的危險。所以在「孤軍」死守的四天當中，租界工部局一反過去態度，積極介入協調，要求國府撤退守軍，其來也是有自。

其實，類似「孤軍」這樣的作法，在往後的日子裏，還曾經有過翻版，只是都不如謝晉元團這麼成功罷了。根據當時舊皖系五十五師一六五旅三三〇團團長焦長富回憶，十一月上旬，當日軍金山衛登陸成功、國軍準備撤往「國防線」之際，所部奉命留守南市，並得到暗示，「必要時可退入法租界」：

……但蔣介石以為敵人未到之前，如將首都門戶和外僑聚集的大都市上海撤得不剩一兵一卒，未免有失聲譽。於是作出「寸土必爭」的號召，要求不惜犧牲一部分兵力作最後掙扎。乃指派第五十五師第一六五旅旅長張彬率我團……協同蔡勁軍所部的上海保安隊，固守南市，並暗示必要時可退入法租界。

但在苦戰兩日之後，該團傷亡慘重，任務最後以撤入法界落幕。

所以，要正確地詮釋「八百壯士」，只有把他們放回「上海戰役」這個大背景裏頭，才能瞭解其中的意涵。原來他們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所背負的使命，正和那三個月間陸續趕來的六十幾個師一樣，都是爲了實現「政略」目的——或者，更精確地說，是爲了《九國公約》會議。這項使命，驅使了百萬國軍，死守上海，遲遲其行。

第六章 九國公約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國軍退守蘇州河南岸以後，蔣委員長親臨前線訓勉將領，強調《九國公約》會議是「最大的一個關鍵」：

……這次《九國公約》會議，就是最大的一個關鍵。我們相信各國對我國同情，不管是成分多少，總是於我們是有利的。……要知道：美國因為我們堅決的抗戰，所以羅斯福才有重要演講，國務院也奉旨發表宣言，然後才有《九國公約》的重要會議。我們希望由此促成各國共同干涉日本的侵略暴行，使敵人處境日益孤立，成為世界的公敵。所以我們為要達到此一目的，我們只有繼續的犧牲、死守陣地……。

原本是要撤退了

這段訓話發表之後十五年，民國四十一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其昀在撰寫《黨史

概要》時，留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

二十七年二月間，總統檢討時局，曾謂：或以爲，去年最大之失著，當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時，我方不即退兵於「蘇嘉障地」，而乃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招致以後之失敗。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可在比京開會的九國會議上與敵言和云云。吾意不然，各國欲調解之意雖切，但無實力，空言何補？且日本獨霸東亞之妄想，至死不休，我國雖欲苟安，其可得乎？

這裏所謂的〈芝加哥演說〉，指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五日所發表的〈隔離演說〉（“The Quarantine Speech”）。這篇措詞強硬的演說，一度鼓舞了全世界憂心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張其昀指出，在演說前後，曾經有人主張，應該趁著這波反侵略高潮，把部隊拉離上海戰場，退往「國防線」，以便安排雙方停火。但蔣委員長力排衆議，堅持死守，認爲：「各國欲調解之意雖切，但無實力，空言何補？」

但這段曲折，在海峽對岸，「投共」的前國府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口中，卻是另外一付模樣：

大本營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作戰組組長劉斐曾向蔣建議，上海會戰應適可而止，及時向吳福線既設障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擊敵人，和保護自己的戰鬥力。十月初旬，蔣介石採納了

這個意見。對前線各部隊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都已下達，前線已開始執行。

換句話說，當十月初旬，羅店、劉行相繼失守，日軍猛攻蘊藻濱之際，國府內部其實是有撤退的成議，蔣也已經同意了。只是到了第二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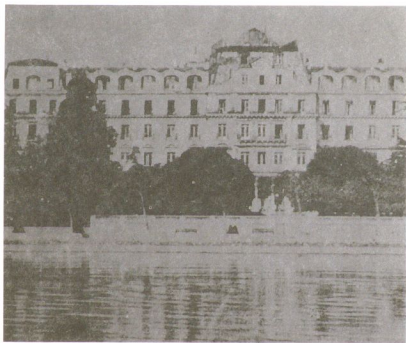
但在下達轉移命令後的第二天下午，蔣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緊急會議，說根據外交部的意見，《九國公約》國家正在開會，只要我們在上海能夠繼續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可能會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隊仍在原陣地死守。當時，白崇禧、劉斐表示反對，認為既然已下達轉移陣地的命令，各部隊已經開始行動，在敵人的強大壓力下要部隊再回原陣地，一定會引起混亂，結果將不可收拾。蔣介石堅持不肯，說他可親自赴前線說服各部隊。於是他當天晚上就赴前線，並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

結果是蔣自己爲了在《九國公約》會議上，爭取制裁日本，才改變決策，要部隊重新回防的。這件事情，當時在工兵學校擔任教官的黃德馨也有印象：

在十月上旬，因前線部隊傷亡甚重，難以堅持，將向吳福線永久陣地轉移。長官部遷往蘇州後不久，又遷至無錫。當時準備待前線部隊到達吳福線永久工事後，再指導工兵構築需要補充的野戰工事。後因長官部作戰決策突然改變，令在撤退途中的部隊重返原陣地……。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參加「國聯」第十八屆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合影。前排中坐者為團長顧維鈞，其右為錢泰，其左為郭泰祺。



九月十二日，中國政府正式向「國聯」第十八屆大會提出申訴。圖為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

這裏所說的「長官部」是指願祝同的戰區副司令長官部。當時爲了因應國軍撤守，副司令長官部還一度搬到了無錫，但是因爲「長官部作戰決策突然改變」，才又再遷回蘇州來。

然則，《九國公約》會議有何重要性？爲何國府要死守上海以待會議結果？且先讓我們細說從頭，《九國公約》開會的因緣。

公約會議的召開

《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開，是基於國聯大會的決議。滬戰發生後一個月，九月十二日，中國政府正式向國聯第十八屆大會提出申訴，要求按照《國聯憲章》的第十、十一及十七等三條，處理中日糾紛。其中第十七條是針對「非會員國」而設計，因爲日本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就已退出了國聯。條文裏規定：如果受到指控的非會員國接受邀請，出席國聯的會議，則一切義務比照會員國；如果不接受邀請，繼續對會員國作戰，就將適用《憲章》的第十六條，實施制裁。

中國方面一開始對於這樣的申訴，其實並未抱持太大的幻想。因爲自從日本退盟以後，國聯的奈它無何，早已昭然若揭。加上前一年阿比西尼亞問題，國聯制裁義大利失敗，各會員國更是一聞「制裁」之名，就紛紛掩耳。所以中國政府真正訴求的所在，是希望國聯能夠正式昭告，日本爲一侵略國。這樣一來足以振奮世界輿論，讓世人注意到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二來藉以取

得國際法上的立足點，等到情勢的發展允許某些行得通的措施時，就可以有所依據。

然而這麼區區的希望，還是沒有得到實現。因為英、法的注意力都已被西班牙內戰所吸引，同時歐洲風雲日緊，兩國也無力再在遠東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

當時幾個「大國」之中，對於中日糾紛還使得上力的，只剩美國。所以打從中國提出申訴開始，英、法就千方百計想把美國拉進這件事情裏頭來。礙於美國不是國聯的會員，不參加國聯大會，因此中國的申訴案很快就被轉到「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上去。這個委員會是「九一八」以後，由國聯的二十幾個會員國加上美國所組成。轉到這裏來的目的，自然是爲了方便美國參與的原故。

但是居於關鍵地位的美國，這時卻也表現出消極的態度。國內輿論因爲世局惡化而傾向「孤立主義」，羅斯福的眼光也都集中在歐洲事務上。所以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明令出席委員會的代表：美國決定在國聯達成結論之前，維持置身事外的政策。也就是說，要做什麼事，請國聯自己帶頭，美國只能隨後跟進。把皮球一脚又踢回給國聯。

這樣子互踢皮球，會議自是難有厚望。十月四日，「諮詢委員會」提出決議案草稿，內容空洞貧乏，只呼籲給予中國精神上的支持，避免任何造成削弱的措施。至於制裁日本的問題，則隻字未提。甚至在譴責平民轟炸之時，也不肯明指，進行濫炸的是日本軍機。中國代表就此，逐字逐句力爭一天一夜。英法兩國也頗感不好收場。

突然，英國代表克蘭波(Viscount Cranborne)提出建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

此議一出，頓時「像從天而降的炸彈」，會場氣氛變得極為尷尬。因為美國是《九國公約》的原初發起國，一旦會議召開，美國自然責無旁貸，不能再置身事外。所以這項提案擺明是要「把燙手的山芋扔進《華盛頓公約》的籃子裏」，硬塞給美國。因此美國代表哈里森(Leland Harrison)最初對於此議，期期以為不可。最後經過商定，將來決議案不會對日本動武或實施制裁，才勉強表示接受。

稍後，因為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會場散發羅斯福第二天將要發表的〈隔離演說〉全文，會場氣氛霎時一變，以為那是美國外交政策行將轉變的徵兆，於是在十月六日，通過了兩份語氣遠比草稿嚴厲的決議文。第一份明言日本軍事行動的規模，「與引起衝突之事件，殊不相稱」、「違背日本在《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下，所負之義務」。第二份則判定這次衝突「非僅由中日兩國政府採用直接方法所解決」，而決議「邀請簽訂《九國公約》之國聯會員國，於最早時期開始此項商討」。決議案通過之後，國聯隨即休會。

國府寄予厚望

國聯大會這兩份決議文和羅斯福的〈隔離演說〉，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很大的迴響。輿論一時對於國際合作制裁日本、以及《九國公約》會議的成功，寄予了厚望。因為從「九一八」以來，中國方面就屢次要求，希望美國能夠出面，召開這樣一個由太平洋各關係國共同參與的會議，來



被中國視為「解決中日問題一個最難得的機會」，《九國公約》會議布魯塞爾開會的情形。

解決中日糾紛，卻一直沒有下文。這次趁著羅斯福發表強硬演說、全世界一片反侵略高潮的機會，《九國公約》會議竟然開成了，政府乃至民間自然沒有不引頸而望的。蔣委員長當時在「國防最高會議」裏講話，就稱這次會議為「解決中日問題一個最難得的機會」：

……這次會議，乃是我國運用國際力量，根據《九國公約》的精神，來解決中日問題一個最難得的機會。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屢次設法促開這個會議，都沒有成功，現在能夠開會，實在是我們在國際外交上艱難奮鬥的結果。……根據我國的立場，無論大會環境如何困難，我們應該協同各友邦，盡力促其成功，使《九國公約》能夠發生實

效。即今日本抗然不顧，要破壞這個公約，使會議沒有結果，我們更要促使各國，為維持條約的尊嚴，來共同制裁日本。這才符合我國在國際外交上一貫的立場。才是我們對《九國公約》會議所應取的態度。

而各方傳來的消息，同樣顯示制裁非不可期。駐美大使王正廷就抱持極為樂觀的看法：

美總統演說，全（美）國響應，中南美各國亦均贊助，……照廷觀察，美國在《九國公約》會議將主張「先禮後兵」，先設法調停，不遂，與各國採取制裁方法……。

連近在歐洲的駐德大使程天放，一開始也都以為，各簽約國即使不肯援助中國，至少也會主張公道。後來才發現錯了：

《九國公約》會議開幕以前，政府和人民對於它自然都有一種期望。我在柏林聽了德國外交部 and 外交團的意見後，雖則不存太大希望，然而總覺得日本的侵略行爲，完全違反《九國公約》的原則，簽約國家即使不肯以實力支援中國，至少也應該主張公道、譴責日本，給中國以精神上的鼓勵。可是等到我到了不魯色爾，參加了一次會議以後，一切幻想都消滅了。

所以國內輿論與國際現實之間，在這時有著極嚴重的落差。軍事委員會第五部部长陳公博正好奉使義大利，回程在巴黎召集駐歐使節開會。會上說明國內情形：

公博在國內時，感覺調停有望，但到歐洲和各國當局談話，又感覺失望，因為他們態度都不很積極……。

這樣的落差，很容易造成高層的「誤判」。當時國府就把調子定得相當高，希望會議失敗以後，能夠促使各國制裁日本，甚至是蘇聯的武力對日。這一點在外交部發給代表團的訓令中表露無遺：

一、依照當前形勢，會議無成功希望，此層我方須認識清楚。

……

五、我方應付會議之目的，在使各國於會議失敗後，對日採取制裁辦法。

六、我方同時應竭力設法促使英美贊成，並鼓勵蘇聯以武力對日。

影響所及，擔任「國防參議員」的傅斯年，也在這前後寫信給在美國的胡適說：「兩星期中，國外一般空氣之轉移，其速度非大家所及料，尤其是美國。」而強調經濟制裁日本的渴望：

此時國內渴望者是經濟制裁。希望先生向他們說明，我們的抗戰力雖不小，然外助愈早愈好，愈早愈容易也。

可見當時國內氣氛之樂觀，與國人期盼之殷。

上海成了角力場

就由於國府朝野對於《九國公約》會議寄予莫大的期望，所以十月初旬原本準備撤退的上海戰場，又再次堅持了下來。可是相對的，日本方面也心知肚明，上海的能否攻取，和《九國公約》會議的成效大小，有著直接的關聯。如果日軍能在會議召開之前攻下上海，取得全盤的勝利，將可以阻止列強進行干預，抹殺會議的任何動作。所以也在亟謀加緊進攻的脚步。

十月十七日，日本軍令次長島田繁太郎在備忘錄裏寫道，海陸兩軍應該集中全力，優先攻略上海：



力主海、陸兩軍應集中全力，優先攻略上海的日本海軍軍令次長島田繁太郎。

天下的耳目都集中到上海戰事來了。上海戰事的早日成功，不但可以加速事變的結束，還可以對英、美、俄等國的向背，起良好的引導作用。爲了支援打開目前陸軍的苦戰，以保全本事變的成果，海軍應盡全力協助本作戰，海陸一體，來達成此目的。除上海方面以外，暫時摒除其餘，以發動全部航

空兵力，集中於敵國空軍的擊滅、與上海陸戰全正面的支援，為最緊要之務。

這同時，日本報紙也公然鼓吹，盡快攻下上海，以預防中立案的出現。中國駐日大使館報告說：

國民……（原文脫漏）又載：日本應注意上海中立案，謂中國不惜犧牲以保持上海，有提出中立案之決心。日本應迅在上海樹立戰功，以根本抹煞上項事實根據云。

針對日軍的企圖，國府一方面在十月十二日訓令代表團，催促各國盡速召開會議，以求制裁日本；另一方面則定出底線，希望會議能夠先促成停戰。軍政部當時擬定了一份供代表團參考的《停戰問題之考慮》文件，裏頭判斷說：「停戰或短期停戰，於我物質上均較有利，故在有利之條件下自可接受。」部長何應欽也在「國防最高會議」上力陳停戰的必要性。陳公博曾經透露：

《九國公約》會議時，國際調停的聲浪很高。「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開會，軍政部長何敬之先生報告上海戰事，老兵犧牲太大，一時不易補充，子彈消耗太多，也感到缺乏。因此大家贊成接受調停，不過中國希望由英美法蘇出來調停。

所以代表團成員之一的顧維鈞，就曾經多次收到「努力促成停戰」的指示。這些指示不僅來自外交部，也來自當時正在歐洲訪問的特使孔祥熙，以及駐比使館武官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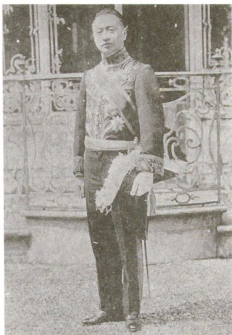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の等待

至於上海戰場方面，蔣委員長則在代表團的建議之下，親自作成決策：繼續死守，以待會議結果。其間的爭論，還牽涉到國府內部人事流派的問題。顧維鈞描述說：

堅守上海的建議、和中國在布魯塞爾代表團的主張，在國民政府和軍界中，對建議是否正確，引起了一場大大的爭論。正如我指出的，政府中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學生，全部都傾向在上海地區繼續抗戰；而許多在國內受訓的將領、和一部分受過日本教育的官員，……他們的結論是：繼續戰鬥只會造成無謂的巨大犧牲。……最後，蔣委員長看到了我們建議的意義和重要性，親自做出了決定，說服其他人也支持這項建議。

所以十月二十二日，蔣發表了通電，要求全體將士，爲《九國公約》會議「加倍奮勵」：

三閱月之惡戰苦鬥，雖犧牲慘重，而復興民族之光明道路，已在艱難黯淡中現其曙光，世界各國之同情，亦隨我奮勇堅決的抗戰而日益普遍。國聯大會有嚴重之決議於先，……比京《九國公約》國會議，尅日即將召集。……當此比京《九國公約》國會議即將舉行之際，敵必傾其全力，以期獲得軍事上之勝利，而轉移國際之形勢。我全體將士尤當特別努力，加倍



建議死守上海，以待《九國公約》會議結果的顧維鈞。

奮勵，使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不能倖倖以逞。且當於此時機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國際地位與友邦同情。

然而，上海的這場角力，國軍已經明顯落在下風。十月二十六日，會議召開的前四天^①，大場失守，國軍被迫面臨撤離市區的抉擇。陳誠回憶當時情況：

當我由大場、走馬塘撤退前後，適值《九國公約》開會。我為增進國際間的同情，原擬在該線死守，後因被迫潰退，無法維持，始轉移到蘇州河。此時我八七D、八八D、一A、三六D、一〇二D等部被敵跟蹤猛攻，損失甚大。因敵亦欲在《九國公約》開會以前解決上海戰事。

由於守軍潰退，蘊藻濱、大場一線實在無法再守，蔣委員長雖心有餘，但力已絀，所以才有了謝晉元團的臨危受命，死守四行倉庫，希望「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本來，陳誠是建議：爲了長期抗戰考慮，應該直接退守「吳福」國防線，以保障南京的安全。但是蔣卻認爲，《九國公約》開會在即，如果能夠守住上海邊緣的滬西、南市兩地，對於國際視

聽仍將有象徵性的意義。於是下令大軍退守蘇州河南岸，打算撐到會議結束，再向杭州方面轉移。撤退當天，還特別由總司令部發布消息，聲明國軍尚未完全放棄上海：

目前我軍之退守新陣線，並不能視作放棄上海。蓋蘇州河南岸全部區域，包括南市在內，以及浦東，均由我軍固守……。

蘇州河戰鬥

國軍在上海兩個半月的血戰，雖然給了日軍相當的打擊，但自身的傷亡更爲慘重。加上補給制度又不健全，戰力自然直線下降。戰前國軍如果編裝完整，一個「師」和日軍「師團」的戰力比，約爲一比三·五，也就是國軍三個半師可以對抗日軍一個師團。但到了市區總撤退之際，由於人員、武器補充困難，多數部隊的戰力都只剩下原有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各師雖然名爲一師，實際戰力已不足兩團，因而總要八到十二個師，才能抵擋日軍一個師團。所以儘管退守蘇州河以後，防線得到縮短，日軍艦砲威力也已減弱，守軍仍難以招架。

同時，由於事前並沒有退守滬西的計畫，臨時又缺乏完整兵力的支援，所以國軍這段時期，只有「坐困愁城」可以形容。當時擔任三十六師團長的熊新民回憶說：



蕪州河戰鬥時期，中、日兩軍都已相當疲憊。

戰鬥到後來，兵力消耗日增，官兵精神上
也感到支持不了。我曾向上級報告了這種實
況，上級再三轉達蔣介石的命令，說《九國
公約》正在開會，有調處的可能。前方如不
能艱苦支撐，在談判上對我不利。務必要我
們咬緊牙關，再艱苦支撐一段時間。

這時，包括陳誠、李宗仁在內的高級將領們，都
向蔣委員長建言，應該撤守「國防線」。副參謀
總長白崇禧也主張，滬上地形複雜、港灣河道縱
橫交錯，作戰宜適可而止。奈何蔣委員長就是不
依。

在一片要求撤守聲中，爲了鼓舞士氣、解釋
政策，蔣在十月二十八日夜裏親自來到蘇州巡
視。面對前線師長以上將領，他再三重申蘇州河
防線必須「死力固守」：

現在我們右翼陣地已移到蘇州河的南岸，這是我們混戰最後的一線，也是我們保護上海最後一條生命線。我們要保有上海，以保持東南唯一的門戶，就要抱定最後犧牲的決心，死守這一線陣地。我們至少要能支持三四個月，始可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操最後必勝之權！

並且指出等待《九國公約》會議，是國家的決策：

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世界各國除了倭寇之外，都要同情我們、贊助我們，我們就以國際形勢壓迫敵人。……目前《九國公約》會議即將召集，倭寇顯已成為舉世所共棄的國家了！如果我們再能維持三、四個月，則我們軍民的精神愈益發揚，我們國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國際對我們的同情，愈益深切，而倭寇武力的破綻、和其野蠻殘酷的暴行，愈益表露於世。則國際形勢的轉變，將更不利於敵人！

然而，就在這時，國軍第一線部隊已經陷入了紊亂的狀態。十月三十日，日軍終於在周家宅、姚家宅兩處強渡蘇州河成功，開始朝左右席捲。十一月五日，當六十七師師長黃維率部上去，增援南岸的八十七師時，後者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無法有秩序地集結撤退了。援軍只好在陣地裏用「見縫插針」的方法填補空隙、進行交接。國軍的抵抗已經見底了。

公約會議的失敗

儘管國府在戰場上望眼欲穿，會場上的希望還是落空了。其實早在英國代表提案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之初，就已經可以看出，這次會議的性質，與其說是為中國提供解決衝突的有效工具，毋寧說是為英、法尋求解套的權宜辦法。所以國聯大會時所表現的相互推諉，很自然地在這次會議上翻版。十月十八日赫爾訓令美國代表臺維斯(Norman Davis)...

比利時政府給我國政府的邀請書，闡明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檢查遠東局勢，研究以和平方式，盡快結束該地區所發生的，令人遺憾的衝突。」你要想到這一點。……：你也要記住，美國公衆輿論已表達了美國不捲入戰爭的決心。

當時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盛行，民衆已經習慣將「制裁」與「戰爭」聯想在一起。所以赫爾強調以「和平方式」盡快結束中日衝突，並表達「不捲入戰爭」的決心，便已意謂了，美國將不考慮以制裁作為手段。

臺維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只好明告顧維鈞：美國的立場是既不能把守大門，也不當帶頭的人。另一位美國代表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甚至表示，不希望中國在會外宣傳，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因為這種說法會給美國人民一種誤解，以為美國代表團在會議裏處處帶頭，負起

了全部的重擔。臺維斯隨即附和，還說事實上英國的表現一直非常好，也和美國一樣，對中國友好云云。

美國態度如此，其他各國也就同理可推了。十一月三日，《九國公約》會議在比京布魯塞爾一揭幕，會場就呈現一片低迷的氣氛，雖曾兩度邀請日本，但都遭到了拒絕。日本政府還在十月二十七日的覆文中語氣強硬地宣稱：

此次中日事變為基於東亞之特殊事態，且與中、日兩國有生存攸關之重大關係。若由對於東亞利害關係不同、甚至毫無利害關係之各國，開會解決，其必反使事態益趨糾紛，而有妨礙正常之收拾，則為帝國所確信不移也。

把兩國之間的衝突，定位成雙方的「私事」，反對國際進行干預。其實這時日軍登陸金山衛的部隊已經動員完畢，隨時準備出發，自然它是不會理睬各國的勸告了。

十一月五日，日軍登陸金山衛，拊擊國軍側背。八日，上海郊區國軍在爲了等待會議結果，而告延誤的情況下，開始撤退。而布魯塞爾的會場裏，各國代表卻還在等待日本對於會議第二次邀請的答覆。中國代表團在十日，國軍全面潰退的第三天，還發電南京，「極盼我軍能固守新陣線，以堅友邦信任」：

日本覆文十二日下午可到，定十三日上午開會。……彼等均以日本既決不來，是會議已仁



十一月五日，日軍登陸金山衛，戰局乃告逆轉。

至義盡，應即商討第二步辦法。彼等雖尚未明言，但據語氣似首重給予我國物質上之援助，並維護海運，以維持及增強我國抵抗力。對日經濟制裁或暫從緩。……今後會議當有重要進展，極盼我軍能固守新陣線，以堅友邦信任。顧（維鈞）、郭（泰祺）、錢（泰）。

然而歷史經已證明，不但國軍沒能固守新陣線，所謂「今後會議當有重要進展」也實爲子虛。十一月二十四日，《九國公約》在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之後，宣布無限期休會。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會上針對會議延宕三週之久，竟無任何滿意結果，表達強烈的抗議。各國使節都相對無言，法國代表則一語道破：

中國代表之言雖是無可爭辯，但吾人實無能爲力也！

這時中國軍隊正在「國防線」上竭力苦戰，東風已是喚不回了。

註
釋

① 《九國公約》會議原定十月三十日開幕，但因比利時內閣改組，又延到十一月三日。

第七章 「國防線」上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深夜，由於日軍金山衛登陸成功，國軍匆促決定向「國防線」轉移。當晚，在蘇州河南岸陣地裏的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看到左側部隊紛紛後撤，甚覺訝異，急忙和友軍連繫，才知道有命令，全線向崑山撤退。一時之間措手不及，手下的一個旅正在行動，既不能用電話、也沒有電報可以通知，極爲狼狽。只好臨時挑選兩名精幹的傳令兵，許以重賞，限他們盡快找到該旅旅長，傳達撤退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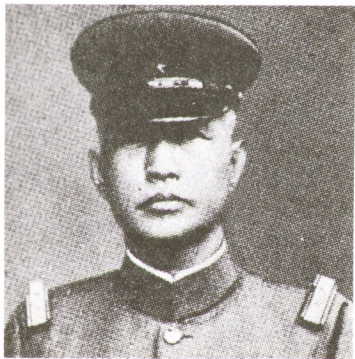
就這樣，一趟撤退，成了全面潰敗的開端。

日軍登陸金山衛

正當蔣委員長在蘇州發表講演、堅持死守之際，在東京的日軍參謀本部下達了登陸金山衛的命令。對於上海戰場，日本軍部原先只是把它當做一場「一二八」式的，在小範圍內以「保僑」爲目標的有限戰鬥，所以不肯輕率投入援軍。總要等到不得已時才加派、再加派，結果演成了「逐



十一月五日，日軍登陸金山衛，拊上海國軍之背。



堅持不肯增兵華中的原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

次增兵」的困境，戰線不斷延長，戰事卻毫無進展。直到九月二十八日，下村定接替石原莞爾，出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以後，戰略上才有了改變，將上海視為主戰場，大舉增援，期與集結此處的華軍主力進行對決，謀取「支那事變」的速戰速決。

十月十二日，日軍參謀本部擬成《關於今後作戰事宜》的計畫，決定：

以第十軍登陸杭州灣北岸，使上海派遣軍之任務達成容易。

地點選定金山衛，位在華軍死守的蘇州河防線背後四十公里處。動員兵力達到三個師團，分別由華北、東北、日本國內運來。經過這番調動，上海地區日軍增加到九個師團，華北只留下七個師團，日本本土更只剩下兩個師團，足可見日軍在上海遂行決戰的企圖。

對於日軍援兵的到來，國軍並非全無所悉。十月二十二日，顧祝同曾經警告何應欽：「聞敵將有三師團來滬增援，其先頭部隊有（二十六）日可抵滬。」可惜這項情報，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至於金山衛的防務，本來開戰之初，蔣委員長也極為重視。他在九月三日就致電戰區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督促他構築防禦工事。但是後來，由於十月二十一日蘊藻濱反攻失敗、大場告急，原先駐紮杭州灣擔任海防的幾個師都相繼北調，導致大軍麇集上海，兩翼防務遭到忽略，終於為敵所乘。

十一月五日凌晨，日軍在金山衛一帶分頭登陸。守軍因為防區遼闊、兵力分散，而被各個擊破。日軍隨即直撲滬杭鐵路上的要站松江，準備包圍上海郊區的國軍。這一著，大出委員長的意

料之外。當時負責接聽專線的王正元回憶說，那天夜裏，爲了日軍在杭州灣登陸的事情，蔣和顧祝同前後通了二十幾次電話。剛聽到這一軍情時，蔣焦急異常，語氣顯得非常驚詫，好像始料所未及：

「有戰鬥嗎？」

「……敵人砲火猛烈，配有飛機、兵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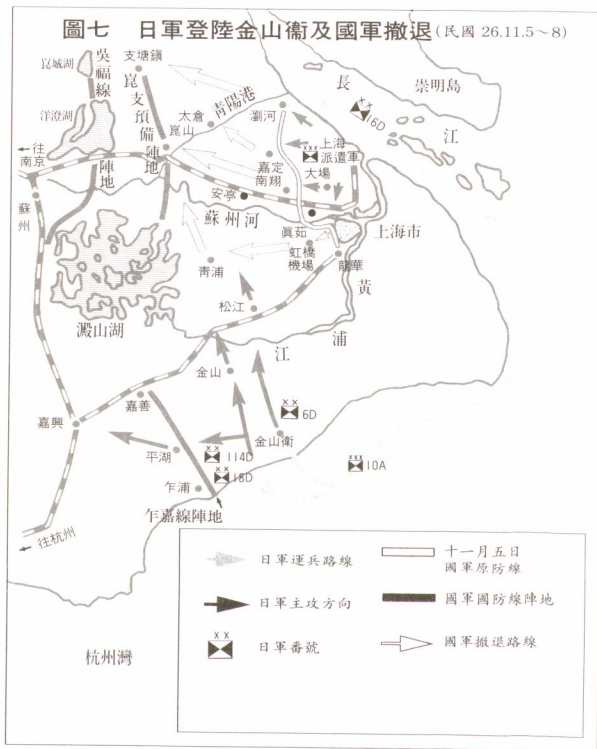
電話中可以聽出，蔣對於幾個月來全力應付正面作戰，而把金山衛這個重要海口給疏忽了，感到遺憾不已。

然而儘管如此侷促，蔣還是不肯就此放棄上海，於是又從蘇州河正面抽調部隊，回頭堵塞金山衛日軍，想在松江附近阻敵。但是由於抽調前去的部隊，不是久戰之餘，就是新到戰場，根本無法寄望過奢。緊要關頭，他曾以電話詢問陳誠，如何處置？陳誠建議調整戰線，但蔣還是不死心，要求再支持三日。結果全盤戰局就在這樣的堅持之中，急轉直下，終至不可收拾。

日後，蔣委員長在回顧時，曾經自承這次讓日軍登陸成功，是統帥自己「最大的挫失」：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布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致整個計畫，受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

圖七 日軍登陸金山衛及國軍撤退 (民國 26.11.5~8)



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

但事後的懺悔，已無補於大局了。

撤退開始

十一月五日，日軍金山衛登陸成功以後，上海郊區國軍的撤退，應已成爲定局。但蔣委員長卻爲了等待《九國公約》會議的結果，遲疑了四天，直到八日夜裏才放行。當晚九點，顧祝同下令轉移，大兵團隨即開始行動。但是由於命令下得匆促，沒有爲各部隊留下準備的時間，撤退秩序極爲紊亂。加上日軍和漢奸橫行，破壞各處通訊，使得許多該退的部隊，都沒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該先退的部隊，反而跟著鄰近友軍一起退了。

而且這時，火線上的部隊也正面臨苦戰，想走也走不掉。配合金山衛登陸，蘇州河北岸的日軍發動了牽制攻擊，企圖絆住守軍，不讓順利脫離戰場。當時三十六師的團長熊新民奉命斷後，正面日軍已經察覺到他們在實施撤退，故意保持緊密的火力接觸，還開來許多戰車，死咬著不放。

另外，六十七師師長黃維也正在爲著泗江口公路橋上掩護大軍的工作，感到爲難。因爲他的部隊在蘇州河南岸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哪裏還有能力完成任務？爲了應急，只好把所屬的四個團編足四個營，撥交當時還是旅長的胡璉統帶，留守橋頭，讓其他人員先行撤離。但在配置完成

以後，卻找不到左右依托的部隊。原來該在側翼掩護的廣東部隊已經先走了。結果當夜日軍就在他們防線的西邊偷渡過河，襲擊退卻的國軍，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甚至出現自相踐踏的情形。

當時上海和南京之間的交通，是以「京滬鐵路」和「京滬公路」為主，之外就沒有什麼平行的道路了。鐵、公路兩旁都是無數的小河汊，大多很深，不能徒涉。橋樑又少，老百姓平常往來，都是借助舟筏。因此大軍別無選擇，只能沿著鐵、公路轉移。而各部隊在上海苦戰三月，多數都補充過幾次，新兵甚多，有作戰經驗的中、下級幹部又很缺乏。在火線上時，因為陣地前後重疊，官兵還能維繫；一旦倉促上路，就難以掌握了。所以撤退得早的部隊，因為好整以暇，總算還能維持建制；稍遲才退的，單位既多，又侷促在這兩條路上，想要依序行軍，保持戰力，就求之而不可得了。

況且一路下來，從早到晚，日機異常活躍。白天是不斷地低空炸射，沿途村落、橋樑全被炸毀，晚上還投下照明彈往返偵察。國軍冒著空襲，絡繹西行，秩序更加紊亂。甲部隊的官兵混雜到乙部隊裏來，乙部隊的官兵又被擠到丙部隊裏去，大家亂作一團。各級指揮官對自己的部屬都失去了掌握，團長找不到營長、師長找不到團長。軍長、軍團司令、總司令接到上級的命令，轉到底下，結果各司司令部的位置時時在變動，命令送不出去；就算送達了，營、連、排長對部隊也失去了掌握，誰也指揮不了誰。七十八師的營長李日基在撤退途中，就看到他的頂頭上司，第十七軍團長胡宗南，只帶著幾個人，成了光桿司令，也雜在人群中，一路西去。

淹死了許多人

由於許多單位都沒有接獲正式的撤退命令，目的地始終不清楚，因此走在後頭的，只好跟著前頭盲目行動。這時松江早被日軍佔領，「滬杭鐵路」遭到切斷，撤往杭州已不可能，因此蘇州河南岸各部隊都不約而同擁向青浦，想從這裏北渡蘇州河，朝崑山、南京方向走。人潮迅速跟進，個個爭先，惟恐落入日軍的鉗形包圍之中。

但是上海到青浦，其間只有一條公路，而且事先已經挖斷，上面搭了木板，只供單人通行，因而阻滯了撤退行列的移動；再加上蘇州河面橋樑多已遭到破壞，各師競渡，更使情況混亂不堪，造成了許多悲劇。上海「保安總團」隊長楊俊，第二天拂曉到達虹橋機場附近公路橋，由於國軍自己的工兵，不顧後面還有大批部隊，以及橋上的許多友軍，強行按照上級預給的指示，準時八點炸橋，以致炸死了好多人，連工兵排長自己也死於非命。楊俊最後是從散落在水面的橋板上，慢慢覺過河的。

這一夜，日軍還乘著夜幕，編組了幾支小型的挺進隊，掩到南翔和崑山間的公路上，肆行偷襲、製造恐怖。胡宗南在南翔的十七軍團司令部就遭到禍殃。司令部人員及警衛連被打死很多，胡宗南僅以身免。而在泗江口公路橋上斷後的黃維，正跟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通電話時，話筒裏突然傳來槍聲，薛岳話講到一半，驚慌失措地掛斷了。原來連集團軍總司令部都遭到了攻擊。

黃維在這麼混亂的狀況之下，只好匆匆傳令工兵炸橋，然後開始朝南京方向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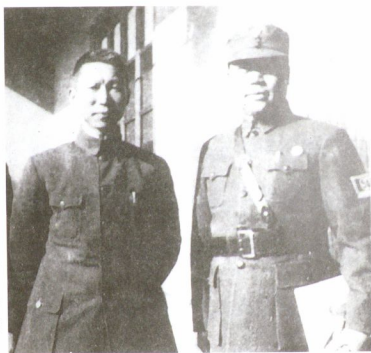
電話的另一端，正和黃維通話當中的薛岳，位在安亭的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因為衛戍部隊擅離職守，意外遭受來自青浦的日軍偵察分隊一個排襲擊。薛岳一面急令特務營抵抗，一面率領總部人員開始撤退。不料走到半路，座車又遭到機槍掃射，司機、副官和衛士都被打死了。薛岳正發著燒，趕忙從車上跳到田裏，仗著自己的泅泳技術，游過河溝，才倖免於難，後來終於遇到第十四師師長霍揆彰。霍見他已經凍得縮成一團，忙將自己的大衣脫下，幫他穿上，護送到後方去。而公路上十幾個師，因為看見安亭一帶隱隱有火光，都以爲日軍來了。大敗之餘，兵無鬥志，竟紛紛橫向鐵路亂跑，交通一度受阻。殊不知，擋路的只是敵人的一个排而已。最後還是援軍趕到，發動攻擊，才算清除了障礙。人流又繼續朝嘉定前進。

薛岳的運氣算是不錯了。這趟撤退所經之地，河汊既多又深、橋樑又少，就是有橋也多已破壞，不能過人。官兵全靠泅渡，不會游泳而淪爲波臣的，不知凡幾。當時擔任第一軍參謀長的於達，也是落水的一個：

上海失敗後，胡（宗南，時兼第一軍軍長）先生沿著汽車路向蘇州撤退，我和范漢傑採另一條小路走到一條小河，河面約有十公尺寬，我們沿著河邊草叢進去隱蔽起來睡。直睡到下午四點鐘，敵人來了還不曉得，一放槍已來不及逃走，匆忙間跳到河裏去。當時跳下河的不止我一個人。冬天穿棉衣，下了水重得很，脫一層濕一層，在河裏吃了不少水。很多兵認識



E軍工兵配備的鐵船。



在安亭遭受日軍襲擊的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薛岳（左），與搭救他的十四師師長霍揆彰。

我，把我救起來。

軍紀瓦解了

本來十一月八日國軍放棄上海、開始撤退之初，大家的想法都還以為，後方會有現成的鋼筋水泥碉堡，可以持久抗戰下去。所以傷亡雖然很大，士氣並不低落，只要能夠撤下來稍事整補，就可再戰。殊不料在轉移途中，演成了大潰退。官兵日夜行軍、又無補給，只能隨處就食，取給民間，紀律也就跟著瓦解了。桂軍一七〇師的連長藍中民回憶說：

沿途經過附近村莊，聽見不守紀律部隊（中央軍和各省部隊也有），一到村邊，就放冷槍，嚇走老百姓，乘機追村宰雞殺鴨，翻箱倒櫃，無所不為。他們經過大街小店，搶吃搶喝，群眾反感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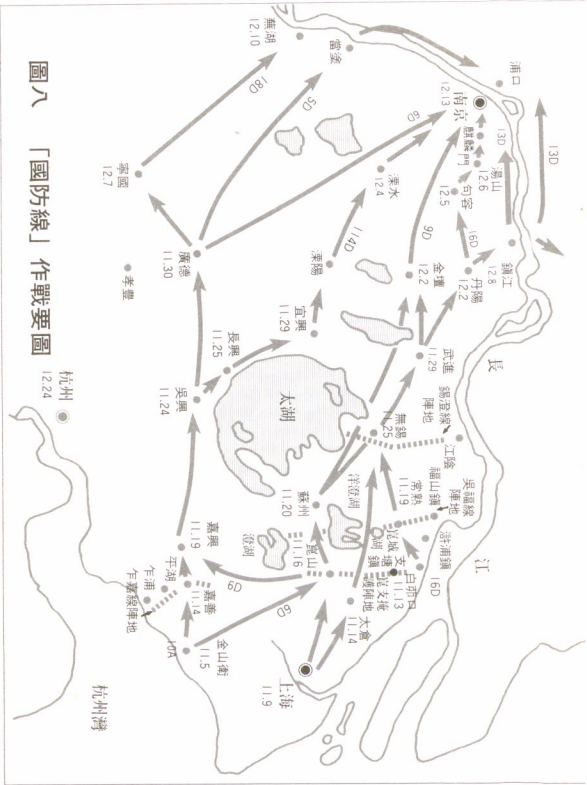
當時第十五師師長王東原，在撤退路上看到遍地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遇到車輛就鳴槍拉車；如不停車，就橫加射擊。這時王自己坐著一輛大卡車，帶有衛兵一排，只要一遇散兵鳴槍，就停車引誘他們上來，然後解除武裝，再驅之下車。這樣一路到達南京，竟然接連發生數十起，繳得步、機槍一百五十幾挺。軍紀之壞，可見一斑。

對於如此敗壞的軍紀，蔣委員長在兩個月後，曾經嚴加訓斥，說是「由於我們高級將領沒有指揮的學力和技能」：

我可以很痛心的告訴大家，在沒有開仗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實在都是由於我們高級將領沒有指揮的學力和技能，一般官長沒有掌握部隊的能力。……甚至退卻時，部隊未盡通過以前，即已將橋樑破壞，任令秩序紛擾，自相踐踏擁擠。像這樣情形，部隊如何不亂，軍紀如何不壞。

並直指隨後「國防線」戰鬥的失利，不是「作戰的失敗」，而是「退卻的失敗」：

……如果我退到「廣福線」有條理、有秩序，再同敵人打，敵人決不敢追。我們蘇州河退卻之時，司令長官一跑，一切重要東西，都無人過問。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地圖、重要計畫，都被敵人拿去了。我們自己部隊沒有退，橋樑先已破壞了，馬匹、大砲都無法搬走。敵人看破了我們的弱點，所以敢放膽的追。大家知道，我們在上海的失敗，不是作戰的失敗，乃是退卻的失敗。



圖八 「國防線」作戰要圖

「國防線」失利

蔣委員長在這裏不曾指出的是，「退卻的失敗」，主因還是由於撤退過遲。戰前國府對於上海作戰的規劃，原本是要節節抵抗，所以才有「吳福」、「錫澄」兩線陣地的構築。但是臨時因為脫離戰場太晚，各單位準備不周；同時天雨泥濘，道路擁擠不堪，運動遲緩；再加上日軍掌握著制空權，日夜跟蹤轟炸，部隊掌握倍加困難。不僅各項部署付諸流水，連大兵團的協同連絡也無法確實。潰兵有如潮水一般，馬不停蹄地朝南京轉移，戰局也跟著急轉直下了。

撤退之初，國軍本來還想守住崑山—支塘鎮一線陣地。但從上海到崑山一百多華里，大軍奔潰，撤退下來的部隊已經很混亂了；到了崑山，當地軍政機關又多已撤離，糧彈補給都沒有著落；日軍又已在後方白茆口、澆浦鎮登陸，後路有被切斷之虞。結果崑山不到兩天就宣告棄守。十一月十三日，顧祝同下令向「吳福」既設陣地轉移，「國防線」作戰就在這麼雜沓的局面下展開了。

本來前方上海抗戰，後方就應在「吳福線」及「錫澄線」預置部隊，以便前線撤退之際，負責掩護任務。但由於上海三個月的死守，留置的部隊總是在到達不久，就又奉調火線。所以這時「國防陣地」上既沒有留守的人員與嚮導，也沒有工事位置圖。九十八師旅長方靖撤退到常熟以後，找不到工事位置，也缺乏地圖，就教官兵按著方向尋找，結果：

所謂國防工事，鋼筋水泥機槍掩體在公路大道兩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線，僅有十幾處像墳堆的土包一樣。當時掘開上層，有的是機槍掩體，沒有鑰匙打不開，只有立即鑽開；有的扒開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找尋，就找不到水泥的掩體工事了。我們只有急急忙忙地佔領陣地，構築臨時工事。

由於駐防該地的部隊三個月來不停地流動，鋼筋水泥掩體的鑰匙幾經轉手，早已不知去向；少數由保甲長負責保管的，也因地方紛亂，保甲長不見蹤影，而無從尋覓了。九十八師另一位副旅長龔傳文抵達防區，找了許久，才發現掩體的所在。但門都有暗鎖鎖住，無法打開，用十字鎬和大石頭等工具也敲不壞，部隊經過激戰，又缺乏爆破用的火藥。最後透過師部，才知道鑰匙在附近村子的鄉長手裏。等趕到那兒，鄉長已經逃走，大家只有望著工事空悲嘆了。

工事多未用上

除了臨時找不到掩體、打不開暗鎖，國軍在「國防陣地」上還遭遇了重重問題。首先，這些工事構築時，是預先造好鋼筋水泥的重機槍巢，作為陣地的骨幹。至於交通壕，則是留待戰時再由守軍進行挖掘。所以九月初，蔣委員長就曾致電張發奎，說蘇州到福山鎮，以及滬、杭各線陣地的步兵掩體、交通壕和障礙物「多未完成」，要求指派部隊修築。然而這道命令顯然成爲具文。

基於「一二八」的經驗，日軍加強了兵工配備，適應江南水鄉，行動迅速。



十一月十九日，日軍進入蘇州，突破了「吳福」國防線。



直到兵臨城下，蘇州一帶都還只有簡單的機槍掩體，工事不夠堅固，戰壕也沒有完成。最後日軍急追而至，國軍倉促應戰，所佔領的陣地都沒有交通壕，人員日間無法連絡，後方糧彈也送不上來，只能靠著夜間進行補給。

其次，陣地本身構築不良。工兵學校的教官黃德馨在戰前巡視時，就已經發現許多工事不合要求。有些孤零零突出地面，偽裝很差，周邊的覆土都已坍塌，像個土地廟一樣；有些位在墳堆和高地上，又沒有利用地形，把工事建在斜面上，反而建在平地；有些設在山頂上，射孔太大，只求射界廣闊，也沒有考慮容易被擊毀的問題；有些卻因基礎不夠穩固，已呈下陷。所以許多部隊到達以後，乾脆不用。結果花費大量人力、物資興建的「國防工事」，就這樣浪費掉了。

另外，「國防線」位置的選擇，當初是看中附近為水網地帶，河汊縱橫，又有洋澄湖、崑城湖和太湖等湖泊做為依托，日軍難以迂迴。但卻忽略了這些河、湖也有變成空隙的可能。當方靖率兵抵達指定地點時，就發現「湖內湖邊上，皆沒有防禦設備」。而且日軍基於「一二八」的經驗，部隊裏都加強了兵工配備，架橋填溝，行動迅速^①。特別是金山衛登陸的日軍，為了適應江南水鄉地形，事先更準備了可以裝卸的摩托艇，由士兵背負，遇水即渡，不稍停留。所以第十八軍軍長羅卓英在十一月十九日率部撤離「吳福線」之前，曾向薛岳總結陣地缺點：

一、既設陣地與工事無圖參考，無人指示，無鑰開門。

二、因前線之撤退，而在國防陣地帶內之軍政機關人員，尤其兵站、交通、通信、衛生等

設置，同時失卻連絡，無人負責。

三、江南湖沼、河渠交錯，非同死湖，在軍事上不能認為完全障礙，且有變成空隙薄弱之虞，故陣地設備及部隊配備，均應注意，尤須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國軍素質的低落

國防線不守，雙方力量的未達平衡也是重要因素。由於三個月的死守，國軍精銳部隊都已經犧牲殆盡，後期來援的，多是地方武力。他們以往只經歷過「內戰」形式的局部戰鬥，沒有參加過大兵團會戰，在協同上本來就稍遜一籌；加上平日接觸多是輕裝備，沒有接受過重兵器的洗禮，戰車、艦砲從來不曾遭遇，心理上更容易處於劣勢。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就警告蔣委員長：

部隊長及部隊須熟悉敵方兵器、物質效力，俾精神上能作準備，不致因最初印象，即沮喪士氣。

同時士兵教育程度不夠，作戰必須中、下級軍官親臨，不然就無法應付環境。而瀝戰之中，下級軍官損失過甚，自然也影響到這段時期的戰鬥。當時八十七師的旅長陳頤鼎，自己還在火線上投擲過兩次手榴彈：

激戰中，圍、旅長不親臨第一線與部屬共同作戰，陣地就不易守住。我自己就曾兩次投過手榴彈，開過輕重機槍，可見戰況之激烈。

此外，國軍官兵多數缺乏現代作戰的訓練與經驗，只憑血氣之勇，不懂得疏散與偽裝，也招致了許多無謂的損失。例如挖掘戰壕、堆積沙包，原本就是越深越高，效果越好。但是有的部隊基於愛國熱情，以為「勇往赴命」是最高美德，不屑從事這類工作，結果犧牲格外慘重；某些單位甚至沒有「立體作戰」的防空知識，更為日機提供了絕佳的目標。

桂軍的一個團初到上海，搞不清楚狀況，竟於拂曉時分將全團集合在竹林邊訓話，結果引來大批敵機低空掃射。官兵慌亂走散，團長也負了傷，損失不貲。孫元良還記錄了一則更極端的例子：

記得有一支隊伍從老遠開到江灣火線後面，預定休息幾天，再去接替前線的陣地。他們擠住在幾個鄉村裏，舉火造飯，炊煙四起；空場上晒滿了換洗的衣服，隨風飄舞。於是引來敵機，敵機飛得差不多觸著屋頂，機槍亂射，炸彈亂擲。這麼一來，這支還未上過火線的部隊又要調回後方去補充整訓了。

老百姓不能配合

戰鬥的失利還牽涉到民衆動員的問題。戰區附近各縣，事前既沒有組訓民衆，戰事開始以後，也不知要進行動員。陳誠事後檢討，說他在滬戰爆發之初，到上海視察，「沿途所見，極少動員緊張的氣象」、「通信、交通、運輸、軍用器材及民衆組織等等，都沒有充分的準備」，等到戰火延燒，才倉皇應付，各項阻滯自然迭生。

其次，淞滬戰場長期的陣地戰，也給了國人錯誤印象，以爲上海都能支撐三個月，那麼在號稱中國「興登堡線」的國防工事上，一定可以維持得更久。前國府外交部長黃郛的夫人沈亦雲就說：

江浙不守與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軍事實力比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爲修築有年的「興登堡線」上，至少可支兩三個月，豈知這條線未曾用著。

另外，太湖沿岸向來是全國穀倉，富甲天下，老百姓生活安定，對於戰爭既無概念，也無戒心；又狃於「一二八」的先例，以爲日軍最多推進到青陽港，不會再深入。所以政府雖然明令疏散，但大家還是抱著觀望的態度。蔣夢麟在《西潮》裏提到避難杭州的「綿紗大王」，「上海作

戰期間，我想在杭州住下來」，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

正由於這樣的觀望態度，一旦「國防線」作戰失利，大局猝變，後方崩潰得比前方還快。謠言蠱起，人心惶惶，率皆空城奔逃，爭先避難。不但妨礙大軍轉移，還對國軍自己「堅壁清野」。十一月中旬，粵軍八十三軍參謀劉紹武初抵蘇州，就看到前線退下來的友軍都把這裏當成補給站，任意搜刮糧食、強拉民伕。同時日機乘危轟炸，各地大火融融，隨處可聞哭聲。特別是夜間空襲時，漢奸們發射來給敵人指示目標的火箭，更有如萬弩齊發、元宵鬧燈。顧祝同的司令部原來也設在蘇州，這時正準備向武進撤退：

是日，蘇州遭日機大肆轟炸。我離蘇州時，蘇州城內外多處大火焚燒，難民扶老攜幼，沿途充塞。部隊亦絡繹西進，秩序混亂已極。過去戰地情景，我雖已見慣，而此時一幅亂離慘痛的畫面，深印腦際，歷久竟不能磨滅。

當時擔任預備第三師師長的冷欣，十二月初由合肥前往揚州，途中看到無數難民，攜家帶眷，兒啼女哭，到處逃難。有坐小車、有騎瘦驢、有扶杖而行、也有因病由人抬著走的。顛沛困苦之狀，慘不忍睹。一遇敵機飛越，就蜷伏林中或臥倒稻田、水溝，號哭之聲，遍地哀鴻。

民衆、物資疏散混亂，而漢奸之多，也令人咋舌。早在七月二十四日，軍政部召開第十四次「軍事機關長官會報」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就反映說：「民衆不知自己爲中國人，且不知當漢奸之恥辱，應速設法喚醒。」然而上海戰場一開打，日軍即不斷收買中國老百姓，或是割斷電線、

破壞電訊；或是擾亂治安、刺探軍情。甚至送公事的傳令兵，都常遭暗算失蹤，或是被搶走公文。國軍過去沒有經驗，肅奸工作做得「亂糟糟的」、「沒個頭緒」。羅店之役前後，羅卓英和陳誠的副官有過一段對話：

「辭公（陳誠，字辭修）的勇敢，真可佩服。但是敵機的投彈怎麼會這樣命中呢？就像看見的一樣。」

「漢奸太厲害了啊！敵機一來，總部附近到處是小鏡子，一閃一閃地，向敵人指示目標。夜間則發信號彈。真是捉不勝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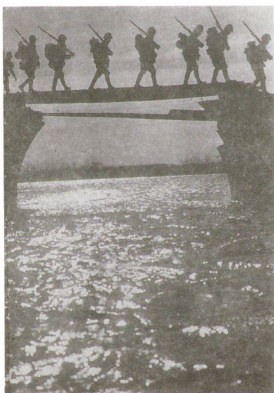
漢奸的猖獗，由此可見。

失敗主義瀰漫

這趟近乎總崩潰的撤退，在戰史上實屬罕見。如此大的兵團，既未能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又沒有明確的撤退目標。許多部隊都失去了掌握，只能聽由各自為政，任之西向奔逃。而隨著日軍深入，失敗主義也開始瀰漫在國軍官兵之間。胡宗南在十一月下旬，率軍進入「錫澄」陣地之前，電告戴笠：



開始朝南京進發的日軍第十三師團。



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向湖州推進的日軍一一四師團。

第刻又在無錫進入陣地矣。此次前方撤退各軍，秩序紀律毫無；官無鬥志，士多傷亡。「吳福線」尚不能守，「澄錫線」更無論矣。黃埔部隊多已打完，無人撐持，其餘當然望風而潰矣。第二期革命已失敗，吾人必須努力來完成未來之使命也。

當時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率領著部隊，一路和戰區司令部完全中斷了連絡，一口氣由蘇州退到南京，才去見委員長。另外，粵軍一五六師「政訓處」科員李益三，在無錫參戰後，就沿著京滬鐵路，由武進、丹陽、句容向後撤退。前方的戰況急遽變化，不斷傳來不利的消息，但部隊的情況，他們全不清楚，要撤到哪裏，也無從判斷。爲了避免敵機空襲，每天都是白天宿營，晚飯後開始行軍。大伙都因爲長途的急促撤退而疲憊萬分，好不容易才在十二月二日到達了南京。

就在這樣的混亂之中，國軍「吳福線」只守了六天，十一月十九日宣告放棄。大軍隨即朝「錫澄線」轉移，可是也撐不到一個星期，而在二十六日撤離。之後，主力部隊開始經由太湖西側，向皖南的孝豐、寧國一帶集結，脫離戰鬥；只留下部分守軍，準備死守南京。

於是，南京的防衛問題，就出乎意料地提前搬上了日程。

註釋

①事實上在戰前，日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岡村寧次，有次在與國府軍委會高等顧問蔣方震閒談時，就

說太湖地區作戰，非使用橡皮汽艇在河面機動攻擊不可。蔣還因此向當局建議：「趕快籌組汽艇攻防隊，至少要準備六百艘以上。」可是還沒來得及辦理，「八一三」就爆發了。

第八章 乾綱獨斷

上海撤退後某日，蔣委員長帶了顧祝同、唐生智、錢大鈞、胡宗南、桂永清等一班將領，登上紫金山天堡城巡視。深秋的紫金山，遠近一片蕭瑟景氣。委員長登高而望，忽有觸動，指著起伏的山巒，感喟著說：

首都錦帶江山，可以說是天然的要塞。要是守衛有力，一定可以支撐一兩個月。

這句話，預告了南京的命運。

日軍高層的猶豫

隨著上海華軍的撤退，攻略南京的話題開始在日本軍人之間私下流轉起來。日軍參謀本部基於兵力擴散的顧慮，始終不願意在華中用兵，所以對於進擊南京也顯得興趣缺缺。八月十八日，當「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抱怨他的任務只限於保僑，而倡言應該斷然以南京為目標時，

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當場就表示：參謀本部對於到底要用多少兵力、用幾個月時間才能攻佔南京，並沒有資料，這個問題需要再研究。不過他也正告松井，以目前的狀況，要攻佔南京，「不可能」。

稍後，陸、海軍總長進宮上奏時，也認為對於南京進行攻擊，必須動員龐大的兵力、花費很長的時間，並且還得等到水田乾涸的季節才能實施，而抱持審慎的態度。

如此持重，基本上仍是爲了防俄。日軍高層當時判斷：晚秋、初冬這段期間，是俄軍最有可能發動攻擊的時候；而金山衛登陸以後，日軍在華北只剩下七個師團，華中卻滯留多達九個師團，要再深入的話，怕屆時兵力的轉用會受到影響。九月二十日，日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入謁天皇，奏呈《作戰計畫大綱》時，就說明了這點顧慮：

如再深入對華作戰，則在適當時機，兵力的抽出將有困難；而且我軍戰力的消耗將無法補充。另一方面，這段時期對於俄國而言，在季節上，是在東北部開始作戰的最好機會。由於隱藏著以上各種危險，節約對華作戰兵力、整頓對俄作戰準備，以備戰爭之持久，是需要的。

所以金山衛登陸成功後的第三天，十一月七日，日軍參謀本部調整了戰略方針，一方面將上海附近各部隊編組成「華中方面軍」，擴大任務，由「保僑」一變而爲「決戰」，要求迅速殲滅華軍：

與海軍協力，挫折敵軍的戰爭意志，以「獲得結束戰局的契機」為目的，消滅上海附近的敵軍。

另一方面卻又下達《臨命第六百號》指令，限制「華中方面軍」的作戰範圍：

華中方面軍的作戰地域概定為蘇州、嘉興連結之線以東。

意思就是，只准他們在蘇州—嘉興這條「統制線」的東邊作戰，不許越界西進，攻取南京。

前線將領的冒進

但是隨著戰局的順利開展，日本國內對於應不應該進取南京，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爭議。當時主戰派流行著一種樂觀的看法，以為只要出兵佔領了北平、天津、上海及南京四大都市，國民政府就將在實質上喪失政權的代表性，到時自然就會低頭屈服。

所以儘管還是有若干持重人士表示反對，例如日本「聯合通信社」的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就透過近衛文麿首相的密友後藤隆之助，向近衛忠告，不要再朝南京前進。因為即使佔領了南京，中國人也不會覺得丟失多少面子，蔣介石也不會下野，甚至更加團結繼續抗日；而且隨著補給線的延長，日軍糧秣不繼，掠奪行為漸增，將有淪為「無名之師」的危險。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停止



力阻日軍進攻南京的日本「聯合通信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

決，蘇聯問題就等於兵不血刃地解決到某個程度，英國問題亦復如是。

松井之外，由金山衛登陸日軍所編成的第十軍，其軍長柳川平助也是位急進派。無論進攻南京的決定、或是「統制線」的跨越，他都起了帶頭作用。十一月十五日，他在前線就私自決定，將朝南京實施攻擊，並且向東京鼓吹說：如果能夠把握這次機會，斷然前進，二十天內必可佔領南京。所以十九日攻下嘉興之後，他立即傳令所部越過「統制線」，展開追擊；還以「先斬後奏」之姿，通知參謀本部：

南京追擊，開始和平交涉，除此之外，別無拯救之道。近衛雖表同感，卻對輿論莫可奈何。

至於軍部方面，意見尤為紛歧。雖然陸軍省的主要幹部們對於攻略南京，都抱持審慎的態度，不斷以「地形上有困難」等理由，試圖加以阻止。但是參謀本部的作戰課卻表現積極，而前線的指揮官們更是躍躍欲試。甫升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本身就是位「支那一擊論」者，認為只要國民政府存在一天，「事變」就無法解決；要解決，就必須逼蔣下野、國府垮台才行。他並且倡言，如果「中國問題」能夠解



率先越過蘇州—嘉興「統制線」，進擊南京的日軍第十軍軍長柳川平助。

- 一、集團於本日中午左右佔領嘉興……。
- 二、集團下令於十九日早晨傾全力向南京追擊……。

一貫主張運用政治手段來處理「事變」的參謀次長多田駿，接到這份電報時大吃一驚，一度嚴令停止前進，但終究拗不過身邊幕僚和前線將領們的異口同聲，說現在各地敵軍的抵抗都很微弱，似乎沒有死守南京的意圖；而且「事變」要解決，最好的辦法就是佔領南京云云。而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同意廢止「統制線」。最後十二月一日，日軍大本營終於以《大陸命第八號》指令，下達「攻略南京」的決心：

「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應與海軍協同，攻
略敵國首都南京。

希望藉由南京的佔領，能夠頓挫華軍鬥志，以獲取結束戰事的有利契機。

南京也在遲疑

正當日軍高層猶豫躊躇之際，國府內部也在

針對同一問題反覆討論。當時多數軍政大員都反對死守南京。十一月中旬，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就對他的秘書程思遠說：上海作戰，動員了十八個軍，能夠參戰的通通用上。現在打得殘缺不全，需要修整，也沒有後援部隊可以調度。所以守南京是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要他準備一份資料，建議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

另外，擔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的張群也不贊成守南京，不過他的想法不單純是軍事上的。他曾經對回京述職的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說，他認為南京沒有長期固守的條件；而且，「如果我軍自動退出南京，日軍不是以武力攻佔的。萬一將來和談時，它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對我進行要挾」。這類反對的聲音，自然給傾向死守的蔣委員長帶來決策的壓力。為此，他召回在前線作戰的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詢問他的意見：

問：「南京如何守法？」

陳云：「是否叫我守？」

領袖云：「不。」

陳云：「如不叫我守，則我不主張守南京。」

蔣只得命他再跟何應欽等人研究研究。

為了解決南京的防衛問題，蔣委員長十一月中旬在「陵園官邸」連續召開了三次軍事會議。第一次會議只有何應欽、白崇禧、劉斐和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等人參加。

會中負責作戰事宜的劉斐報告說：日軍以優勢的三軍，沿著長江等有利的水、陸交通線推進，機動性既高，後方連絡又很方便；而南京位處長江彎曲部內，背水列陣，水路面臨敵海軍的封鎖與砲擊，陸路又易於蕪湖遭到遮斷，將來勢必陷入立體包圍之中，守是守不住的；加上國軍在上海會戰損失太大，又歷經混亂的長途撤退，不補充整訓，無法恢復戰力。爲了貫徹「持久抗戰」方針，應該避免目前就被迫決戰。所以結論是：固然南京是首都所在，不能不作抵抗，但也不應浪費過多兵力。建議只用象徵性的十二個團，最多十八個團，在適度抵抗之後就主動撤退。部隊太多反而不利於機動。

劉斐報告之後，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都說有道理。但蔣的反應很模稜，雖然一面說劉斐的看法很對，卻一面又說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繫，守還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慮。當場沒有作出明確的宣示。

就在這前後，陳誠和何應欽也將研究的結果、及不能守的理由，報告了上來。根據陳誠的回憶，委員長「遂決心不守」，並要他立即趕赴皖南布置。同時「國防線」上的國軍也開始向蘇、皖邊境轉移，只留宋希濂的部隊在南京待命。

由於一度有放棄南京的決策，所以各部隊曾經陸續接獲脫離戰場的命令。當時剛由前線回到南京的孫元良，有天見到了委員長：

在南京，十二月初的一個早晨，介石師親自打電話來，要我去見他。……他要我準備率所



「官邸會議」中，力主適度抵抗、棄守南京的國軍大本營作戰組長劉斐。這是他抗戰勝利後，擔任國防部次長所攝。

「放棄南京」這項決策的改變，是到了第二次「官邸會議」時才生出的波折。這次會議緊接著第一次之後幾天召開，參加者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劉斐之外，還多了訓練總監唐生智、憲兵司令谷正倫等人。會中談到南京的防衛問題時，唐生智忽然站了起來，主張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國首都、是國際觀瞻所繫、又是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棄守，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雖然劉斐仍堅持舊案，主張作象徵性防守即可，但蔣委員長卻表示：「孟瀟（唐生智，號孟瀟）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罷！」

部從一個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後令。因為他的家鄉口音，我聽不清楚那個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貼地圖的地方，指給我看，是「划子口」。

但是後來他並沒有接到渡江的正式命令。原來半路殺出了一個程咬金——訓練總監唐生智。

唐生智自告奮勇



自告奮勇衛戍南京的國軍訓練總監唐生智。

這樣過了一天，十一月十七日，官邸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根據程思遠的回憶，參加者有何應欽、白崇禧、唐生智、劉斐和軍委會第一副部長王俊等。會議程序完全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蔣一開始就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總理陵墓所在，必須要守。然後才問座上諸人：『誰願負起防守南京的責任？』」唐生智看到沒有一個人答腔，就起立發言，慷慨激昂地說：「抗戰以來，我們中下級幹部在戰場上犧牲的很多，但還沒有一個高級將領爲國捐軀。我願意防守南京，誓與首都共存亡。」蔣又問大家有什麼意見，何應欽只說：「孟瀟兄擔負這個責任很適當。」事情就這樣拍板定案了。

唐生智爲什麼要攬下這分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孫元良說他是不甘寂寞：

唐生智呢？久居冷落閑曹——訓練總監，又常常鬧病，似乎沒有詳細考慮過實際的情形。如今靜極思動，而且他以爲留給他死守南京的都是著有戰績的好部隊，所以他就自告奮勇，來承擔這個任務了。

不過現代史家吳相湘則說，唐生智是聽信了術士顧子同的勸告。顧說他的前世是金陵王，合

當坐鎮南京；而且占卜結果說，日軍佔領上海後不會再推進。因此唐才自告奮勇，擔下了這個責任。民國初年的軍閥多半迷信，常常依賴占卜、術士來決定行止，最有名的，莫過於陳濟棠的「機不可失」了。所以這種說法或許也有它可信之處。

大家都暗暗擔心

本來由整體戰略上看，南京雖是首都，卻並沒有確保的實際必要；況且它的城垣周長三十五公里，要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兵力少怕不夠分配，兵力多又犧牲不值；而重圍之中，守軍除了拚到最後一兵一卒之外，幾乎沒有突圍的可能。所以「官邸會議」中，蔣委員長問起誰來守城時，大家都默不作聲，實則暗暗擔心。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完整的兵力。孫元良就說：

爲什麼另外那幾個人都不開腔呢？大概因爲他們到過上海前線，明瞭作戰的實況。即是上海一役國軍的消耗太大了，要恢復戰鬥力，實在需要相當時間。眼前準備留下來保衛首都的部隊，番號雖有八個之多，但都是剛剛在上海戰場經過長時間消耗的。……這幾個人認爲沒有把握守得著南京，因此不敢擔任這件事。

其次，整個防衛計畫的擬定，都是倉促草率的。當時羅卓英身邊的參謀王晏清回憶道，羅曾對他們說：要守住城，原本是必須以城牆爲依托牽制敵人，然後與城外部隊裏應外合才行。但今

天南京是座孤城，城外除了紫金山有自己的部隊之外，就沒有任何奧援了，所以只能靠著城牆來消耗敵人。羅還說，我們的將士是勇於殺敵的，但守軍糧彈都缺，因此，守南京是倉促的、草率的，要守到哪一天，還要看委座的意思。

另外，唐生智這位「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也讓人擔心。儘管在就任前後，他不斷發表壯言豪語，說要死守南京六個月、要和南京共存亡。但在講求人脈的軍界裏頭，唐自己出身湖南行伍，和留守的中央嫡系部隊毫無淵源，根本不可能指揮得動。白崇禧在開完「官邸會議」後，就跟程思遠提到：唐生智脫離部隊已近十年，又沒有什麼基本武力可以依靠，憑什麼來守南京？

而且唐久病纏身，在精神上也無法負荷軍書旁午的工作。官邸會後蔣委員長會叫白崇禧協助唐視察城防，適值城裏白雪紛飛，兩人帶著幕僚一同出城。兩天下來，白崇禧發現唐的體質羸弱不堪，身著重裝還打寒顫。平地裏還可以下車看看，一到爬坡，就託白帶他的參謀長代為偵察。白為此又私下跟程思遠搖頭：

白崇禧看到唐生智這個樣子，回來對我說，蔣以唐防守南京，實無知人之明。

官兵們士氣不振

由於「國防線」作戰的失利，以及南京形勢的險惡，國軍各級人員對於保衛戰的前途都抱持

悲觀的看法。當時任職川軍的林華鈞在增援南京的路上，遇到前線下來的老朋友，才知道上海撤退時的混亂景象。老朋友們都替他拱衛南京的任務擔憂，只能鼓勵他在戰場上好好出力。

另一邊，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從蘇州一路退下來，在十一月底回到南京。這時全軍上下都巴望能撤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點整訓，俞濟時就去見委員長，報告部隊已打殘破、需要補充。結果不但沒有獲准，反而要他們留下來守南京。俞回來後，對著底下的師長王耀武發了一頓牢騷，說守南京的部隊本來沒有把他們算在內。胡宗南的第一軍都過了江，沒有留他們在京裏頭，反而把七十四軍留下來。俞還說：看樣子南京是守不住的，何應欽、白崇禧、以及其他見到的將領，都不贊成守，只有委員長和唐生智主張這樣做。

當時的環境，部隊是將領立足政治的本錢。置部隊於圍城之中，智者不為。所以能夠倖免的，自然拚命地躲。在桂軍擔任「兵站分監」的藍香山回憶說，白崇禧就力阻桂軍進南京：

桂軍從上海撤退時，蔣介石原令桂軍參加南京防衛戰。我第一次奉命在溧水待命，準備補給；第二次奉命在灣址待命，準備轉蕪湖支援南京。由於白崇禧恐桂軍全部犧牲，不讓桂軍入南京。於是命兵站沿公路從宣城、歙縣，通過皖、浙交界處昱嶺，經昌化赴於潛。命部隊從廣德經孝豐山區至於潛，坐觀南京成敗。

至於躲不掉的，只好打「保存實力」的算盤。原張宗昌所部，「直魯軍」第四十八師一四四旅旅長郭濬，當晚奉命駐防烏龍山到莫化門一綫。四十八師有兩個旅：

本來，堯化門的守備任務是由第四十八師的第一四二旅和第一四四旅共同承當的。可是第一四二旅在南京保衛戰中，並沒有全部參戰。原因就在師長徐繼武身上。……他控制著第一四二旅，在遠離陣地的一個小森林中，同身邊的衛士打麻將消遣，作戰指揮由參謀長擔任。而參謀長也僅僅每隔一小時從電話裏詢問戰情而已。

這是因爲一四四旅係由未經訓練的新兵所組成。爲了保存實力，所以徐繼武就派一四四旅上陣單幹，而保留了一四二旅。

爲何要守南京

在這樣悲觀的氣氛中，蔣委員長自己也「深知保守南京以對抗日本嚴重的壓迫，其希望實至微薄」，但就是不肯放棄。十二月七日凌晨五點，他搭機離京。行前爲了鼓勵士氣，特別在衛戍司令長官部裏召集師長以上將領講話。到會的有司令長官唐生智、副長官羅卓英、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以及王敬久、桂永清、俞濟時、宋希濂、孫元良、葉肇、鄧龍光、王耀武、馮聖法等軍、師長。會上氣氛沈悶，悲觀情緒籠罩全場。蔣首先表示，抗戰五個月來，雖然軍事上暫時失敗，但也給了日軍相當大的打擊，使其不能達成「速戰速決」的目的，還獲得了國際的同情與支持。



圖九 南京周邊要圖

(民國 26.12)

至於爲什麼要守南京？蔣說：因爲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總理陵墓所在，如果不守，總理不能瞑目；同時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繫，對國內人心影響也很大；而且守南京可以牽制敵人兵力，使其其他部隊獲得喘息和整補的機會。所以希望大家要有破釜沈舟的勇氣，和「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

最後蔣又強調：他已經調來雲南盧漢的三個師，裝備齊全、兵力充實，不久就可以到達武漢，他會親率這些部隊前來解圍。並勉勵將領們：保衛南京是偉大而光榮的任務，大家要在唐司令長官的指揮之下，同心同德，克盡軍人「守土衛國」的神聖職責。

蔣講完話後，到會的將領們彼此看看，沒有人發言。對於南京能否守住的問題，大家會前議論紛紛，心裏都知道不能守，就是沒有人敢在會上提出具體意見。會議結束後，蔣就在黎明時分，由「明故宮機場」起飛，逕往江西，離開行將合圍的南京城。

在這篇行前講話中，蔣委員長表現出他慣有的決策風格：因爲南京是我國的首都、是總理陵墓所在、是國際觀瞻所繫、對國內人心有影響、可以牽制敵人兵力、爭取部隊整補機會，所以要求死守。但是實際上，決策的背後，還隱藏了若干不爲當時所知的目的——特別是對於國際形勢轉變的期待。

就在行前講話的稍早，十二月六日，蔣委員長拍發了一封密電給李宗仁、韓復榘和閻錫山等戰區司令長官說：

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中擬暫移南昌，軍委會遷衡陽。特聞。蔣中正。

所謂「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說明了蔣之所以要「守城抗戰」，還有部分原因是和上海作戰異曲同工，都在於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然則，「大變」又是何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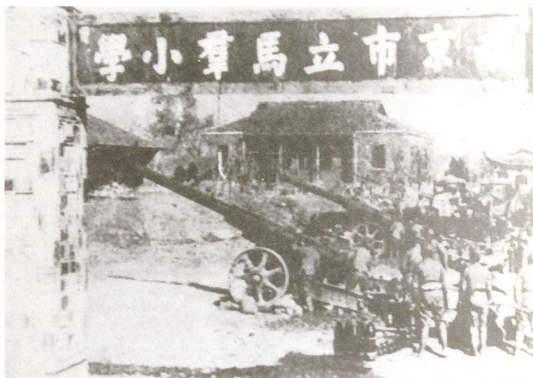
期待蘇軍參戰

一般對於南京保衛戰的敘述，都說蔣之守城，是爲了等待德國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的調停。例如親與此役的孫元良，就明言這一仗是「戰略殉了政略」：

如果我們不是寄期望於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爲了想在談判中站在有利地位，使中日戰爭能順利結束，因此才堅守南京。那麼，我們將是另外一種打算了。介石師不是早要我率部渡江嗎？

而程思遠更直指德使調停一事，是蔣誤信了派去德、義訪問的私人代表蔣方震之言：

我從羅馬方面得到一些可靠信息，就是蔣所以堅持防守南京，是誤信蔣百里（蔣方震，字



南京郊外的國軍砲兵陣地。



日機空襲下的南京。

百里) 從柏林發出的電報，以為德使陶德曼的調停活動，可能促使日軍不會進攻南京。但後來事實證明，蔣的估計錯了①。

但令人懷疑的是，如果蔣只是爲了和談妥協，則用「大變」二字，似乎並不相稱。所謂「大變」，指的應當是國際形勢的「結構性轉變」才對。固然我們不能就此排除他對於德使調停的等待，但另一條線索可能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對於蘇軍參戰的期望。

蘇軍參戰一事，至今仍諱莫如深。當時的駐俄大使蔣廷黻說，這是國府派在蘇聯的「軍事代表團」團長楊杰傳達的錯誤訊息：

從他(指楊杰)與蘇聯國防部長伏洛希洛夫元帥的談話中，楊獲得(或許是想當然的)蘇方的承諾，一旦日本佔領南京，蘇軍將對日作戰。他對我說他已將他偉大的外交成就電告蔣委員長。我對他豐富的幻想力感到震驚。我電請委員長注意，請他不要完全採信楊的報告，否則會吃大虧。南京即將陷落之前，委員長爲事實所迫，曾以個人名義致電史達林，要求給予軍事援助。他的要求即是以楊杰所說的伏洛希洛夫的諾言爲基礎。

文中所稱，南京陷落之前，蔣委員長曾經致電史達林「求救」，似乎確有其事。十二月六日，就在電告各戰區司令長官「國際形勢必大變」的同一天，蔣發電給史達林：

尊電誦悉。示以至誠，無任感佩。對德調停之答覆，正符鄙意，當不被敵所欺，請勿念。

高望貴國最高蘇維埃能予中國以實力援助，早莫東亞和平之基也。

這裏所謂「尊電」，指的是稍早十一月底史達林轉來的電文，裏頭陳述了蘇聯不能立即出兵的原因。可是之中又有「但書」：

蘇聯政府之上述態度，只有蘇聯國最高蘇維埃才能將他改爲立即出兵的態度，而最高蘇維埃會議最遲在月半或二月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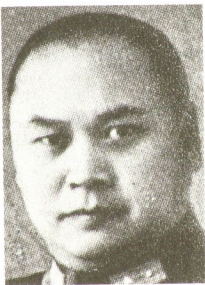
將這兩份電文放在一起，蔣委員長對於蘇軍參戰的期待就呼之欲出了。顯然他是相信，再等一個半月或兩個月，最高蘇維埃開會以後，史達林將會改變態度，予中國以「實力援助」。所以他才會發出「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這樣的保證。

事實上，南京失守前後，蘇軍即將參戰的謠言確曾漫天飛舞。十二月九日左右，德國獲得情報，引述漢口市長的話說：蔣委員長已經由他在莫斯科的軍事代表那裏得到了報告，對蘇聯在不久的將來，「直接」干預中日戰事，抱持樂觀的看法。到了十二日，南京易手前夕，漢口又有謠言，說立法院長孫科已經和俄國簽訂了《同盟條約》^②。第二天，日軍進入南京，張群約見陶德曼，證實孫科即將訪俄的消息，並謂：日本的壓力，已經越來越有可能促使中國採取親俄政策，以把握這「最後的救命副錨」(Letzter Rettungsanker)。

蔣委員長決定守南京，與期待蘇軍參戰有密切關係。圖為蔣在重慶蘇聯大使館前與使館人員合影。



傳達錯誤訊息給蔣的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楊杰。



等待德國調停

但儘管謠言蠱起，蘇軍參戰的問題終究極為晦暗。到底史達林和伏羅希洛夫私下承諾了多少？而蔣委員長又相信多少？都是無法探悉的暗盤了。相對上，德國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活動，整個過程就具體多了。南京保衛戰開打之前，蔣委員長的侍從秘書蕭自誠曾向宋希濂透露說：

陶德曼這次來京見委員長，是想由德國調停中日戰爭，他轉達了日本所提停戰條件……。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亦不希望進行長期戰爭，它是採取逐次吞併的策略，因而和平談判的可能性頗大。如果談判，總需要一些時間，日軍在這期間大約不會進攻南京。這樣，我們可利用這個機會把部隊整頓充實一下。

這段話說明了，蔣委員長是希望藉由德使調停，來達到「緩兵」的目的。所以接下來就要看看，陶德曼調停與南京保衛戰的關係。

註釋

①事實上，蔣方震在當時就曾經致電委員長，否認這項傳聞：「……日人造謠謂：希特拉將出而調停。」

意在擾亂英、美空氣，威脅義大利，並借方震為影射。已由顧（維鈞）、程（天放）大使否認……。」電文中將德國出面調停一事，指為日方造謠，似乎也可證明，蔣方震真的是「局外人」，連陶德曼的活動都不知道。

②這項謠言倒是其來有自，因為孫科當時主張聯俄甚力。傅斯年曾經寫信給胡適說：「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軍將士，最無聊的是南京官僚。太子有排德、意以便取信於蘇聯之說，為General（指蔣委員長）大教訓一下，以後他們也消聲了。」

「太子」者，孫科也。

第九章 德使調停

中日開戰，旁觀的列強中處境最尷尬者，大概非德國莫屬。因為一方面它剛在前一年（民國二十五年）和日本簽定了《日德防共協定》，兩個法西斯國家相約要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但另一方面，在上海和盟友日本激戰的中國軍隊，手裏拿著的卻又正是德國自己賣出去的武器。所以對於東亞這場戰爭，德國特別感到為難，頗有朋友打架，幫誰都不是之慨。

左右為難的德國

本來就意識型態而言，日本該是「國社黨」最親密的戰友。在希特勒眼中，日本是「人類文化安定的因素」，而中國只是「一個弱國」。同時，在征服蘇聯的藍圖裏，日本也是最理想的伙伴，它強大的工業和軍事力量，是對付蘇聯的重要工具。所以，加強德、日關係是納粹政策之所繫，其間具有根本的戰略意涵。

然而，當中日戰爭爆發之初，「國社黨」的江山還沒坐穩，德國獨立的「國防軍」和外交部，



民國二十五年，日本與德國
簽定《防共協定》，兩個法
西斯國家正式攜手。圖為日
本首相近衛在舞會中假扮希
特勒。



德國顧問為中國訓練的「中
央軍」，經證明較其他軍隊
更加善戰，曾使德國大感尷尬。

態度上仍是採親華的傳統路線；況且中國還為德國工業提供了廣大的市場。戰前國軍百分之八十的武器都來自德國，光是民國二十五年就採購了六千四百五十多萬馬克的裝備，第二年也達到六千零九十多萬元之譜。德國的軍事顧問及工商鉅子絡繹於途，正在中國的建設與備戰上，逐漸發揮他們的影響力。這些經濟利益也都是德國不能輕言放棄的。

面對這樣的左右為難，德國政府只好宣布中立。七月二十日德國外交部致電各駐外使團說：德國政府將在遠東衝突中嚴守中立。外交部長已同中國和日本駐德大使作了此種聲明。因為考慮在遠東的經濟利益及反共產國際政策，我們正關切注視事態的發展，並真誠希望能早日得到和平解決。

但是這種形同掩耳盜鈴的政策，只是徒然讓自己兩面不討好而已。宣告中立之後兩天，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就提出了抗議，威脅停運軍火給中國，否則日本要在海上實施封鎖；日本軍方也向德國駐日武官奧特(Eugen Otto)要求撤回在華顧問團，說他們的活動，已經影響到日本軍方對於德國的感情。尤其德國顧問替蔣委員長訓練出來的部隊，被證實比其他中國軍隊更為善戰；顧問們親臨戰地指揮的消息又被炒得沸沸揚揚，都使德國感到難堪。

對於日本既無法交待，而德、日之間的同盟關係，又讓中國政府深感疑慮。蔣委員長雖對顧問們表示信任，但也很清楚中、德合作的日子不會久長。國府派往歐洲慶賀英皇加冕的特使孔祥熙，在致蔣的報告中就明言：德國對中國的友誼，是在乎整個利害關係的權衡，不是區區金錢的

問題，「是以政策所關，亦非金錢所能改變」。所以八月二十一日首先傳出國府與納粹的假想敵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報導；九月八日，原陸軍大學教育長楊杰率領的「蘇聯實業考察團」更啓程赴俄，採辦俄製軍火去了。中、德的軍事合作關係顯然也面臨了考驗。

德國的憂慮

除了處境上的困難之外，中日之戰還給德國帶來若干戰略上的憂慮。首先是害怕日軍兵力的擴散。日、德兩國合作圍堵蘇聯，一直是納粹國防計畫重要的一環。做爲《防共協定》的同志，日本的價值就在於共同防俄。但這項價值，眼看就要因爲日本的陳兵中國，而遭到破壞。德國外交部在對外訓令裏頭就擔憂說：「中日之間的軍事攤牌將對蘇聯政府有利，它將樂於看到日本被牽制在別處，並在軍事行動中遭到削弱。」

其次，這場戰爭又把中國驅向蘇聯的懷抱。德國當時相當擔心中、蘇締結同盟的問題。七月二十七日陶德曼就詢問蔣委員長：蘇聯是否會干預中日衝突？委員長含糊應之，只說這事尚未全盤概觀，必須考量以後的可能性。

同時，德、義兩國的駐俄大使也曾向我國大使蔣廷黻暗示：如果中國尋求蘇聯的合作來對抗日本，那麼他們就不得不幫助日本來對付中國。所以德國外交部政治司長懷色克(Von Weizsack-Git)就明告武者小路：日本阻礙中國的統一，勢必會在中國散布共黨勢力，而促使中國倒向蘇聯。

至於從中國召回德國顧問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樣做只會使蘇聯乘機重建民國十六年，國府「清黨」以後，它所失去的在華地位。

基於以上種種考量，德國政府始終是希望這場戰爭早了早好，這就提供了它自身出面斡旋的動機。此外，納粹德國的意識型態和日本相同，敵視英、法所操縱的國聯，反對西方的調處干預，這也有利於德國去贏得日本的認同，成為可行的調停管道。所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曾經試探德國外長牛賴特(von Neurath)：為什麼德國不向日本提議停止出兵，和中國談判解決？牛似乎沒甚好氣地反問：為什麼我們應當做這種事？程回答說：德國是日本的朋友，得到日本的信任；而英、美則被視為仇敵。牛賴特乃答應考慮。

日本傳來條件

其實邀請德國出面的構想，中、日雙方很早就有人在提。七月十四日，國府教育部長王世杰就建議外交部門，非正式地「請英德調停」。約略同時，在柏林的武者小路也派人到倫敦會晤希特勒面前的紅人，駐英大使李賓特洛甫(J. von Ribbentrop)，探詢德國調停的可能性。到了七月二十二日孔祥熙訪問英國時，李還當面向孔表達斡旋的誠意，勸告中國也加入《防共協定》。孔祥熙當然予以拒絕，不但堅持國際調處，還希望德國能夠配合國聯；或者另開一個包括德、英、美、法的多國會議，來「使日本恢復理性」。

提出和談條件的日本外相廣田弘毅。



負責傳遞訊息的德國駐日大使狄克生。



正式出面進行調停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中國此時固然不願與日本「直接交涉」，東京方面在軍事行動未獲決定性勝利之前，也同樣不肯善罷干休。雙方條件南轅北轍，想談也無從談起。所以十月一日程天放晉見牛賴特，詢問德國出面的意願時，牛只謂：「德國極願努力，但現在出面，『似覺爲期過早，蓋日方決不肯接受也』，必須『俟時機成熟始能進行』。其實德國自己，這時也正因爲在華顧問們親臨上海前線指揮的新聞，而動輒得咎，雅不願再做出驚世之舉，惹人側目了。」

這樣的僵局一直持續到十月中旬。日軍參謀本部以石原莞爾爲中心的「北進派」，爲了阻止戰火擴至華中、華南，找上了德國駐日武官奧特，希望透過他和陶德曼，把媾和條件開給國民政府。奧特爲此，特於十月十七日跑到上海，和陶德曼舉行了會談。巧的是，就在這前後，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不知軍部動態的狀況下，也約見了德國駐日大使狄克生(Herbert von Dirksen)，說日本將會拒絕《九國公約》的邀請，但仍隨時準備和中國「直接交涉」。如果德國和義大利能夠加以勸說，日本將表歡迎云云。這消息也經狄轉給陶德曼，於是乃有陶第一次試探的動作。

十月二十二日，陶首先到中國外交部拜訪，暗示：「我們認爲就目前來說，直接談判比較有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願意從中聯繫。」二十六日又到上海與奧特晤談，獲知日本軍方的條件。二十八日狄克生來電，謂廣田宣稱：日本一直都準備與中國「直接交涉」，並歡迎德國參與，尋求中、日問題的和平解決。得到日本的正式表態，陶德曼就在第二天拜會了國府外交部次長陳介，進行試探。陳介表示必須先知道日方的條件，陶答應向本國政府請示。

十一月二日，廣田正式知會狄克生，對華媾和條件的內容：

- 一、內蒙古自治。
- 二、由「滿洲國」邊境到平津鐵路以南某點間成立「非軍事區」，由中國的警察、官吏負責治安，但需委派親日的最高首長。同時礦產出讓的談判需有圓滿的結果。
- 三、擴大上海的停戰區域，由國際警察共同維持。
- 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書。
- 五、共同防共。
- 六、減低日貨關稅。
- 七、尊重外僑權利。

同時還威脅說：中國如果不接受這些條件，而迫使日本繼續作戰的話，那麼日本將會打到中國完全失敗為止。到時軍方所提的條件將會更苛刻。狄克生隨即將之轉告陶德曼，肯定這些條件很溫和，中國應該接受；並建議德國政府，訓令顧問們，在向委員長報告戰局時，應對和平談判多加鼓勵。

國府在等待中

第二天，《九國公約》會議在布魯塞爾揭幕，德國外交部電令陶德曼，將日本所開條件轉達給蔣委員長，並促其接受。陶乃在兩天後由漢口趕到南京，晉見蔣面陳一切。蔣在聽取報告之後表示：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他就不能接受任何條件。他並私下告以：如果他同意這些條件，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沖倒，中國將會發生革命。他又警告說：日本人正在執行錯誤的政策。假如因為日本的政策而使國民政府垮了臺，唯一的結果將是讓赤色分子在中國得勢。他還強調：他不能承認收到日本的條件，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會議裏，受到關注的焦點，列強正有意要在《華盛頓公約》的基礎上促成和平。最後雙方互約保密而散。

由蔣委員長這些回答，可以清楚地聽出，國府最初是在等待《九國公約》會議的結果。這點考慮，顧維鈞曾經明告美國代表臺維斯：

我說，中國一直認為中日衝突是一件國際上普遍關心之事，並正屬於《九國公約》所涉及的範圍。中國一直希望召開一次有關的會議。現在這個會議正在召開，中國決不可能背著會議接受任何會議以外的國家的調停。……中國並不指望會議能調解成功，但的確願意和會議盡量合作，而不願被視為背著會議另有活動。而如果接受會議外國家的調停，就一定會被看成如此。

而日本之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促請德國出面調解，也未嘗不是存著「分化與會各國」的想法。所以當時會場內外，德國正在斡旋的流言不脛而走。就在陶德曼面見委員長的十一月五日，

柏林就傳出希特勒已正式向中、日雙方提出調處，且已被接受的說法。稍後又有傳言，出使歐洲的蔣方震，身負試探希特勒出馬意願之責。最後到了十二日，連陶德曼呈遞日本條件的事情都洩露了。

面對這些蜚短流長，國府乃在十一月八日正式訓令布魯塞爾的代表團，強調「我方唯一途徑，只求由此會議獲得適當解決」：

現在九國公約會議既在進行，我方唯一途徑，只求由此會議獲得適當解決。日本於此時使用離間手段，自在意中。而德國亦未嘗不欲利用時機以調人自居，藉以抬高其在遠東之地位。德大使在此已頻頻微露其意……。

許多人批評蔣委員長，說他奢望德國的調停。其實，在北京會議結束之前，蔣是不願意接受德國斡旋的。他不但信不過日本人，即使德國人也不見得信任。

「尚不算是亡國條件」

然而不幸的，比京會議在各國相互推諉之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不了了之。而在會議期間，國府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十一月五日，日軍登陸金山衛，大局開始逆轉。同一天，安陽失守；六日，松江失守；八日，任縣失守；九日，上海、太原失守；十一日，大名失守；十三日，濟陽失



陪同陶德曼前往南京，報告日方和談條件的外交部次長徐漢。

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崑山失守；十八日，煙台失守；十九日，嘉興失守；二十日，蘇州失守；二十四日，吳興失守；二十五日，無錫、長興失守；二十九日宜興、武進失守；三十日，溧陽、廣德失守。前線既是「日蹙百里」，國際又無援助，中國也只得重拾德國調停之議了。

北京會議結束後兩天，十一月二十六日，陶德曼在漢口拜訪回國不久的孔祥熙，重申德國政府出面調停的意願。稍後，又兩度會見孔及外長王寵惠，表示日本的和談條件與先前相同，不會改變。同時警告：日方聲稱，如果戰事延長，將來條件必定苛刻幾倍。會晤結束之前，陶提出直接面達蔣委員長的要求。經過孔、王向南京報告，陶乃在外交部次長徐漢的陪同之下，於十二月二日早上抵達南京。

抵京後，徐漢先入見委員長。委員長在聽取報告後，隨即召開「軍事長官會報」。與會的有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人。會中先由徐漢重述日方條件，既畢，各人就問有無別的要求？是否限制我國軍備？徐漢回答：只是現在所提的條件，並無其他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委員長就問唐生智意見，唐沒有馬上回應。又問白崇禧，白懷疑說：只是如此條件，那麼何必打仗？徐漢乃又強調，陶大使只提了這幾項條件。蔣接著問徐永昌，徐認為：如果只是這些條

件，可以答應。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最後回頭再問唐生智，唐也贊同大家意見。於是蔣委員長做出結論：

- 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
「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
- 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當天下午五點，委員長接見陶德曼，表示中國對日本不敢信任，但德國是好朋友，好朋友這樣出力，爲了信任與感謝，中國願意以這些條件做爲談判的基礎。但堅持兩點：

- 一、在談判中，德國須任調人到底。
- 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

同時日本不能自視爲戰勝國，不可以這些條件做爲「哀的美頓書」。陶德曼於是作出保證，這不是「哀的美頓書」，並建議中國在交涉時宜採忍讓態度。最後委員長又要求德國向日本轉達，先停戰再談判。陶表示可由希特勒向日本提出。

緩兵之計

這段謀和的經過，自從前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在河內發表〈舉一個例〉，

加以披露以來，就一直被許多方面引為蔣「賣國」的「鐵證」。其實，蔣委員長同意德國調停，是形格勢禁下不得不然的抉擇。

本來從抗戰開始以來，蔣就一再堅持「國際調解則可，直接交涉則不可」的立場，呼籲各國干預，不願和日本單獨談判。所以比京會議之初，國府曾寄望國際間能夠組成仲裁調解的機構，來監督雙方停火、談判的事宜。到了十一月十三日，由於日本悍然拒絕參加會議，各國又缺乏制裁的誠意，國府不得不降低要求：

倘各國正式或非正式促令日本，倣照「華盛頓會議」解決「山東問題」辦法：與日本直接商談，同時受有關係國之協助。則我方可不反對。

也就是說，中國不再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但必須「受有關係國之協助」，也就是要各國「背書」，在過程中替中國作保。

然而隨著比京會議的落幕，「國際調解」的期盼顯然也落空了，國府只得重新考慮「直接交涉」。雖然知道德國不見得可靠，但還是寄望它能主持公道，不要棄中國於日本的刀俎之上。所以委員長才會要求陶德曼「須任調人到底」，意思就是要德國為這次談判擔保負責，不要為德不卒。

但是德國當時並沒有出面作保的意願。從介入調解開始，德國的態度就是希望從中拉線以後，由當事國自己去談。早在十月底，德國的外交次長就表明立場：「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並不想

超出一個遞信員的地位。」國府同意和談當天，陶德曼也向委員長聲明：「德國無意直接參加和平談判、或主持談判，我們寧願盡我們的力量，在幕後幫助中國。」

這樣孤立無援的狀況，如果說蔣仍癡心於和談的成功，恐怕失之簡單。他的打算毋寧只是「緩兵」。因為日本不顧國聯及《九國公約》的決議，各國又都姑息無所表示；「國防線」作戰既告失利，南京已是危在旦夕。所以當前首要的工作就是促成停戰，以爭取喘息的時間。這點考慮，顧維鈞在北京會議時曾被告知：

駐布魯塞爾的中國助理武官來訪，並說：如果出現和平的機會，我們應該不放過它。他解釋說，中國士兵一旦戰敗，很容易喪失鬥志。他認為，抗戰力量已達到頂點，可以目前軍事形勢的現狀為基礎，準備停戰。……我懷疑他是代表南京的參謀總長在說話，把參謀總長的意思傳達給代表團。

結果十一月十五日，僅僅一天之中，顧維鈞就接獲南京八封電報，催促代表團設法停戰。蓋當日正是國軍全面潰退、「吳福線」岌岌告危之際也。

正因談判在於緩兵，所以謀和之外，蔣委員長也力圖整軍。十二月二日，在接受了日方條件、要求「先停戰再談判」之後，他就囑咐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查明第二線補充師的位置，並起稿告誡他們，要「加倍努力訓練」：

當此嚴重時期，各官長更應以身作率，加倍努力訓練，……此時若無臥薪嘗膽、百折不回之精神，則國亡種滅，即在目前，復何能達成復興民族、完成革命之使命？其將何以對先烈與總理在天之靈也？等意，切實告戒。中正。

這也足見蔣「緩兵」的用心了。

日軍加緊進攻

對於蔣停戰緩兵的想法，日方何嘗不知。就在陶德曼到南京呈遞條件的前一天，十二月一日，日軍下達了攻略南京的命令。等到國府同意談判的消息傳來，日本陸軍高層又在八日作成決議：

認爲蔣委員長並無反省之意，如將來能反省則另當別論，否則如現在的態度，我方即不予答應；……（陸軍）大臣應會晤海相、首相，商妥暫時予以拒絕，以促使其反省。隔一段時間後，向德國大使提示我方所考慮的條件。

這時日本政府、軍部乃至輿論，對於「支那事變」在看法上雖有軟硬之分，但都相信應該繼續施加壓力，以謀中國戰鬥意志的徹底摧毀。所以儘管信使魚雁往返，日軍仍然不停向南京推進。孔祥熙還因此怒告陶德曼：「無人瞭解蔣委員長準備議和時，日本卻仍朝南京進攻。」



和談期間，日軍仍繼續轟炸南京，企圖以戰迫和。

E軍偵察隊在南京近郊出現了。



持續進攻的同時，由於近一個月來的連串勝利，日本政府也開始改變主意了。當十二月七日，狄克生將蔣委員長同意和談的備忘錄交予廣田時，廣田竟懷疑，「是否可以在一個月以前所擬製的基礎上談判」，並表示：「最近幾個星期已經發生了不同的情況，陸軍的要求已經比以前苛刻了！」

正由於日本人想打下南京再說，因此對於國府而言，南京的防衛與談判的進行，就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一方面，守住南京可以增加談判的籌碼，保證和談條件的不變；另一方面，如果條件不變，和談有成，南京也可以保全。所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指示高級將領們，「南京守城，非守與不守之問題，而是固守的時間問題」：

預計敵（十二月）十日左右方能到達南京城下，再固守兩週以上，約需月餘之時間。故我全軍各部隊，應設法迅速補充，使月餘後充實戰鬥力……。

如果南京能夠固守兩週以上，不但可以減殺日軍氣焰，有利於和談；還可以爭取國軍整備的時間，恢復戰鬥力。

和談條件改變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南京並未能如預期中，固守得那麼久，十二月十三日，只經過八天的戰

門，就失守了。日本政府這才又開始加緊逼和的脚步，近衛內閣在二十一日決定了新的和談條件：

- 一、中國必須放棄其容共和反日、「滿」的政策，並對日、「滿」的防共政策予以合作。
- 二、在必要的地區設立非軍事區和設置特殊機構。
- 三、在日、「滿」、中之間締結密切合作的經濟協定。
- 四、中國對日本需作必要的賠償。

第二天，廣田把這些條件轉給狄克生，並威脅說：如果中國不接受這些條件，日本將不得不採取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立場，來處理事變。和談期間，日本的軍事行動將持續下去，欲其停止，必須在和約締結以後才有可能。

二十六日，陶德曼會見了孔祥熙和宋美齡，傳達日方的新條件。孔、宋兩人都爲了條件之苛而深感驚訝。孔向陶反映，這些條件沒有人會接受，並詢以德國的看法，陶德曼則拒絕回答。

不過稍後，中國方面也沒有正式拒絕這些條件。究竟國府如何看待新條件，至今還是一個問題。日方資料援引汪兆銘的自述說，收到廣田的答覆後，張群、王寵惠、孔祥熙和汪自己曾經集議，達成過「受諾」的結論。之後向蔣報告，蔣一副「無話可說」的樣子。但因爲茲事體大，還是決定待白崇禧、李宗仁和閻錫山等戰區司令長官從前線回來，再做討論。因此從十二月三十日到第二年的元旦，三天之間，國府內部召開了「最高國防會議」，而在除夕當天，議決接受新條件。會中同時接受蔣辭卸行政院長兼職，由孔祥熙接任；副院長則由張群擔任。汪說，這是因爲

蔣要規避和談責任的原故。

但同一件事情，中國方面則有迥然不同的說法。學者引用該次「國防會議」記錄，說日方條件轉來以後，蔣委員長認為這「妨礙國家生存條件，如外交、財政、政治一無自由，無從談起」，因此目前：

一、革命之立場不可放棄。

二、外交途徑未絕望。

三、財政雖困難，軍事上需要時間整理，可以有為。

「決定暫不正式答覆」，而將日方備忘錄內容密告英、美、法、蘇各國，探詢態度。

耐人尋味的是，連國府密告各國的電文，對於新條件的態度，也都是看人說話。或許是爲了爭取俄援，在發給駐俄「軍事代表團」團長楊杰的電報中，語氣就很強硬：

我政府認爲上項條件無考慮之餘地，委座囑執事密告蘇聯政府，並聽取其意見電覆。

彷彿義無反顧，沒什麼好再商量的。但在通知東京大使館的電文裏，立場就又相當和緩：

政府對此方案正在研究，或須就重要各點，再請德方轉詢日方意思。在政府未決定最後辦法以前，執事可常與駐東京德大使連絡談話，聽取其所述，勿表示具體意見；同時日方如有

要人求見，勿予拒絕，而以同樣態度應付。

似乎還未放棄周旋，仍希望探詢進一步的消息。

調停終歸失敗

由以上種種情況看來，國府真正的打算，其實還是在於「拖」字訣，也就是所謂「戰略性模糊」的策略上。因此儘管日方一再催促，王寵惠、孔祥熙只是不斷以「日本所提各項過於廣泛」、「希望日本開一詳細之說明後，始能加以考慮」等辭令來應付。不過白崇禧、閻錫山等司令長官在過完年後，就離開武漢，回前線去了。委員長本人也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四日出發，前往開封指揮作戰。主角們都走了，戲自然是擺明不唱了。

這種拖延戰術，日方當然不會不知。一月十四日，廣田暴跳如雷地說：「中國的答覆是逃避的藉口！」兩天之後，近衛首相就發表了著名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

在攻略南京後，帝國政府爲了再給支那國民政府最後反省機會，一直等待至今。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之真意，竟策動抗戰，內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全局的和平。因此帝國政府今後將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提攜之新興支那政權的成立發展，並與之調整兩國國交、協力更立新支那的建設……。

片面否定了國府做爲「中央政府」的代表性，意圖另外扶植傀儡政權。所以一月十八日，近衛又再次補充聲明：

所謂「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比對該政府的否認更加強硬。原來從國際法上說，只要承認新政權，則否認國民政府的目的就可達成。但因尚未到達正式承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時期，所以這次開國際法上的新例，在否認國民政府的同時，把它徹底抹殺……。

既然連對口政府的資格都不承認，交涉斡旋自然也談不上了。一月十六日廣田約見狄克生，正式中止對華媾和的行動。德國外交部隨即於次日電告陶德曼：遞信員的身分已經終止。德國的調停到此完全失敗。二十日，國府召回仍在東京的大使許世英，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也在二十八日撤回。京滬作戰期間雙方的和平接觸，到此才告一段落。

這時已是南京易手的一個多月以後了。

第十章 南京爭奪

正當德國信使穿梭往返之際，中、日間的戰火仍在不停地蔓燒。十一月十九日，由金山衛登陸的日軍第十軍攻下嘉興，突破了「乍嘉國防線」。軍長柳川平助不顧上級「統制線」的限制，獨斷下令繼續追擊，直指太湖南岸的吳興、長興，就此揭開了南京保衛戰的序幕。

太湖南岸的戰鬥

南京，素稱「地勢險阻」，諸葛亮論金陵地形，說它「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然而實際上，要守住南京，並不能只在城門口逼城而守，而是必須守住外圍線：最好能在乍浦、平望、嘉興、蘇州、福山和無錫、江陰一帶；最少也得在溧水、句容到鎮江之線。這是因為南京西、北環繞長江，東面阻於鍾山，陸路交通都由南面出入，所以日軍如果由東而來，「南據溧陽，東擣鎮江，西扼太平（當塗）」，切斷南京的對外聯絡，「據險阻、絕糧道」，就可以「不戰而下金陵」。

因此第十軍沿太湖南岸推進，對於南京的防務，以及國軍的轉移，都構成了重大的威脅。一旦日軍繼續進趨長興、廣德，再攻下蕪湖、當塗，不但能夠包圍南京，還可以捕捉由上海撤退下來、至今仍滯留於「國防線」的國軍主力。所以十一月十六日，顧祝同傳令廣西兩個師火速趕到長興附近布防，並催促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所部、新由四川出發的川軍六個師，集中廣德。二十一日蔣委員長還親下條諭給桂軍，強調吳興的重要性：

吳興為今日抗戰全局之重心，即為第三戰區之樞紐。特以此重任，賦予我忠勇之第七軍，深維我第七軍方能負此重任。務希我全軍將士深體此意，努力奮勉、堅忍果決，不惜任何犧牲，死守陣地，殺敵致果。完成抗戰之使命，奠定復興之基礎，是為至要。

然而這時太湖南岸紊亂的程度，較之北岸「國防線」正面不遑多讓。十幾萬潰軍夾雜在難民之中，勢如潮湧地向西奔逃。日機一路跟蹤掃射，少數日軍也乘隙突襲，間諜混跡其中，秩序擾攘不堪。桂軍七個團在轉運不及的狀況下，倉促趕到長興，既缺乏預備隊，空軍、砲兵的支援更付之闕如，部隊連戰防砲都沒有幾門。面對日軍優勢的火力，只能靠著士兵們冒死衝鋒，蟻集爬上戰車，用手榴彈和肉搏戰相周旋。整個作戰期間，中央沒有派員連絡，又不曾建立指揮系統，對於背後大軍撤退的情形，也茫然無所知。這麼侷促，自然難望持久，二十四日吳興易手，二十五日長興再失。

吳興、長興相繼失守之際，負責後方廣德防務的川軍卻還集結未畢。川軍編入國軍序列，是

最近一年的事情，部隊在裝備上相對比較簡陋。七月六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川康整軍會議」，目的就在裁軍省費、重組川軍。沒想到第二天「七七」事變爆發，大會匆匆結束。結果川軍各單位的編制還是停留在地方部隊的形式，既沒有醫院與後勤組織，連、排裏頭也沒有擔架救護人員。但迫於戰況緊急，無暇改編，只好將就舊有編制，徵調出川。

而出川前，本來已和中央協議好，等換發武器、充實戰備以後，再投入戰鬥。殊不料又因前線需兵孔急，各軍剛到指定地點，臨時就奉命趕赴戰場。結果彈藥的補充、糧食的供給，以及傷亡的收容，都毫無準備，甚至缺少戰區的地圖。官兵們都是秋初就從四川徒步出發，只穿單衣、赤腳草鞋。一路走來，草鞋早已穿爛，等到南京附近，又碰到天降大雨，道路泥濘。新修的公路多是碎石路面，大家的腳都磨破了，只能在休息時，用麻線將裂開處縫合。這樣雖想趕快，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如此忙亂之中，川軍就在廣德、泗安一帶與日軍遭遇了。由於沒有後勤組織，火線附近的居民又都走避，部隊拿錢也買不到糧食，官兵每天只能早晚吃到兩餐；既無彈藥補充，給養更沒著落，師部雖然逐日將戰況上報，也無一紙回音；同時各級官長「保存實力」的觀念濃厚，動輒就想撤退，師、旅長都掌握不住。而四川兵過去只有內戰的經驗，一輩子沒有見過裝甲車輛，這些武器一出現，心理上就處於劣勢，往往不戰自潰。結果十一月三十日廣德易手，不到兩天，泗安也告失守。之後日軍沿著宣城到蕪湖的公路，在十二月十日佔領了蕪湖，南京至此陷入重圍。

薄弱的城防工事

就在日軍越過「統制線」、進擊太湖南岸的翌日，十一月二十日，唐生智就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正式接手南京的防衛事宜。

原先在戰前，國軍參謀本部就曾針對首都的防禦工事進行過修築。當時考慮了南京容易遭受包圍的特性，所以陣地的設計就是要使進犯的敵軍不能合圍；即使合圍，也要能夠獨立作戰，盡量殲敵於陣地之前。

基於這樣的構想，國軍除了在太湖流域設置「吳福」、「錫澄」和「乍嘉」三條國防線外，還在南京外圍及城郊陸續規畫了「外圍陣地」和「複廓陣地」。「外圍陣地」選定龍潭—湯山—淳化鎮—牛首山—大勝關一線，兩翼依托長江，形成一條弧線，以東南為主要防禦方向。「複廓陣地」則以南京城牆為內廓，再在城牆周沿選定烏龍山—幕府山—紫金山—雨花臺一線為外廓，形成城內、城外兩道永久工事，以期固守。

然而這些規畫，顯然並未落實。上海開戰不久，國府就已經發現過去構築的工事不夠理想，許多都沒有注意隱蔽，根本無法利用；有的則缺少陣地編成要圖，也須要重新選定位置。所以九月間，蔣委員長就曾責成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督促教導總隊進行搶修。但是由於上海戰況激烈，各部隊一到南京，總是立即轉赴前線，始終沒有能夠固定下來構工的。同時國府高層也有一種錯

覺，以為即使上海不守，也還有「吳福」及「錫澄」兩道國防線，足可擋上一陣。因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海，對於首都的防務也就沒有認真地準備。

於是，等到十一月中、下旬，「國防線」遽然瓦解之際，漁陽鼙鼓動地來，再要張羅防禦設施，為時已晚。擔任長江封鎖任務的第二軍團長徐源泉，到達烏龍山要塞後，向蔣委員長報告說：「該線不特無預築之陣地，即要塞區之工事，亦未完成。」宋希濂的三十六師在十一月二十二日退到南京，奉命趕築複廓陣地，結果「所要民伋無著」，只能以本身所餘部隊，「自行擔任構築」。但是「原有實力甚微，而擔任工區過廣」，而且「補充新兵逐次到達，必須整理」，以致「迄二十五日止，工事殊少進展」。

影響所及，各處陣地弊病百出。教導總隊進入防區時，發現中山門到光華門間，城牆上修築的所謂「鋼筋水泥」工事，只是外表塗了水泥，裏頭橫樑竟然都是些南竹，而且日久已經腐爛了。五十一師師長王耀武布防淳化鎮一帶，工事有的被土埋著，有的門還打不開，機槍掩體的槍眼又開得太大，容易遭到破壞。官兵們雖然緊急補強，但還沒來得及完成，日軍已經出現了。

嚴重的兵力短缺

除了硬體設施有名無實之外，守城兵力的短缺也極其嚴重。本來國軍戰前的推演，一旦畿輔決戰，「外圍陣地」應集結四個完整的軍，也就是十二個師的兵力；另外長江北岸浦口一帶要駐

紮一個軍。整個戰區的總兵力預估為十五個師。

然而上海作戰堅持了三個月，國軍所有能夠參戰的部隊都已經調來了，而且相繼遭受慘重的損失。到十一月下旬時，南京、蕪湖、長江兩岸之地，國府已無一支完整的野戰軍可用。困窘之餘，防衛計畫曾一度縮水成只守複廓，放棄「外圍陣地」。十一月二十六日，軍事委員會頒布了《首都保衛軍戰鬥序列》，列名的只有孫元良的八十八師、宋希濂的三十六師、桂永清的教導總隊，以及少數的憲兵團隊而已。至於其他部隊，都開始朝南方的廣德、寧國一帶轉移，連陳誠、顧祝同等將領也都離京，到皖南部署整頓去了。

可是稍後，由於蔣委員長幡然變計，於是又把可用之兵掃數搜羅，以保衛南京；同時決定回防「外圍陣地」。結果兵力愈增愈多，達到十四個師，八萬多人之譜。這其中，因為是要保衛首都，蔣委員長還盡先將一些裝備較齊、戰績較佳的嫡系部隊撥入戰列，例如三十六師、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五十一師、五十八師、教導總隊等，原先都是在「中央軍」裏具有特殊地位的。

可惜這樣子竭澤而漁，並沒有改善多少問題。首先，整體兵力仍然相當單薄。根據估算，參戰的十四個師，足額應該有十八萬人左右，但唐生智司令部當時所作的統計，只得八萬多人而已（見表五）。就以當時駐紮紫金山的教導總隊為例：它本來是「中央軍校」編組做為德式操典的示範部隊，所以從武器、裝備、鋼盔、乃至軍樂隊，清一色都是德國舶來品。但在經歷上海之役以後，全隊打得只剩下一個空殼子。雖經補充，每連平均還是比定額短少達百分之十五。

其次，兵力結構也是問題重重。八萬多人裏頭，戰鬥兵只有四萬九千人，其他都是些勤務、

表五 「南京保衛戰」國軍兵力一覽表

番 號		戰鬥前兵力		總 計	備 註
		戰鬥兵	雜 兵		
第二 軍團	四十一師	12,000	6,000	18,000	內新兵佔 五分之四
	四十八師				
六 六 軍	一五九師	4,500	2,500	7,000	
	一六〇師				
八 三 軍	一五四師	4,000	1,500	5,500	
	一五六師				
第三十六師		4,000	3,000	7,000	內新兵二千
第五十一師		4,000	2,000	6,000	內新兵二千
第五十八師		4,000	3,000	7,000	內新兵二千
第八十七師		3,500	3,000	6,500	內新兵二千
第八十八師		4,000	3,000	7,000	內新兵三千
教導總隊		7,000	4,000	11,000	內新兵五千
第一〇三師		2,000	4,000	6,000	
第一一二師					
憲兵及直屬部隊					
合計		49,000	32,000	81,000	新兵約三萬

* 資料來源：譚道平《南京衛戍戰史話》頁九三—九五（東南文化事業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伙伙之類的非戰鬥人員。而且新兵過多，達到三萬名左右，都是臨時撥補到各師的（見表五）。這些新兵沒見過陣仗，根本無法作戰。所有留守的部隊，都為此苦惱不已。教導總隊的工兵營長鈕先銘在圍城前一個星期，還收到一百多名新兵。怎麼辦呢？總要用啊！只好做上幾十個石灰靶，一次教完步槍射擊，就算了事了。

而在南京才投入戰鬥的徐源泉第二軍團，處境更爲尷尬。由於是所謂的「雜牌」，屬於原「直魯軍」張宗昌遺留下來待編的部隊，所以在上海吃緊之時，他們曾經奉命抽調老兵「撥補」前線。結果兩個師一口氣被調走了一萬多人，包括半數的班長以及三分之一的連、排長，整個軍團就此成了空架子。直到十一月底，由武漢東下增援時，兵員都還沒有補齊，訓練的時間也不夠。最後只好在船上給新兵換穿軍裝、領取槍彈，學習怎樣裝退子彈、瞄準射擊。如此應急訓練，能培養出多少戰力，不喻可知了。

外圍陣地的棄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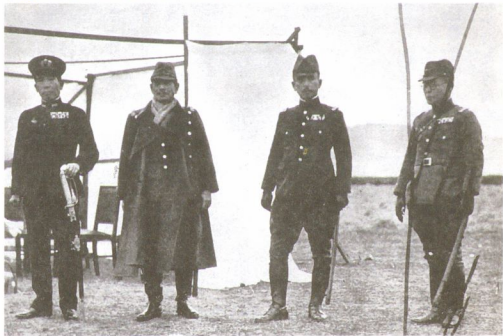
整個南京保衛戰約可分爲兩個階段：十二月四日到八日是第一階段，主要戰場在「外圍陣地」的湯山和淳化鎮一帶；九日到十二日是第二階段，爭奪焦點則在「複廓陣地」和東南城垣。

十二月一日，日軍下達「攻略敵國首都南京」的指令以後，就兵分三路，由東、南、西三面，像把大鉗一般，直逼南京：右路沿著「京滬鐵路」西進；中路由宜興經溧陽、句容攻南京；左路



十一月三十日，日軍第六師團攻下廣德。

日軍進攻南京的將領群。左起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中支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朝香宮大將及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因當時第十軍屬於未公開部隊，故日軍新聞單位將之劃除。



則由太湖南岸前進，先攻廣德、宣城，趨蕪湖，截斷守軍退路，再向南京合圍。十二月四日日軍沿著「京蕪鐵路」與「京杭國道」進逼，佔領了句容及秣陵關。五日，開始以主力進攻淳化鎮和湯山。雙方激戰到八日，湯山易手。這時唐生智爲了集中力量，固守核心陣地，乃在午後下令各部隊向後轉移。結果整個「外圍陣地」一夕棄守，保衛戰就進入了複廓戰鬥的階段。

外圍戰鬥之所以失利，守軍經驗不足與士氣不振是主要的因素。各部隊新兵太多，往往未經訓練就被派上火線，對於武器的性能缺乏了解，既設陣地也不會利用，和官長間又不熟悉，掌握相當困難。到了戰場，把頭埋在地下盲目射擊的有之，投擲手榴彈不曉得要拉引線的有之，甚至手榴彈扔出去以後，沒有炸死敵人，反而把自己炸死的。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就報告所部某團的狀況是「束手待斃」：

卒以所部究屬新編，連、排長指揮能力薄弱，意志極不統一。士兵亦無訓練，類多束手待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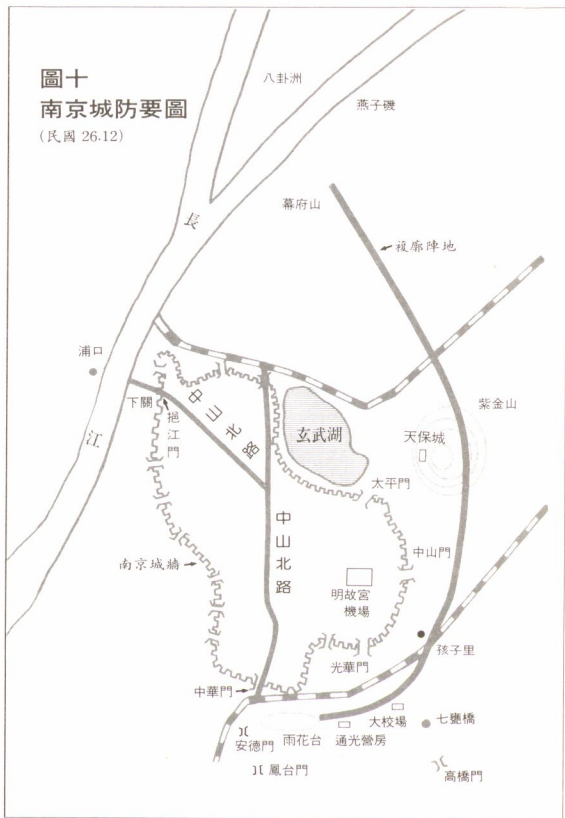
後來唐生智及羅卓英在總結作戰失敗的原因時，也直指新兵過多，是「失敗之總因」：

新補士兵過多，上下之間多不認識，因之各級掌握難於確實。尤以戰機危迫、戰況劇烈時，一退不易復進，一潰不可收拾。此可痛之事實，亦失敗之總因也。

另外，守軍集結失之過遲。由於許多單位都是日軍攻抵近郊以後，才陸續開到南京。所以不

圖十 南京城防要圖

(民國 26.12)



論是對地形的認識、工事的搶修、敵情的搜索，還是官兵精神的恢復，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最後，各級主官士氣不振，「畏懼敵人心理過甚」，因而率皆採取消極的戰術作爲，「但求局部苟安，全無旺盛企圖心」；彼此間又缺乏互信，惟恐被友軍「放鴿子」，沒有獨立作戰的勇氣，導致道聽塗說，任意揣想戰況的不利。於是「部隊一經佔領陣地，即無法活用，敵得集中力量，任意選擇攻擊目標」，被動挨打的結果，「以我軍素質裝備與敵懸殊，欲固守一地，自亦難矣」。

城垣周邊的苦戰

十二月八日午後，「外圍陣地」棄守，保衛戰進入複廓戰鬥的階段。但是因爲國軍轉移前沒有全盤計畫，各處的撤退都很紊亂，致使佔領淳化鎮的日軍得以長驅直入，順利通過高橋門、七甕橋附近多座橋樑，而在九日拂曉進抵南京城垣，攻佔了城外大校場和通光營房，直逼光華門。

這時光華門一帶只有少數教導總隊官兵，因見情勢危急，趕緊封閉城門，並把沙包堆到半個城牆高，暫時阻滯了敵人的突進。日軍隨即將砲兵推進到高橋門，面對光華門展開砲擊。城門很快就被砲火給掀了下來，泥沙頓時向外傾瀉，一百多名日軍就從沙堆裏爬進城來，但是又遭到守軍殲滅。之後城門隨堵隨破，隨破隨堵，日軍幾次衝入，都被逐退。拉鋸戰進行到下午，守軍獲得增援，將大校場收復，局面才算穩定下來。

第二天，雙方戰鬥更加激烈。南京城牆雖然堅固，經過兩天的炸射，也已承受不住。光華門城廓被轟開了兩處缺口，日軍兩度衝入，午後甚至滲透到城裏一百多公尺處，佔據了街道兩旁的房屋，企圖掩護後續部隊擴大戰果。負責防務的桂永清看到事態嚴重，還親上火線督戰，在通往城裏的道路上疊起五道防線，準備隨時巷戰。後來經過官兵們不斷用沙包堵塞城牆缺口，集中火力壓制滲透進來的敵人，再以集束手榴彈對抗日軍的戰車，危機才終於化解。

但是這時，城外的通光營房和城門洞裏頭，還是有日軍憑險據守，頑抗不退，甚至在城門洞裏偷偷掏挖。守軍在城頭掃射不到他們，於是就趁入夜以後，挑選出幾十名敢死隊，縋懸而下，先用棉花蘸汽油焚燒，逼迫他們離開城門洞口，再用手榴彈、機槍將之全數擊斃。之後還連夜突襲通光營房，將該處日軍也加以驅逐，光華門的戰局總算轉危為安。

正當光華門戰況轉穩之際，雨花臺、紫金山、中山門各處都已出現敵蹤。雨花臺是塊高地，俯瞰中華門，逼臨城市。控制了這個制高點，全城如在釜中，因此向與紫金山並列為兵家必爭之地。所以日軍光華門攻勢受挫以後，就把重點轉移到這個方面來。

當時負責雨花台防務的是孫元良的八十八師，第一線只有三千五百人左右。十日上午，日機編隊開始密集轟炸，午後雨花臺東、西高地相繼失守，日軍砲兵向前推進，掩護著戰車和步兵接近城垣。當晚，中華門一角被砲火轟塌，守軍無法立足，陷入混亂，潰退進城時，雲梯、城門撤閉不及，一度被日軍搶入三百多人。副司令長官羅卓英為此還親臨第一線指揮，和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直到深夜才稍獲喘息。



十二月十一日，因日軍猛攻，南京城內處處烽煙。



十二月十二日，日軍開始架雲梯攻城。

中山門的戰鬥也在十日展開。當天，黔軍一〇三師的團長萬式炯剛由鎮江趕到南京，奉命駐守中山門，就看到城下孝陵衛方向，敵人密如螻蟻、蜂擁而至。入夜以後，日軍開始架雲梯爬坡，守軍則用刺刀將他們一個個戳下去，一時間彷彿回到了上個世紀。第二天，日軍改用機砲炸射，守軍則努力進行搶修，身軀每每和沙袋一起被炸上天。十二日以後，日軍實施鑿鋸式的砲擊法，一砲、十砲、百砲，專打一點，慢慢將城牆打出缺口來。缺口越打越大，最後連戰車都開得進來了。守軍雖然繼續以沙包進行防堵，但只是徒勞，石頭城已經失去作用了。

混亂的加劇

十二日，孤城終於面臨它最後的宿命。

這天拂曉開始，日軍就將火力集中在雨花臺及紫金山兩方面。雨花臺上的八十八師死傷殆盡，所部三位旅長陣亡了兩位，六位團長陣亡了三位，營長陣亡十一員，連、排長傷亡更達十分之八。後來的〈戰鬥詳報〉描述說：

十二日晨，沿京蕪鐵路進攻之敵已逼近賽虹橋。雨花臺方面因係敵主攻所在，雖經全部我官兵奮勇苦鬥，奈外無糧彈、內無援兵，且敵挾戰車、飛機、大砲及精銳陸軍不斷施行猛攻，……上午，韓團長憲元、營長黃琪、周鴻、符儀廷先後殉難；下午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



日軍逼近中華門。



中華門附近，日軍以雲梯登城。

華品章，營長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亦以彈盡援絕，或自殺、或陣亡，悲壯慘烈。全部官兵六千餘員，皆英勇壯烈殉國。

下午，戰況進一步惡化。安德門、鳳台門相繼易手，雨花臺陣地也被突破。日軍加緊砲轟中華門，且有少數衝入城內，旋被守軍殲滅。午後兩點，彈盡援絕的雨花臺終告失守，八十八師雖然還在中華門內外逐點據守，但已呈現混亂狀態。師長孫元良在城門樓上，目睹自己的部隊由雨花臺潰退下來，因為城門封閉，又沒有爬城的工具，無法進城，只能沿著護城河兩岸亂跑，最後犧牲在日軍的追擊之下，卻無能為力。當時王耀武五十一師的左翼和八十八師接鄰，後者潰兵一千多人跑到他們防區前面，想要越過防線，逃往下關。守軍因為上級有令，堅持不讓，雙方竟而互相開火，打了起來，還造成傷亡。

而隨著戰況的惡化，城裏頭的混亂也逐漸擴大。中華門一帶本來就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尤其土生土長的南京人，以及無力他遷的貧民，多半都住在這個區域。這一天中華門爭奪激烈，落彈最多，許多房屋被毀，於是就造成了居民的恐慌，紛紛避往「安全區」。倉皇逃難之餘，又高呼親友，奔相走告，說日軍已經衝進城來了。弄得謠言蠱起，人心動搖。八十八師和其他各部隊的潰兵，也加入行列，以致通往下關碼頭的中山路上，人潮洶湧，擁擠不堪。

爲了收拾局面，唐生智在中午時分，下令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封鎖下關：

一、下關浦口爲我軍後方唯一交通路，該軍應竭力維持秩序，禁止散兵游勇聚集，以確

保要點。

二、七十四軍在上河鎮與敵激戰。其後方交通，由漢西門與城內連絡。禁止一切散兵及部隊，通過三汊河退入下關。

稍後又指定三十六師在下關戒嚴，禁止一切活動，並構築工事，準備巷戰。

午後兩點多，雨花臺遭到攻陷，八十八師在日軍重砲的瞰射下，難以支持。部分官兵就爬進城內，由師長孫元良親自帶領，直趨挹江門，想從下關渡江。唐生智長官部的「特務隊」出面阻攔，竟然反遭包圍。後經三十六師堵勸，才收容了兩千多人，仍交孫元良帶回中華門作戰。四點多，俞濟時七十四軍由三汊河向下關架設浮橋，做撤退打算，也被長官部制止。

最後宿命

從四日開始，八天以來，日軍飛機晝夜狂炸南京，整個城裏因而充滿了硫磺、碳酸、火藥的味道。守軍無不望眼欲穿，盼望援兵的到來，卻是一機一砲也沒見到。參謀們每天徵調部隊上火線，帳面上明明寫的是一個師或一個軍，但實際開上去的，往往都不過是一個營或一個團。儘管如此，殘兵們還是在嚴令之下，繼續遂行著戰鬥。他們不但缺乏火砲，連步槍都已經不足以構成火網，彈藥、衛生包等軍需品也極端匱乏。各項交通器材多已隨著政府西遷，而各部隊原有者，



日軍戰車衝入南京的前一刻，城牆上國軍所寫「誓復國仇」標語，清晰可見。



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所部最早進入南京，主導了「南京大屠殺」。戰後由國府處以槍決。

又多拋棄在上海撤退的路上，因此不論是彈藥的補充、傷兵的救護，還是城垣搶修材料的運送，都備感困難。

十二日一整天，南京四周的明代城垣被日軍密集的砲火炸得石塊亂飛、城門洞開，城內的士兵看得到城外的敵人了。幾十架日機盤旋空中，〈勸降布告〉和炸彈一起灑下，上面寫著：

日軍百萬，既席捲江南，南京又處包圍之中。由戰局大勢觀之，今後交戰有百害而無一利。惟江寧之地，乃中國古城、民國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蹟、名勝蜚集，宛然有東亞文化精髓所在之感。日軍對抵抗者雖極嚴厲而弗寬恕，然於無辜民衆、及無敵意之中國軍隊，決以寬大處之，不加侵害。至於東亞文化，自有保護之熱情。貴軍苟欲繼續交戰，則南京勢必難免戰禍。是使千載文化盡爲灰燼，十年經營全成泡影。故本司令官代表日軍奉勸貴軍：當和平開放南京城……。

這時，八十八師的雨花臺，八十七師的工兵學校、孩子里，教導總隊的紫金山，幾個屏障城垣的核心陣地都已失守，南京真正是兵臨城下了。築城技術與攻擊火器是平行發展的，現代化的要塞工事都無法阻擋，古人所築的城牆又何足恃呢？不祥的預感籠罩在守軍心中，許多部隊索性各自行動。城裏秩序大亂，遠近火光燭天……。

保衛戰已到了最後關頭。

第十一章 死亡撤退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的前一刻，駐錫廬山的蔣委員長致電唐生智，要求「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爲要」：

……五日激戰，京城屹立無恙。此全賴吾兄之指揮若定，與犧牲精神有以致之。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爲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爲我革命轉敗爲勝唯一之樞機……。

文中雖仍強調「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榮」、「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但圍城裏頭陣腳已亂的衛戍部隊，卻是力有未逮了。

最後會議

對於南京這場保衛戰，蔣委員長原本是期望能夠撐上一個月的。可惜只進行到第八天，十二

月十二日，面對城裏城外急速惡化的局面，守城的將領們就已經失去了操控的能力。凌晨兩點，唐生智司令長官部的參謀譚道平被叫了去，奉命起草撤退命令：

《衛戍作命特字第一號》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於首都鐵道部衛戍司令部

命令

一、敵情如貴官所知。

二、首都衛戍部隊決於本（十二）日晚衝破當面之敵，向浙皖邊區轉進。我第七戰區各部隊刻據守安吉、柏墊（寧國東北）、孫家鋪（宣城東南）、楊柳鋪（宣城西南）之線，牽制當面之敵，並準備接應我首都各部隊之轉進。蕪湖有我第七十六師，其南石砲鎮有我第六師佔領陣地，正與敵抗戰中。

三、本日晚各部隊行動開始時機，經過區域及集結地區，如另紙附表規定。

四、要塞砲及運動困難之各種火砲並彈藥，應徹底自行炸毀，不使為敵利用。

五、通信兵團，除配屬各部隊者應隨所屬部隊行動外，其餘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內外既設一切通訊網，應協同地方通訊機關徹底破壞之。

六、各部隊突圍後運動，務避開公路，並須酌派部隊破壞重要公路橋樑，阻止敵之運動為要。

七、各部隊官兵應攜帶四日份炒米及食鹽。

八、予刻在衛戍司令部，爾後到浦鎮。

右令

司令長官 唐〇〇

命令另外還規定，除了駐防挹江門、下關一帶的三十六師可以由長江撤退之外，其餘部隊一律不准渡江，必須按照指定的路線，朝東南方向的廣德、宣城、蕪湖地區突圍。

下午五點，南京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唐生智召集了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及師長以上將領，到他的公館開會。這是保衛戰中最後一次會議。

唐生智首先開口問：「……南京現已十分危急，少數敵人業已衝入城內，在各位看來，以為尚有把握再行守衛否？」大家都面面相覷，沒有人回答。

這時唐向大家公布了委員長的兩份電文，裏頭有「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這樣的一句話，唐解釋說，這是委座允許撤退的證據。接著就拿出一份早已油印好、放棄南京的同意書，要大家在上面簽字蓋章——因為沒有遵守層峰規定的期限，就放棄首都，唐怕自己負不起這個責任，所以要大家一起背書。所有的將領都簽了。

簽完以後，唐又吩咐他的參謀長，把預先印好的撤退命令發給大家，每人一份。到會的將領們始終沒人作聲，情緒沈鬱悲憤，默默看著拱衛首都的神聖使命化成了雲煙。凝結的氣氛裏，唐繼續說道：「戰爭不是在今日結束，而是在明日繼續；戰爭不是在南京衛戍戰中結止，而是在南



開入南京城的日軍戰車。



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破中山門。牆上還留有「午前三時十分大野部隊佔領」字樣。

京以外的地區無限地延展。請大家記住今日的恥辱，爲今日的仇恨報復！各部隊應指出統率的長官，如其因爲部隊脫離掌握，無法指揮時，可以同我一起過江。」

會議不到二十分鐘就結束了。

倉皇辭廟

散會以後，「教導總隊」總隊長桂永清出了唐公館，就直奔指揮所，傳達撤退命令。他並沒有遵照長官部的指示，帶隊朝正面突圍，而是要部屬們留下少數斷後，其他自行到下關集結，各自想辦法過江。之後他就交待參謀長邱清泉處理善後，自己匆匆忙忙帶著幾個隨從，往下關走了。

正當桂永清倉皇出走之時，教導總隊的官兵們還在城外苦戰著。紫金山上滿布暗堡、戰壕和鐵絲網的陣地裏，他的副手周振強正急著打電話找他。周從山上瞭望中華門和下關方向火光燭天，心知有變，但電話老是打不進去。拖到夜裏，他派人回去看，才知道總隊長下午到司令長官部開會以後就沒有回來，參謀長邱清泉也已經離開。城裏部隊很亂，都紛紛往下關跑。周振強這才急忙趕回富貴山指揮所，召集剩餘幹部，討論去留。

另一邊，支援教導總隊的粵軍一五六師師長李江，也正急著找桂永清。奉命協同作戰的戰車排長何嘉兆站在他身邊，看著他電話怎麼打都不通，最後滿面怒容地把電話機往地上用力一擲，邊罵邊說：「老弟，完了！戰車不用了，你們開回去吧！」

在鎮江升任七十一軍軍長的王敬久，接到撤退命令以後，也沒有再回到軍部裏去。城垣作戰開始，王就把他的軍部搬到富貴山的地下室，和教導總隊擠在一起。軍長辦公室就設在邱清泉辦公室的對面，沒有帶任何參謀或副官，成天都在邱清泉那裏抽煙、打瞌睡。當唐生智要大家撤退的這個時候，他對手下早已失去了掌握。所以從唐公館一出來，他就直奔下關，跟著唐生智過江去了。

但這時，王敬久手下八十七師的旅長陳頤鼎，卻還守在城外「工兵學校」的陣地裏，忐忑踱步，拿不定主意。從下午三點以後，他們和城裏的聯絡就中斷了，始終收不到任何指示。夜裏，參謀跑來報告，接鄰的部隊都已經撤離，附近城牆上也看不到守軍了。陳這時才想到，戰局可能有了變化，趕緊派人進城了解。結果等到的，是主動棄守的消息。他一時還爲了沒有撤退命令而感到猶豫，只好召集部屬，要大家在決議上簽名，共同負責。然後才帶了部隊朝江邊移動。

一路上，陳頤鼎仍然爲著「擅離陣地」而耿耿於懷，沒想到在江邊遇到了師部副官，才知道王軍長和沈發藻師長早在下午就過江去了。陳心中又氣又恨：這場仗，糊裏糊塗地打了五天。五天之中，上級沒有和大家見過一次面、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也沒有通知部署的情況、最後又沒有傳達撤退的命令。一場首都保衛戰竟然這樣就草草結束了。

人潮湧向下關

本來，在自己國內作戰，朝正面突圍應該是比較安全的，因為沿途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援帶路，也容易通過敵軍的封鎖。可是南京現在四面楚歌，要想守城部隊向外突圍，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當教導總隊工兵營長鈕先銘聽到團長吩咐，準備出擊時，他驚訝地叫了起來：「出擊！」因為部隊正面是在中山門，那裏鈕先銘曾經親手敷設了幾條地雷帶，敵人固然過不來，自己人又何嘗出得去呢？

而且這時，除了下關，所有正面都是挨打的重心。不管往哪個方向，都需和日軍主力作面對面的頂牛。國軍各部隊多是久戰之餘，要他們再冒著砲火衝鋒，是誰也沒有把握的事情。

下午五點，當教導總隊的團長李西開接到旅長胡啓儒電話，要他代理旅上作戰事宜時，他還沒有料到，是旅長準備開小差了。等到夜裏八點，中華門失守的消息傳來，幾個團長才急忙集合起來，議定行止。李西開在會上提出「突圍」和「北撤」兩案：如果突圍，就從棲霞山附近衝出去，再向皖南轉移；如果北撤，就到燕子磯找船。結果第一團團長聽了就說：「我手下無兵，無力突圍，還是北撤為好……。」第六團團長也贊成：「我團都是上月接來的新兵，未經訓練，毫無作戰經驗，怎能突圍？還是找船過江為宜。」於是大家決定北撤，以為這樣可以跟上總隊行動，比較妥當。



十二月十三日，戰鬥後的南京市街。



日軍步兵第三十六連隊佔領光華門後，國府交通部附近軍品、車輛遺棄一地的景況。

初時，沒有人會想到，接下來所將發生的狀況。因爲下關平日是商埠及交通的中心，舢舨千里，渡江根本不成問題；而且既是主動撤退，大家都以爲會有掩護部隊留下，下關也該有大量的渡江器材才對。任誰都想不到，上級竟一點安排也沒有。

這天下午，教導總隊的小砲連長嚴開運正爲著打下一架日機，興高采烈地跑到富貴山指揮所請領獎金。結果獎金沒領到，卻領到一紙撤退令。他找到了邱清泉，邱指示盡快將火砲毀掉，然後撤退。他還沒有了解到江邊的情形，直截答說：「我捨不得。」連上那幾門「蘇羅通」小砲，是從德國買來的，得之不易呀！

所以回到連上，他就帶了部隊，拖著砲，開始朝下關出發。沿路到處都用白漆寫了：「小心，地雷！」一行人又是騾馬、又是砲，小心翼翼，繞道而行，結果兩小時的路程，走了四個多鐘頭。好容易到了下關，極目所見，卻只是隨地遺棄的車輛、黑壓壓的人群，渡江器材一點影子也沒有。人都過不了江了，誰還管渡砲呢？最後只好下令，把砲沈到江裏去。這時砲手們的眼淚都流下來了，但又能怎樣呢？

各師中只有鄧龍光的八十三軍，以及葉肇的六十六軍，兩支廣東部隊執行了突圍命令。撤退會議一開完，兩人就決定，以六十六軍作前鋒，搶先行動。但是想不到，部隊一經轉移，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官兵蜂擁擠向太平門，一時人頭鑽動，水洩不通。在軍令與紀律瓦解以後，階級也就等於零了。將軍的怒罵、汽車的喇叭，都失去了作用。官長們最後只好棄車乘馬，但馬也無迴旋餘地，又迫而棄馬步行。所有人莫不急於輕裝逃命，珍貴行李都棄如敝屣。鄧龍光用人蔘浸泡

的補酒，和幾盒頭號的高麗蔘，也遺諸道旁，乏人問津。

夜裏八點多，一班將領才擠到城門邊，卻因為初時禦敵，各城門都用沙包、泥土封死，掏挖費時。葉肇只得親自指揮，進行拆除。這時，日軍砲火不斷向城裏盲目射擊，蟻集門內的部隊迭有死傷，大家的情緒也跟着浮動起來。九點多，突然市聲鼎沸，人潮蠕動，原來前頭已經開出路來了。於是大家又是一陣爭先恐後，各顯神通，都想從城門縫裏擠出去。弱者倒地，強者踐踏而過，最後竟有被踩倒者的難友，呼天不應之下，憤而拉開手榴彈，演成同歸於盡、屍塞城門的悲劇。

挹江門

挹江門，「挹」者，以器斟酌於水之謂也，顧名思義，就是建在江邊、一手挹江的城門。城門外頭就是下關，長江碼頭的所在。所以十二日下午，棄城的消息一傳開，大家直覺的反應，都是往這裏跑。於是，在這個王氣黯然的日子里，挹江門就成了衆人的生死之門。

門內混亂的情況很早便開始了。中午剛過，從雨花臺、中華門潰退下來的大股散兵，已經沿著中山路而來。因此負責防務的宋希濂三十六師就把城門緊閉，外面用沙袋阻絕起來，只在中間留下一個瞻孔；城樓上還架起了重機槍，槍口對著城內，以防止潰兵出城。

到了下午五點，唐公館裏召開的撤退會議還沒結束，南京行將棄守的消息卻已走漏。各部隊



南京中山路鳥瞰。十二月十二日夜裡，國軍官兵曾在此歷經混亂的撤退。



日軍進城之後，開始大規模搜捕國軍。凡是手上有繭、髮理平頭者，均加以逮捕殺害。圖為十二月十六日，日軍在中山路附近搜捕的情形。

消息靈通的參謀、後勤紛紛焚燒文件、收拾細軟，朝挹江門這裏奔逃。人越聚越多，局面也越來越亂。起初還只是潰兵，慢慢的，沒有遵照命令突圍的部隊也陸續開到。司令長官部的參謀譚道平通過時，只見城門兩邊布滿了鐵絲網，中間留了條小路；士兵們舉著槍，作射擊瞄準，禁止任何人進出。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和其他退下來的官兵正在爭吵著，後面扶老攜幼的難民還在絡繹前來。老百姓的哭叫聲，夾雜著遠近不斷傳來國軍自己爆破公家建築物的聲音，城裏城外火光燭天，照耀著末日的夜空……。

譚道平算是幸運的，因為他是司令長官部的參謀，可以順利地由挹江門出城。至於其他退到這裏來的官兵，就必須自求多福了。鈕先銘帶著他的工兵營一路走來，過鼓樓之前秩序還好，但是一到鐵道部，各色人等都擁塞在路中間，前頭受阻，後面還在向前擠，你爭我奪都想盡快出城。城牆上的哨兵在架起的機槍後邊大聲喊著：「不要擠，再擠，就開槍打！」說時遲，那時快，一陣機槍的點放聲已經掠空而過，哨兵對空鳴槍了。城下成千成萬的人群，誰也弄不清楚咫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一時不辨方向，只顧躲避這陣掃射。於是人擠人倒，人踩人過，尖聲的慘叫撕裂著人心，情況混亂起來了。

一陣槍響剛過，接著又是另一陣槍響。彈道壓低了，流彈傷到了人，局面就更加混亂了。五十一師師長王耀武雜在亂軍之中，子彈颯颯地從頭上飛過，周圍的官兵亂喊著要和他們對打，立刻就有人端起槍，叭叭地朝城頭開了火，上下互射，自己人打起自己人來了。城下的軍民人等，總有城上守軍的百倍以上，喻之以理無法解決問題，威之以力就未始不能突圍了，更何況守軍自

己也無心久留呢！

正亂著間，一輛滿載彈藥的卡車忽然在人群之中炸了開來，頓時人仰馬翻，血肉橫飛，亂騰到了極點。本來城門就只被撞開半邊，人多門窄，已經極為擁擠；而被遺棄的大小車輛，又像人海中的塊塊礁石，擋住了去路。王耀武親眼看到一輛馬車被擠翻在地，人們光顧著逃命，寧可踩著馬、越過車，就是沒人肯去把它們拉開。鈕先銘還「撿」到一輛小轎車，因為車被丟在路上，引擎還發動著——它的主人捨之逃命，連讓引擎熄火的瞬間都不肯浪費。

這樣推擠忙亂，自然要出人命。教導總隊的參謀劉庸誠通過城門時，「肩相摩，踵相接」已經不足以形容，他是被人前胸貼著後背，兩腳踩不著實地，架出去的。每個人無不爭先恐後，擠成一團，前面倒下，後面踩上；被踩倒的，滾在地上喊爺叫娘；踩倒人的，也不管脚下軟綿綿的是什麼，只是硬踹。這天夜裏，在城門內外被踩死的人就有三、四層高。教導總隊的團長謝承瑞，曾在光華門用汽油火攻城門洞裏的日軍，還帶領敢死隊開城門衝殺血戰。卻因病後體弱，加上作戰灼傷，沒有裹屍沙場，反而在這裏推擠跌倒，也踩死在人堆裏頭了。

所有的人都在竭盡所能，利用想得到的方法出城。教導總隊的排長李慕超有過上海撤退的經驗，要部下緊拉前後列兵的腰皮帶，以免摔倒踩傷；勤務兵唐光譜則是把綁腿帶子解下來，將同行六個人的手臂綁在一起，有誰跌倒了，兩邊的人就把他拉起來；而率領戰車排撤退的何嘉兆，卻是開著戰車硬闖出去；一輛落單的戰車，甚至是雜在潰兵、難民裏頭，從被擠倒、踩死的人身上輾出路的。

淘盡英雄

許多倖存者是到了挹江門外，才發現前途的依然絕望——平日舳舻千里的下關碼頭，這時竟然渺無片帆。原來就在幾天之前，複廓戰鬥剛剛開始的時候，唐生智聽信人言，想來個「背水一戰」，率而下令所有船隻扣留江北，不許軍民人等私自渡江：

各軍所得船隻，一律繳交「運輸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著派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結果撤退這天，分道突圍的命令下得匆促，對於部隊渡江所需的舟楫就沒有安排；而下關一帶，事先也沒有布置，一旦大難臨頭，立即造成混亂。於是這道「扣留船隻」的軍令，竟成了千萬將士的催命符。

傍晚時分，當鈕先銘好不容易偷出城外時，迎接他的，居然是下關的一片火海。這把火也不知是誰放的，卻造成了軍民雜沓的結果，混亂反較城中為甚。同時潰兵、難民大量湧至，船隻既少、人人爭渡，秩序更是蕩然。譚道平出了挹江門，就看到沿江碼頭上，各部隊爲了搶船，任意鳴槍。沒有船的部隊見船就搶，甚至開火互射。槍聲這邊停了，那邊又起。一艘船還沒靠穩，便

有一大堆人往船上跳，冒失的跌入江中，也沒人理會。岸上幾百隻手緊拖著船緣，不讓開駛；船上的人則高聲叫罵，有的又是鳴槍示威。

由於人心慌亂，任何可以渡江的工具都有人搶。剛剛升任黔軍一〇三師師長的戴之奇，在江邊費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一隻木排，卻因為下關地處長江彎曲部內，江水向南沖刷，木排下水後很快就又被沖回碼頭。岸上官兵見狀，紛紛開槍，威脅他們靠岸。可是一靠岸，衆人一擁而上，木排立刻沈沒，於是又有一群人隨著江流漂走了。

混亂到這種地步，使得所有渡船都不敢切實靠岸，否則如此推擠，負荷必然過重，不是搞翻，便是沈沒。三十六師的團長邱維達作戰受傷，昏迷中被人抬到下關。接他的船離岸兩百公尺就遠遠泊著。岸上人山人海，許多人都跳下水朝船邊游去，不會游泳的入水即沈，不然就是被江浪捲走。但攀到船舷邊上的，還是多得幾乎把船弄翻。水手們只好用繩子綁住邱維達的腰，從水裏拖拉上船，才總算離開了這座被血染紅的城市。

爲了搶船，發生過無數悲劇。每艘船都擠滿了人，有的已經離岸數十公尺，還有人不死心，雙手緊攀著船緣，直到把船掀翻而後已。一〇三師的團長萬式炯跟著友軍搭船，潰兵想搶上來的太多，眼看船在下沈，有同歸於盡的危險。押船的軍官於是拿起馬刀，亂砍那些攀船人的手，指頭落入艙中，人已經順流漂走了。

另外，留在南京的戰車連退到下關後，只找到四隻沒有動力的木船，而牽曳用的小火輪卻扣在三十六師的手裏。他們好不容易交涉到其中一艘，正要開航，另一批三十六師的官兵突然趕來，

不讓他們開走。雙方發生爭執，三十六師仗著人多勢衆，把拖繩通通砍斷。載運戰車的木船無槳又無舵，只能隨江飄流。有的擱了淺，有的一直沖到了江陰。一整連從德國買來的十幾輛戰車，就這樣斷送掉了。

搶船之外，更多人是自求多福。所有能夠漂浮的材料，都被拿來渡江：有的拆取窗戶門板、有的砍伐圓木電線桿、有的蹲坐木桶澡盆、甚至有的臥伏在棺材之上。江面上人頭點點，有如野鴨一般。因爲水勢洶湧、不善駕馭，而淪爲波臣者，不知凡幾。

每個過江的人，都有段過江的故事。小砲連長嚴開運拖著「蘇羅通」砲到了江邊，就看到士兵們在狠砍躉船上的鐵鍊，想用浮碼頭過江！一名士兵還竟然騎著水牛，打算這樣泅渡長江。剛下水時，牛還聽話向前游去，可是離岸不到十公尺，就硬著要回頭，士兵則是拼命抽打。他急，牛強，他越急牛越強。終於，士兵被牛拋到江裏去了。嚴自己在江邊找來找去，只找到四隻薰桶，就把桶口朝下，當做浮囊，排在四個角落，用樹枝把它們連在一起，解下綁腿綁牢，做成了一隻小筏。再拿出隨身攜帶的飯碗，權充划槳，就這樣向北划出。

同屬教導總隊的團附彭月翔，經過團上士兵的幫忙，花了五塊錢買來老百姓睡覺用的床架子，一行四人就此出發。因爲負載過重，四個人的下半身都浸在水裏。冬天穿的棉衣，一旦泡水，比鋼盔還重，彭索性把棉衣脫下，甩到江裏，只穿了件單衣，在十二月的長江裏頭飄浮。

也有人嘗試過突圍。八十七師的旅長陳頤鼎來到江邊，就會經企圖組織散兵。然而戰場心理變幻莫測，一群士無鬥志的敗兵和一位毫不相識的官長，是擋不住敵人一陣槍響的。陳頤鼎在衆

人跑散之後，被衛士們拖到江邊，上了一張士兵的床板。可是離開江岸不到五十公尺，床板就開始下沈，陳頤鼎緊抓著一角苦苦掙扎，最後才被擦身而過的一隻蘆葦浮排救起，送到江心裏頭的八卦洲。

這時，日本軍艦已經突破了封鎖線，開到下關江面。他們故意讓艦艇在載浮載沈的人群之中，橫衝直撞、來回逡巡；還用機槍砲火朝泡在水裏、手無寸鐵的軍民掃射。依靠船隻、木排、門板、圓木渡江的國軍，不是被砲火打死、就是被軍艦撞沈。日軍還群聚船舷，鼓掌叫好。宋希濂站在對岸：

哀號呼救之聲，南北兩岸聞之者，莫不嘆傷感泣，真可謂極人世之至慘。

敗軍之將

十三日下午，經過了整夜的磨難，教導總隊參謀劉庸誠在江北上了岸。寒冬的天空灰沈沈的，雲色慘淡，冷風淒切。浦口街上門關戶閉，看不到一個老百姓。僥倖渡過江的散兵潰卒，槍枝刀械、鋼盔彈藥早就丟在逃命推擠的路上，連腰皮帶、綁腿也都拿去紮了木排，個個衣衫襤褸，疲憊憔悴。三五成群，稀稀落落，有如失群的孤雁，默默地低頭趕路。劉庸誠跟著衆人，懷著沈痛的心情，沿著津浦鐵路往北而行。每走個幾十步，就不禁回首看望，想念那些還在城裏的同學以



日軍在南京所虜獲的警察。



十二月十七日，日軍舉行入城式。馬上閱兵的，就是日本「中支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

及戰友們。

走到烏衣，他遇到棄隊先逃的旅長胡啓儒。胡早已到站，不曉得在哪裏吃喝了一頓才過來。兩人去借到一輛裝甲列車，打算回浦口接迎渡江的官兵。結果路上最先迎到的，卻是七十一軍軍長王敬久。王還穿著將官用的黃呢子軍服，外頭罩著青毛嗶嘰的披氈。上車以後，一言不發，只是不斷地抽煙、打瞌睡。撤退會議結束以後，他只通知了手下待命的一部分官兵就走了，沒有再回隊部。

車又走了一程，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和其他幾位司令長官部的參謀都上來了。一伙人齊坐在列車的條椅上，抽著紙煙，談論的，不外是某某軍長、師長是不是過了江。這時日艦已經到了南京，浦口告急，於是俞濟時等人臨時決定將車回駛，改往滁州找唐生智去，不再到浦口接兵，以免危險。

車子回到滁州，已經夜深。車站因為防空，燈火管制，不准張燈，只由衛士用手電筒照明，大家摸黑相認，對面方識。在場的有顧祝同、唐生智、徐源泉、俞濟時、宋希濂等人，率皆苦戰良久，面目黧黑，疲憊不堪。只有唐生智，身披一件黃呢軍大衣，衣領以下幾個扣子都沒扣；頭上戴了一頂紅綠色鴨絨的孩兒睡帽，頂上還有一個彩色毛球的帽結子。上身穿中山裝，下身著絲綿褲，嘴上叨著一支香煙。見面時不斷以俏皮話挖苦人，絲毫沒有打敗仗的愧色。

其實，唐生智在渡江時，也剛經過一番折騰。那時日軍已經進抵江北，浦口一帶的槍聲很密。他乘著預備好的火輪到達浦口上岸，走沒多遠，就遇到伏擊，一行人趕忙改投揚州顧祝同處。唐

的身體本來不好，耐不得走，他的副官想盡辦法，只弄到一輛板車，上面還有牛糞。唐看得皺眉頭：「這輛車如何能坐？」仍舊由衛士扶著走。但走不了幾里路，委實走不動，又問有沒有車？副官的答案，還是只有那輛板車。唐嘆道：「我帶兵二十年，大小百餘戰，從未有今日之狼狽。」無奈，只得上車來到滁州。

正當唐生智在和眾人談讌之際，桂永清到了。原來他也才經歷過一番凶險。離開富貴山指揮所以後，桂在江邊找到自己總隊工兵團紮的一張木筏，向浦口划出。划到半夜，才抵達江北的一片蘆葦岸邊，叢生的蘆葦足有一個人多高，叢外淤積的爛泥既厚且鬆。桂永清不知厲害，一股腦就往下跳。沒想到腳剛著地，馬上就往下陷，而且愈陷愈深。筏上衛士們著了慌，趕忙把綁腿帶子鬆下來結成繩索，丟給桂永清。大家合力拉拔，才算免了他滅頂之災。

就在高級將領們聚首滁州、議論閑談的時候，被留在長江南岸的國軍官兵，卻才要開始面臨生死關頭。他們有的化裝成平民、苦力、乞丐、甚至和尚，潛伏起來，待機脫逃；有的則是交出所有屬於軍人的物品：槍械、彈藥、軍衣、鋼盔，向城裏的「國際安全委員會」請求庇護。逃出來的人，都有他千迴百折的遭遇：孫元良是靠了老百姓領路找船，才脫離虎口；教導總隊的參謀廖耀湘則是由農民趁夜用小船送過江；鈕先銘先逃到廟裏頭，當了幾個月的和尚，再輾轉逃出；邱清泉卻是扮成伙伕，蒙混出城。除了少數的倖免者之外，成千上萬的官兵做了日軍的俘虜，衛戍南京的幾萬大軍，就這樣一陣風吹散了。接下來做為歷史主戲的，就是日軍大規模的劫掠與屠殺了。

第十一章 誘敵東來

上海作戰的損失，對於國軍來說，無疑是一大挫傷。蔣委員長曾經自承，「我們在上海犧牲十九萬人」；但稍後，二十七年十一月，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他又亡羊補牢地說：

如果我們在去年盧溝橋事件發生，敵人侵佔我們平津的時候，……拿我們全部軍隊使用在平津一帶，與敵人爭一日之短長，那我們的主力或許早就被敵人消滅，中華民國也許早就有滅亡的危險！……所以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

這篇〈南嶽會議訓詞〉就成了後來「誘敵東來」說的最初版本。



二十七年十一月，蔣委員長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突出「誘敵東來」的說法。圖為民國三十年十月，蔣在南嶽巡視的情形。



南京戰後，日本陸相杉山元巡視戰場。

官書全面肯定

蔣委員長對於此役這樣肯定的評價，自然影響到日後衆多「官書」的寫作方向。國防部史政局在抗戰勝利後所編撰的正式戰史中評論道：

本（淞滬）會戰，我軍……在正面二百餘、縱深三百餘公里之地域內浴血苦戰四閱月，以爭取第一會戰之勝利。其結果雖傷亡慘重，南京淪陷，然我軍隊戰鬥信心因之增強，全國政權益趨統一，政府抗戰把握更爲堅定，國際觀聽頓爲轉變，且我贏得數月之裕餘時間，將沿海物資向武漢等方面轉運，以充實戰力，而行長期抗戰。

裏頭對於「作戰動機」，記載還算平實，只說這一仗是爲了爭取「第一會戰」的勝利，以及「爲國內民心而戰」、「爲國際輿情而戰」的事實。

但之後，「歷史層累」的現象就越來越嚴重，像滾雪球一樣，許多解釋被追加、附會了上去。民國四十一年，張其昀所著《黨史概要》初版時，「誘敵東來」的理論開始受到強調：

總觀八一三戰役，我軍毅然以主力使用於淞滬方面，因上海乃我經濟重心，中外觀瞻所繫，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強韌作戰。雙方作戰重心，乃由華北移至華中，相持三月以上……。

到了民國五十五年，國防部史政局又出版胡璞玉編著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裏頭更有許多新發明：

……平津失守以後，日寇一面以精銳的部隊沿平漢路南下；一面以海軍陸戰隊從上海進犯。假如這個時候，平漢線的決戰不幸失敗，敵人即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分中國為東西戰場，留著中國沿海的重要物資，分割了中國奮起應戰的戰列部隊。整個抗戰的全局，將會因此支離破碎，喪失了持久消耗的憑藉。

領袖洞察了這可慮的危機，……把主力五十多個師集中到華東，利用湖沼複雜的地形，對國際觀瞻所繫的政略要區——淞滬，主動發起猛烈的攻勢。

這改換作戰正面的大會戰，在吳淞、江灣、瀏河一帶，經過三個月的寸土必爭，迫得敵人將「由北而南」歷史上有利的作戰軸線（如像元朝對南宋的作戰、滿清對明朝的作戰），改變成爲「由東而西」不利的仰攻態勢。這主動攻勢的一戰，使敵人完全追隨了我軍的行動，喪失了主宰戰場的先機……。

其中提出了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直搗武漢的假想作戰軸線，以及國軍誘使「改換作戰正面」的觀念，爲當初蔣委員長〈南嶽會議訓詞〉作了充分的發揮，也爲當時的「造神運動」加上史家的背書。

蔣緯國的解釋

不過「誘敵東來」說的發揚光大，還有待於後人。民國六十四、五年間，當時擔任三軍大學校長的蔣緯國，連續發表了兩篇題爲〈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的文章，闡述其父對於上海戰役的規畫。文中指稱，日軍開戰之初，已經順利侵佔了平津，如果那時繼續沿著平漢鐵路南下武漢，打通平漢及粵漢鐵路，將不僅可以迅速控制中國的心臟地帶，還能夠將整個中國版圖東西遮斷、南北隔離。更重要的是可以將漢口以東，長江下游中國最富庶地區的人力、物力，在西遷之前，全部侵佔，使中國無法持久作戰。

面對日軍這樣的威脅，蔣委員長於是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發動攻擊，迫使日軍追隨國軍行動，變更其作戰軸線成自東向西，改沿長江西上，而放棄了原先由平漢路攻略武漢的有利作戰線。其結果：第一、日軍只能壓迫國軍向西沿著大後方的補給線撤退，無法強迫國軍決戰。「速戰速決」的戰略就此打破。第二、中國黃河以南地區是塊南北窄東西長的空間，日軍由東向西，自然給了國軍較多的空間，來換取較長的時間。第三、由東向西，使得日軍補給線日益困難。第四、作戰線一轉向，日軍就不能先期控制武漢地區，中國可以從容地將東南沿海和長江下游，各重要工業設施，以及技術人員，一併遷往大後方。

相對的，中國也因此：第一、獲得一年以上的時間，將東南沿海的人力、物力向西南轉移，



蔣緯國認為，日軍改沿長江西攻武漢，為中國爭取到十四個月的時間。圖為武漢會戰時期，日軍溯長江攻擊武漢鎮的戰況。



規劃「希利芬計畫」的德國參謀總長希利芬。當副官指給他看山谷朝陽奇景時，他的反應是：「這只是一個不甚重要的障礙物而已。」

建立大後方基地。第二、國軍主力乃能逐次向平漢路以西，及湘、鄂邊境撤退，確保川、陝、湘、黔、滇等省安全。第三、迫使日軍改由上海向漢口前進，經過一千零八十公里的空間，浪費了十四個月的時間。等到攻克徐州以後，日軍主作戰線就不得不沿江西進，愈陷愈深，「速戰速決」的戰略就被打破了。

缺乏可靠史料

蔣緯國不愧是留學德國、並在納粹德軍中實習過兩年的將軍。在這個沿平漢鐵路南下，包圍武漢以東地區的構想裏，洋溢著德國軍人自「希利芬計畫」(The Schlieffen Plan)以來，強調「殲滅戰」(Vernichtungswille)的氣習^①。然而做爲一項歷史的陳述與闡發，就必須植諸史實。歷史的討論不能像兵棋演習，可以純憑假想與推演。所以對於這項說法，我們還是必須回到歷史之中，去搜尋一下，它的真實性究竟何如？

在歷史的現實裏，這種說法所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並沒有什麼史料可以證明，蔣委員長發動上海戰役的動機，是爲了要引誘日軍東來，改變敵人的作戰軸線。

事實上，遍查戰役進行當時，蔣委員長所下達的各項指示、手令、乃至講詞，從未提及「誘敵東來」的想法。最早突出這種說法的，就是〈南嶽會議訓詞〉，但這已是上海作戰結束以後一年的事，不無「事後孔明」之嫌。至於其他史料，時間上都更晚於〈南嶽會議訓詞〉。例如陳誠



日軍正沿「有利作戰線」的平漢鐵路南下，通過被國軍破壞的鐵橋。



在回憶錄中表示，「誘敵東來」是其建議的陳誠。瀝戰時擔任「左翼軍」總指揮。

在回憶錄裏，就說八月二十日他從上海前線視察回來後，曾向委員長建議「擴大滬戰事」：

陳云：「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爲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直赴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戰事以牽制之。」

領袖遂云：「一定打。」

陳又云：「若打，須向上海增兵。」遂發表陳爲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

這裏我們可以發現，擴大滬戰來預防日軍南下，最早是陳誠想出來的。但文中所稱，蔣認同這項構想，卻沒有反映在當時的各類檔案之中。而且陳誠的回憶錄是遲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才由陳自己口述，經其左右記錄整理而成。所以合理的解釋似乎是，陳誠當初向蔣作了這樣的建議，但蔣可能並未措意，直到〈南嶽會議訓詞〉時，才又加以強調，用來合理化自己的決策。

日軍未遑南下

除了「作戰動機」上，令人懷疑它的真實性，「誘敵東來」說在「戰略效果」上，也有值得商榷處。因爲日本在開戰之初，並沒有立即南下武漢的企圖。

日軍當時在兵力的使用上，受到蘇聯相當的牽制。所以對於所謂「支那事變」的處理，正如

蔣緯國自己承認的：

遍查日本文獻，日本參謀本部只有廣義的，也即是一般的戰爭準備，而無針對中國作戰的戰爭準備。

這是因為日軍高層最初只想對中國進行一場局部的有限戰爭，在「不擴大」也不宣戰的原則下，把戰場侷限在平津一隅。一旦目的達成，就停止前進，改用封鎖的手段，迫使中國屈服。所以多數都沒有料到日後竟會陷入泥淖，也就始終不曾認真去規畫一套像「希利芬計畫」那樣，應付全面戰爭的作戰藍圖。了解了這個背景，就不難明瞭，開戰之初，日本軍方是不可能直取武漢，這麼大規模作戰計畫的。

就由於沒有完整的藍圖，所以滬戰前後，東京對於華北作戰的指導，一直是處於「打打看看」的混亂局面：打一個段落了，看看中國有沒有屈服的意思；沒有，再打；然後再看看。前線的軍事行動也像在和中央拉鋸一樣，總是中央先設定「統制線」，要求現地部隊在範圍內捕捉華軍，遂行決戰，同時不准越界，以免戰區擴大。可是華軍採取且戰且走、刻意避免正面對決的退避戰略，又讓日軍的前線指揮官們，得以藉口「不喪失戰機」而「獨斷行動」，擅自追出「統制線」。等到既成事實，再來逼迫莫可奈何的中央加以追認。

因此日軍當時在華北，是呈現一個段落、一個段落前進的態勢，始終無法一氣呵成，大舉南下。蔣緯國自己在文章中也提到：甚至到民國二十七年臺兒莊之役前夕，日本御前會議還限令「華

北方面軍」不得越過膠濟鐵路以南。那就更遑論要在二十六年秋天就直下武漢了。

既然日軍當初就沒有直下武漢的企圖，那麼滬戰又何有「迫誘敵人走向錯誤方向」的效果呢？

洪水擋住了日軍

日軍開始盤算沿平漢鐵路南下武漢，是滬戰以後一年的事。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日，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李宗仁密電蔣委員長，推測日軍未來的動向說：

急。武昌委員長蔣：勞密。據報敵擬分四路會攻武漢，與我作最後決戰，並預計在本年底將戰事結束：

- 一、攻取鄭州，沿平漢路南下。
- 二、由合肥趨安慶，與皖南之敵聯合，沿江西上。
- 三、廈門為根據，突破閩境，與浙江部隊會合，趨南昌。
- 四、由廣東登陸，沿粵漢北上。

其中，「攻取鄭州，沿平漢路南下」被列為第一條可能的路線，說明了前一年的上海作戰，並沒有在戰略上真正影響日軍，放棄這條「有利作戰線」。所謂迫使敵人改變作戰軸線云云，是不符



二十七年六月九日，國軍新八師挖開了花園口黃河堤，洪水迅即四流。日軍十四師團第十五連隊在在洪水中向蘭封推進。圖中央者所持，為其連隊旗，其前一人胸口還掛著戰死者的骨灰。

歷史事實的。

然則，最後是什麼因素迫使日軍改溯長江而上？答案是當時國軍在中原戰場節節失利，鄭州危在旦夕，蔣委員長於是壯士斷腕，搬出了中國最古老的救兵——黃河。就在李宗仁發電給蔣的前一天，六月九日，新八師在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的指揮之下，扒開了花園口河堤，河水隨即氾濫四流。二十二日李宗仁就又報告說：

黃河泛濫後，敵已不能利用隴海鐵路西犯，……至鄭州以西，我憑河防守亦易，逆料敵由平漢線進犯公算較少；且迭據近日情報，連日由隴海路轉移津浦路南下之敵兵車，絡繹不絕，必不外一路溯江西犯，或一路由

浙侵贛之兩途……。

蓋日軍已經預見黃汜將至，所以下令正循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在平漢鐵路以東停止前進，轉向華中，改沿長江進取武漢去了。

所以日軍放棄沿平漢鐵路以攻武漢，其實和上海之役沒什麼關係。真正在關鍵時刻阻止他們南下的，是國軍的「以水代兵」。這招效果之大，甚至促使蔣委員長在稍後遍令陳誠、顧祝同等人，要他們：

一、乘江河湖漲水之期，凡在我軍作戰有利方面，務處處構成泛濫，並望先行後報。

二、江北方面：在宿松以東、江北岸地方，務盡量構成泛濫，以利我軍作戰為要。實行經過，望隨時電告。

三、構成泛濫後，對敵汽艇勿庸顧慮，因較敵陸軍易於擊滅。

「凡在我軍作戰有利方面，務處處構成泛濫」，也可見黃河決堤所帶給他的啓示了。

提前了武漢會戰

蔣緯國對於上海作戰的「戰略效果」，還有一點評價錯了，那就是當初蔣委員長所最擔心的，

正是日軍沿江西上。滬戰值後，南京接踵易手，國府朝野曾經憂心忡忡，怕日軍會沿著長江，一舉直撲武漢。李宗仁這時正在部署徐州會戰，後來他回憶說：

在戰略上說，京、滬戰事一旦結束，津浦線必然是敵人攻擊的次一目標。當時若干新聞記者和一知半解的政論家，都有一錯誤的論斷。他們認為：敵人在京、滬一帶將我軍主力擊破之後，如能長驅直入，一舉而下武漢，則我們抗戰的局面可能就徹底潰敗，而不堪收拾了……。

所以南京失守當天，十二月十三日，蔣委員長就頒布了《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畫》，要求各軍在武漢外圍構築陣地，準備決戰：

國軍以確保武漢為核心，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之目的，……從新構成強韌陣地於湘東、贛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銳兵力，待敵深入，在新陣地與之決戰。

草木皆兵的情況，畢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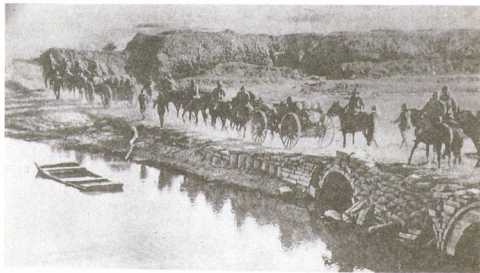
然而日軍並沒有如逆料中，立即發動沿江攻勢，反而是先轉移主力，打通津浦鐵路。所以日後蔣委員長在講演中，還僥倖地說：

從前他（指日軍）攻陷我們南京，本可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而他不敢前進，以致過了三個月後，待我軍整理好了，始來進犯徐州……。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武漢易手。日軍補給船團抵達漢口的情形。

京、滬戰後，日軍沒有直取武漢，反而先攻徐州。圖為日軍第十三師團向徐州進軍中。



「本可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說明了京、滬戰後，國軍搖搖欲墜的窘境。所謂「爭取了十四個月的時間」、「給了國軍較多的空間來換取較長的時間」云云，如果真有其事，也是日軍自己失算，不能說是滬戰的得計。

所以那時負責國軍作戰事宜的劉斐，意見就和蔣緯國完全相反，認為上海作戰期間，蔣委員長先是誤於《九國公約》會議，導致南京保衛戰提前搬上日程：

如果蔣介石在上海會戰後期，不對《九國公約》存有幻想，不改變及時主動撤退的決心，和已下的命令，適時保全實力，主動轉移到「吳福線」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繼續消耗敵人。即使還要從「吳福線」後退時，也可以利用「錫澄線」、及鎮江以西的山地，繼續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戰也不會如此迅速地到來。

接著又堅持死守南京，終於造成武漢會戰的迅速到來：

就是打到南京來了，如果只用少數部隊作象徵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圍，……日軍就不能從南京抽調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會在南京失守後不到半年就過早失守，保衛大武漢的會戰也決不會很快發生。

註
釋

① 「希利芬計畫」是德軍元帥希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 1833-1913)爲了解決一八九一年《法俄協約》出現後，德國所面臨的「兩面作戰」窘境，而在一九〇五年定案的攻法計畫。在計畫中，希氏預定要將部隊集結成強大的右(北)翼，經由荷、比攻入法國、攫取英法海峽各港，再由西向東來個大左轉，在巴黎附近逼迫法軍決戰。蔣緯國這個沿平漢鐵路南下的構想中，日軍到了武漢以後，來個大左轉，逼迫國軍決戰，精神上正與「希利芬計畫」相彷彿。

第十三章 此役何價

除了「誘敵東來」說之外，關於上海作戰的「戰略效果」，還存在著各種說法。張其昀的《黨史概要》就提到：

總觀八一三戰役，我軍毅然以主力使用於淞滬方面，……使我長江下游工廠、物資，得以內運；國際觀感亦為之一新，所獲政略上之成效尤偉。……上海敵我主力三個月之激戰，使在華之敵軍，不能任意行動，造成我華北有利之形勢，尤其使山西之我軍，有準備之裕餘。結果在山西之敵軍，始終不能西越黃河一步，此實為戰略上最大之成功。

綜合其說，大概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項：

- 一、「減輕山西壓力」說。
- 二、「爭取工業內遷」說。
- 三、「增強抗戰決心」說。

四、「喚起國際同情」說。

所以接下來，就要針對這些「效果」（或者稱爲「價值」）進行評估，來檢討它們的真實性和重要性到底幾何？

減輕山西壓力

「減輕山西壓力」之說，是和「誘敵東來」說同時出現的，而且來源似乎都是蔣委員長自己。老報人曹聚仁曾經記載了一段「我們的統帥」的意見：

我們的統帥則認爲：「從上海發動戰事，吸引敵軍到東南沿海來，對於阻擋敵軍從西北深入，有極大作用的。當時，敵軍很可能從山西渡過黃河深入陝甘，循蒙古侵宋的舊路，先犯川康，繼攻黔、滇、桂、湘，再迂迴順長江而下。那樣的情勢，對於持久的抗戰是非常不利的。敵軍戰線延伸到東南沿海，正有阻止其深入的作用。從後果上看，自有其妙用的」。

山西國軍的壓力到底減輕了沒有？答案自然要從日軍調走了多少部隊著手。由表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滬戰期間，日方雖然在東戰場投入了九個師團、兩個支隊，但其中由華北轉用來的，只有後期在金山衛登陸的第六師團和國崎支隊，以及在澆浦口、白茆口登陸的十六師團。而裏頭

表六 東戰場日軍兵力動向表

派遣日	軍	部隊番號	調 動 狀 況	備 註
8.16	上	第三師團	七月二十七日内閣議決使用於上海。	
		十一師團 (欠天谷支隊)	七月二十七日閣議預定使用於青島。八月十二日改派上海。	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調回國復員。
9.1	海	天谷支隊	原為十一師團第十旅團。八月十二日原議派往青島。二十八日任務取消，改派上海。	翌年二月二十六日回國歸建。
9.11	派	第九師團	九月六日參謀總長奏決派往上海，九月十一日正式動員。	
		十三師團		
		一〇一師團		
10.30	軍	重藤支隊	原臺灣守備隊，共步兵五大隊。九月六日奏決派往上海，守衛崇明島機場。	
		十六師團	八月三十日動員華北。十月九日攻下順德，準備進窺德州、濟南，旋轉用上海。	翌年一月十五日調回華北歸建。
10.20	第	第六師團	七月二十七日臨時動員派往華北。十月九日攻佔正定。二十日轉用上海。	
		十八師團	九月十一日動員，原定派往東北警備蘇俄，在北九州待命。十月二十日轉派華中。	
	十	一一四師團	十月十三日動員。旋派上海。	翌年二月十日編入華北方面軍。
		軍	國崎支隊	原屬第五師團。七月二十七日動員華北。九月二十九日支隊派出，旋轉編入第十軍。

* 資料來源：《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一)、(二)



十一月九日，日軍佔領太原。同日，上海開始全面撤退。



日軍進兵山西的決定，下得很晚。圖為十一月八日日軍佔領山西忻縣。

只有國崎支隊（相當於一個旅團）才是真正由位在晉、察、綏邊界的第五師團中抽調東下，第六和十六兩個師團都是從平漢鐵路正面順德、正定一線轉用。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整個行動的過程是國崎支隊的奉調在先（九月二十九日），而第五師團得令攻晉在後（十月一日）。原來，日軍參謀本部到九月底時，都還沒有進攻山西的打算，所以在九月十一日，第五師團攻下大同以後，就想調它回河北，參加保定會戰。結果國崎支隊已經遣出在途了，才又改變主意，決定進攻太原。

因此，從山西作戰一開始，日軍就是以第五師團（欠國崎支隊）為主力，其間並未再有抽調轉用的情事。由此看，則山西方面國軍的壓力，即使有所紓解，程度上也相當有限。到了十一月九日，上海總撤退當天，太原也棄守了。

另外，由表六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南京戰鬥結束之後，日軍南來的各部隊，除了第六師團繼續留在華中外，其餘的國崎支隊和十六師團，都陸續北返歸建。甚至連十一師團和在金山衛登陸的一一四師團，也分別他調。這說明了：儘管日軍高層在京、滬作戰期間，基於決戰的考量，轉用華北駐軍，但戰事一結束，他們就又立刻回到「盡量不分散兵力到華中」的立場，開始著手縮減這一帶的駐軍了。故而所謂「誘致日軍東來」、「迫誘敵人走向錯誤方向」云云，只是浮面的歷史印象，日軍的調動情形完全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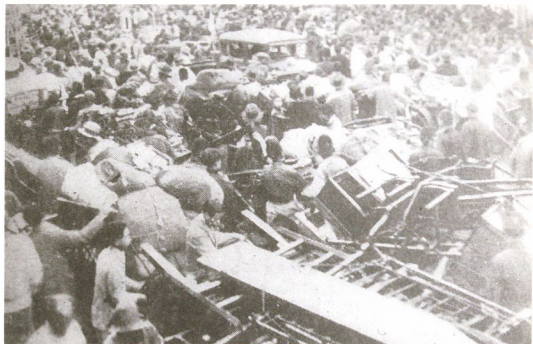
爭取工業內遷

爭取工業內遷，論者常謂：滬戰相持三月，讓上海地區的工廠、物資得到充裕的時間，遷徙到西南後方，為以後的長期抗戰，奠定了基礎。

然而事實上，上海作戰發動之初，國府對於此地工廠的內遷，根本沒有全盤計畫；相持三月，也跟爭取時間無關。行政院主管工業發展的「資源委員會」，一直是到七月二十八日，盧溝橋事變後三個星期，才派出林繼庸等三人到上海，來和工業界洽談辦法。三十日經過一天激烈的辯論，企業家們勉強同意拆遷，林繼庸才又趕回南京，要求中央補助遷廠費用。到了八月九日，「虹橋事件」發生，「資委會」才向行政院提出五十六萬元的補助要求。第二天，行政院會議也才通過拆遷上海工廠的提案，組織「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由林繼庸擔任主任委員，著手進行。這時上海戰事已經迫在眉睫了。

所以如果說滬戰的「作戰動機」真是為了撤退工業，國府的動作是不會這麼慢的。後來武漢棄守前夕，因應抗戰而新組成的「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還曾針對武漢當地工業內遷事宜，致函「資委會」，遺憾地表示：「上海工廠遷移，失之太晚。」

至於在「戰略效果」上，相持三月，是否有助於工廠內遷？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八月十日行政院所通過的拆遷提案，內容就只包含了六類工廠：



國府上海工廠遷移行動失之過遲。圖為滬戰開始之前，民衆紛紛走避租界的情景。



主持戰時上海工廠拆遷工作的林繼庸。

表七 江南各地內遷工廠分布表

地點	工廠總數	地點	工廠總數
上海	135	嘉定	1
南京	12	南通	1
無錫	3	松江	1
常州	1	江蘇	1
總計	155		

* 資料來源：《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頁一四六一—一八九。

一、各機器工廠：其種類為翻砂、打鐵、銜壓、電器及各種五金、機器之屬。其遷移範圍為機器二千部。

二、大鑫鋼鐵工廠：原料二千噸及煉鋼爐三隻。

三、中國煉氣公司：製造氧氣機械之半數。

四、大中華橡膠廠：機器之一部份。

五、康元製罐廠：設備全部。

六、民營化學工業社：全部。

這是由於當初提案，本在希望協助兵工及軍需製造，增加後方生產能力，所以才篩選出這六類工廠，加以補助。此限之外的，就必須經過「資委會」的審核籌劃，才能列入。因此實際由中央主持的拆遷工作，範圍是相當有限的，並不是見廠就搬。

在這麼匆促的時間、這麼有限的範圍之下，拆遷工作的成績自然未可樂觀。根據當時經濟部的正式統計，截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鎮江易手為止，江南一帶總共遷出了一百四十六家工廠。而林繼庸個人增補的資料（表七）則



遷川工廠代表合影。

記載，整個抗戰期間，京、滬一帶陸續內遷的民營廠礦共有一五五家，其中由上海當地遷出者，爲一三五家。

這樣的數字，相較於國民政府實業部二十六年九月底的登記，當時上海符合工廠條件，擁有五十名工人、十匹馬力以上機器者一二七九家，則戰爭期中，上海內遷的工廠數（一三五家），只不過佔了戰前工廠總數（一二七九家）的百分之十點六而已。

如果上海一戰，真是爲了讓當地工業獲得撤退的餘裕，它所爭取到的代價，也該值得商榷了。

遷廠的困難

上海工業內遷不利，原因不一而足。但最基本的，還是國府事先沒有周密的計畫，事後又缺乏妥善的措施所致。當初由於時間緊迫，又爲了

具體起見，「資委會」在提交行政院案子裏，是採取列舉的方式，以機器、化學工廠為重點，申請撥款。殊不料後來時局變化，願意遷移的工廠激增，再想變通擴大，已是經費無著。而行政院原先承諾的五十六萬元，最後也只撥到十五萬元，其餘還得「資委會」自己墊支。

另外，對於願意遷移的廠家，「資委會」也只是津貼一些遷移費，所有拆卸、運輸以及後方安置的工作，都必須廠方自行料理。加上「資委會」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大型廠，遷移費之外，還給予各項貸款，中、小廠則相對忽略^①。使得許多小廠困於資金短絀，即使有意內遷，也無法實現。所以林繼庸在回顧這段往事時，還感嘆著說：

往事不堪回首，假若當時有準備、有計畫，能有一個機關以公平的統制分配運輸工具，及主發通行憑證，則對於我們的工作必可增加許多便利，物資搶救出來的數量也必可大大的增加。

除了政府沒有事先做好準備之外，兵燹的破壞也直接影響到內遷的成績。例如上海戰前，國人自營的機器工廠，就有五百七十家，大多集中在虹口、閘北、南市、浦東，這次剛好都成了戰區。一經開戰，再要搶救就來不及了。尤其地處激戰中心的虹口、閘北，所有工廠幾乎全毀。其他各區也多半不能倖免，連南市一帶都有半數殃及。結果這五百七十家廠商之中，直接燬於砲火的，就達三百六十家，只有六十六家內遷。

第三，工廠內遷，必須面臨許多不確定的變數。諸如安全問題、廠房問題、電力問題、業務

問題、利潤問題等等，無一不使企業家們望之卻步。尤其廠地徵收的問題，格外嚴重。「資委會」在二十六年底所提出的檢討報告就說：

初到之工廠，遷移已近四月，尚不能開工，以致廠家怨嗟，工人憤激，對於政府信用，深抱懷疑。……故徵地復工之事，勢不可緩。上海工廠遷移武漢善後問題久未解決，此其最大癥結也。

此外電力不足也是問題之一。當時全國最大的兩座化學廠，「天利」和「天元」，打算搬到武漢去，「資委會」就評估，電力的供應將無法滿足需求：

查漢口現有發電容量一萬六千瓩，但機器較舊，餘量無多，且其週波數為六十週波，不合上海各廠馬達之用；武昌發電容量僅二、三千瓩，專供電燈之用。故如欲武漢有充分電力供給，必須呈由委座，轉飭「建設委員會」立即設立武昌新電廠，並飭湖北省政府盡力協助。蓋「建設委員會」已有的款，可辦武昌電廠也。

第四，沿途敵機的轟炸，長江、鐵路交通的阻滯，也都構成搬遷的困難。當時的運輸工具，不外火車、輪船、卡車、划子、挑工。戰時火車擁擠，開行無法定時；各車站和機車頭又都是敵機轟炸的目標，風險太大。而火輪方面，江陰要塞已經封鎖，多數船隻都已上駛，要雇也不容易雇到；加上難民麇集，到處搶船，機件也難以上船。

至於卡車載運，當時司機都怕拉差，寧可將汽車零件拆去，閒放在衙堂內；即使出租，也索價甚高，還要擔保。因為貨車一出了租界，就須要特別的「入界照會」才能回來；而且在租界外頭，車輛隨時有被駐軍扣走的危險，所以司機們都不願意出車。最後只能靠少數的划子以及挑夫，先把機器裝上木船，溯蘇州河而上，到鎮江再換江輪。途中裝卸費時，且須頻頻靠岸，以避空襲，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多數人心存僥倖

不過工業內遷所遭遇的最大障礙，還是民衆的苟安心理。身歷其境的林繼庸回憶說：

那時熱心國事的人們高喊着抗日，但是一到局勢緊張，便紛紛的把家眷趕速遷進租界內逃命。……上海——具有偉大吸引魔力的上海租界！一般自號「愛國志士」，且不願離開上海；若想把已有工業根據的企業家，勸他們把工廠從上海遷到內地去，豈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時許多企業家都以爲，這場戰事短期可了。他們看到「一二八」時，上海市區損失不大，就心存僥倖，想說忍受一時不便，將可以免去顛沛的麻煩。所以七月三十日，當林繼庸勸導「同業公會」內遷時，就有人說：「你們年輕人，愛說風涼話，我的工廠，機器、材料共有一、二千噸之多，試問如何搬？」林口乾舌燥地講了一個多鐘頭，對方還是說：「林先生，不要太興奮啊！」

記得「一二八」大戰那時，我們的工廠總共停工還不足十天呢！」

還有一些企業家，戀棧租界做爲護身符，抱持觀望的態度；也有口頭贊成，而始終不搬的。甚至有身爲「遷移工廠委員會」委員，其獨資創辦的工廠，也文風不動的。多數人都是經過苦勸而依然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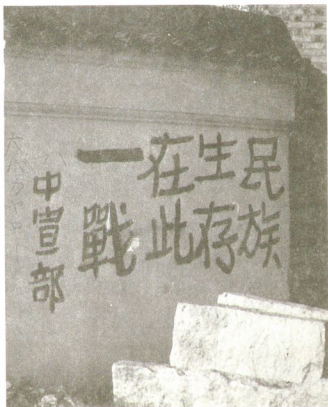
位於火線的上海尚且如此，後方各城的情況自然無可厚望。鑒於上海拆遷工作失之過遲，「資委會」曾特別著意無錫、南通一帶工廠的盡速內移。所以早在九月中旬就派人到蘇州、無錫、常州各地，勸導遷廠疏散。可是各個紗廠的老闆，因爲贏利甚豐，都抱著寧可現在多賺錢、事到臨頭再打算的想法，搬遷作業沒有絲毫進展。等到「國防線」作戰兵敗如山倒之際，再想搶運，「形勢惡化，多未果行」。最後只有無錫「公益鐵工廠」全部、及常州「大成紗廠」的一部分遷出而已。

爲「政略」殉

除了以上幾種解釋之外，關於滬戰的「目的」與「價值」，還有「增強抗戰決心」與「喚起國際同情」等說法。一如前文所強調的：滬戰之所以發動，最初實是爲了爭取緒戰的勝利，而其目的，不外就是要增強國人抗戰的決心。就這點而言，此役的價值，不容否認。因爲上海不只是中國經濟、金融的中心，也是國際性的都市。在平、津相繼失守之後，如果此地再不強韌抗戰，



國軍京、滬地區作戰，受「政略」牽制極大。圖為南京易手之後，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離日返國，留學生送行的情形。



上海的堅決抗戰，有增強民衆抗戰決心的作用。圖為國民黨「中宣部」在蘇州所繪製的「民族生存在此一戰」標語。

則國內外都將失望，國府也難獲諒解。

然而，必須加上「但書」的是：上海作戰的問題，並不是在於戰役的發動上，而是出在「堅持過度」與「撤退過遲」上。這兩點，實是誤於對《九國公約》會議的等待，而非出自「增強抗戰決心」的實際需要。況且這番堅持與遲延，導致後來「國防線」作戰的失利，對於民心士氣反而造成了不小的打擊。這點也是不可不辨的。

至於「喚起國際同情」，本身只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各國因此更加助我。就這點而言，上海之役可以說是為「政略」做了犧牲。雖然當時中國軍人的英勇奮鬥，確實博得了全世界媒體的注意與同情，但在各項援助上，列強卻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國府寄予厚望的《九國公約》會議，最後也不了了之，戰局則隨之糜爛矣。所以京、滬作戰結束後兩個月，民國二十七年二月，陳誠在檢討得失之時，還批評當初「戰略殉了政略」：

政略影響戰略：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目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爭既啓，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得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敗，就是最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惡化。這次戰略受政略的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並不是國家的錯誤，因為我國本身準備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關係。

這段話，足以做為「八一三」上海之役的總論斷了。

註
釋

① 例如八月十日行政院所通過的拆遷專案裏頭，所包含的六類工廠，像大中華橡膠廠、康元製罐廠等，都是當時國內各行業中規模最大的。

附錄一 「京滬地區作戰」參戰部隊一覽表

作者按：關於華軍參戰部隊的番號、師數與人數，衆說紛云。部份原因是由於開戰之初，許多列入戰區序列的部隊，實際擔任的是，杭州灣及浙東側翼的守備工作。這些部隊隨著戰局的發展，後來多數轉移到杭州方面，而始終未曾參與京滬正面的作戰，所以容易產生誤差。

本附錄所列，係作者自行調查的結果。其他如黎東方的〈淞滬會戰〉是估計有七十一個師、七個獨立旅參戰；顧祝同《墨三九自述》則說是五十九個師、八個獨立旅，人數七十餘萬；孫元良回憶錄則載稱八十五個師，共約九十萬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孫、顧兩人的統計都只限於上海參戰的部隊，黎氏則涵蓋國防線作戰。

番號	師長	派系	動員	參戰
一	李鐵軍	中央軍	8·30 徐州↓廣福 由福建調來	9·4 吳淞
三	李玉堂	中央軍	8·22 歸德↓蘇州	10·11 蘆藻濱
六	周鼎	浙軍	8·22 歸德↓蘇州	8·31 吳淞
八	陶峙岳	湘軍	9 中 鳳翔↓南京	9·22 劉家行
九	李延年	中央軍	9 下 衡陽↓南翔	10·5 廣福
十一	彭善	中央軍	8·9 廣東↓保定	8·23 張華濱
十三	萬耀煌	鄂軍	9·25 ↓廣福	10·2 廣福
十四	霍揆彰—陳烈	中央軍	8 初 常德↓宛平	8·25 瀏河鎮
十五	王東原—汪之斌	湘軍	8 下 湘西↓九江	9·12 劉家行
十六	彭位仁—彭松齡	湘軍	9·2 杭州↓龍華	9·15 劉家行
十八	朱耀華		9·19 ↓龍華	10·中 蘆藻濱
十九	李覺		8 中 ↓永嘉海門	10·12 蘆藻濱
二十六	劉雨卿	護國川軍	8 下 貴州	10·17 大場
三十二	王修身	西北軍		9·12 劉家行
三十三	馮興賢	西北軍	10·15 前守江防	10·23 大場
三十六	宋希濂	中央軍	8·13 西安↓上海	8·19 匯山碼頭
四十	劉培緒		10·15 前守江防	11·13 白茆口
四十一	丁治磐	直魯軍徐源泉部	11·29 漢口↓南京	
四十四	陳永	皖系蕭之楚部		9·30 羅店
四十五	戴民權	建國豫軍	9 上 紹興↓南橋	

四十六	戴岳—戴嗣夏	湘軍		11·1	姚家宅
四十八	徐繼武	直魯軍徐源泉部		12·7	烏龍山
五十一	王耀武	中央軍	8·20 南鄭↓安亭	8·25	羅店
五十二	盧興榮	援閩粵軍	8下 浦城↓浙東	10·15	北新涇
五十三	李韞珩	湘軍	10·15 前守江防	10·23	大場
五十五	李崧山	皖系陳調元舊部	8·13 ↓南橋	8·18	掃蕩浦東
五十六	劉和鼎—劉尚志	皖系	8·11 蚌埠↓支塘	8·23	川沙口
五十七	阮肇昌	皖系陳調元舊部	8·13 平湖↓浦東	8·13	浦東
五十八	俞濟時—馮聖法	中央軍	8·28 ↓支塘常熟	9·3	川沙口
五十九	韓漢英—張德能	張發奎粵軍	8·13 ↓蘇浙邊區	9·20	羅店
六十	陳沛	中央軍	9·25 漢口↓廣福	10·5	羅店
六十一	楊步飛—鍾松—劉安祺		8·20 前↓杭州灣	8·27	殷行吳淞
六十二	陶廣? 鍾光仁?—陶柳	湘軍	8·18 ↓海鹽乍浦	11·5	閔里
六十三	陳光中		8·31 ↓平湖海鹽	11·5	金山衛
六十七	李樹森—黃維	中央軍	8·13 漢口↓嘉定	8·25	瀏河鎮
七十六	張鈞—王凌雲	陝軍	10·15 前守江防	10·29	廣福
七十七	羅霖	湘軍	9中 當陽	9·18	劉家行
七十八	李文	中央軍	8·30 歸德	9·2	寶山
七十九	陳安寶	鄂軍	11·5 嘉興↓平湖	11·7	洙涇
八十七	王敬久—沈發藻		8·11 蘇州↓上海	8·13	江灣
八十八	孫元良	中央軍	8·11 無錫↓上海	8·13	北站

番號	長官	派系	動員	參戰
中央軍校教導總隊	桂永清	中央軍	9·28 海州↓南翔	8·23 張華濱
稅警總團	黃杰	葉肇粵軍	9·15 ↓廣福	10·6 蘊藻濱
第六十六軍教導旅				
獨立第十三旅	田鍾毅	劉湘川軍	9·1 四川	9·16 羅店
獨立第十四旅	周紹軒			11·26 泗安
獨立第二十旅	彭霖生？陳勉吾？			11·28 泗安
獨立第三十四旅	羅啟疆	黔軍	8·11 松江↓南翔	8·18 粵東中學
獨立第三十七旅	陳德法	湘軍	8·10 黔東↓南翔	10·11 瀏河口
獨立第四十五旅	張鑾基	舊直魯軍	8·29 寧波↓廣福	9·2 吳淞
			8·11 ↓浦東	11·7 閔行

預備第十一師	胡達	湘軍(原獨立第三十二旅)	11·5 ↓嘉興	10·19 蘊藻濱
一五六	李江	陳濟棠粵軍	11·20 廣州↓江陰	11·23 無錫
一五九	譚遠			
一六〇	葉肇		9·9 ↓鹿鳴涇	9·17 劉家行
一七〇	徐啓明		10初 桂林↓徐州	11·17 南潯鎮
一七一	楊俊昌	桂軍	9下 桂林↓上海	10·18 蘊藻濱
一七二	程樹芬			10·11 蘊藻濱
一七三	賀維珍		9中 廣西↓蘊藻濱	10·15 蘊藻濱
一七四	王贊斌			10·18 蘊藻濱
一七六	區壽年	十九路軍舊部		10·19 蘊藻濱

暫編第十一旅	周安卿	湘軍	8下 上饒↓浙東
暫編第十二旅	李國鈞		8下 宣城↓浙東
暫編第十三旅	楊永清	中央軍	8下 玉山↓浙東
上海保安總團	吉章簡		8·13 吳淞
上海市警察總隊	蔡勁軍? 龍驥?	中央軍	8·13 虬江
上海市保衛團	姜懷素		8·13 吳淞
憲兵部隊	羅友勝	中央軍	南京城門衛戍
副司令	陳烈林		京滬鐵路護路
蕭山令	周競仁	中央軍	12·8 光華門
第二旅	孫生芝		8·13 浦東
砲二旅	邵存誠		8·15 江灣鎮
蔡忠笏	孔慶柱	中央軍	8·15 江灣鎮
砲四團	婁紹鏜		10·9 前
砲八團	彭孟緝		8·11 ↓真茹大場
重砲第十團	彭孟緝	中央軍	8·11 南京↓大場
砲十六團	繆範		8·20 前
砲四十二團	繆範	8下 ↓上海	8·23 寶山川沙

*資料來源：1 《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二、三)

2 《八一三淞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3 《南京保衛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4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

5 韋顯文、支紹曾等編《國民革命軍發展序列》

附錄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一) 史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華文處譯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報》第八期（民國二十六年版），未著出版時間，上海。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機器工業史料組編《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八月，二版二刷，北京。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一三」抗戰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一版一刷，上海。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二編

〈作戰經過〉、第三編〈戰時外交〉，該會印行，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臺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印《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四、十五、十六，〈演講〉，民國七十三年，一版，臺北。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版一刷，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版一刷，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九國公約簽字國布魯塞爾會議期間外交部與各方來往文電選〉，《民國檔案》1989: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抗戰時期工廠內遷史料選輯〉（一、一），《民國檔案》1987:2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南京國民政府大本營關於全面抗戰作戰指導方案等訓令四件〉，《民國檔案》1987: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蘆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軍事機關長官會報第一至三十三次會議記錄〉，《民國檔案》1987:23。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即「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蘆溝橋事變前後的中日外交關係〉，該會印行，民國五十五年七月，臺北。

《申報》，上海書店影印，一九八五年七月，上海。

李巨廉、王斯德編譯《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

一版一刷，上海。

國防部史政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三），民國五十一年六月，臺北。

(二) 回憶錄：

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八一三淞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一版一刷，北京。

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京保衛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版一刷，北京。

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抗戰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版一刷，淮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版，香港。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一），中研院近史所印行，民國七十九年，初版，臺北。

王東原《浮生簡述》，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初版，臺北。

冷欣《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初版，臺北。

沈亦雲《亦雲回憶》，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初版，臺北。

沈怡《沈怡自述》，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初版，臺北。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一版一刷，北京。

阮毅成《八十憶述》，作者自刊、聯經發行，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臺北。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一版，香港。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初版，臺北。

金問泗《從巴黎和會到國聯》，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初版，臺北。

周振強《蔣介石的鐵衛隊——教導總隊》，《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

胡英傑《老兵獨白》，作者自刊，未著出版時地。

重光葵著，徐義宗、邵友保譯《日本之動亂》，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初版，香港。

孫元良《德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作者自刊，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三版，臺北。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自由時代雜誌社，不著出版年份，重排版，臺北。

陳存恭訪問，郭廷以校閱《徐啓明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初版，台北。

陳誠〈陳誠私人回憶資料〉（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民國檔案》1987.1。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版一刷，北京。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初版，台北。

張朋園、林泉訪問，郭廷以、張朋園校閱《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初版，台北。

-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41:15。
- 張發奎〈八一三淞滬戰役回憶〉，《傳記文學》31:3。
- 曾振〈抗戰初期上海作戰記事〉，《戰史叢刊》第五期，中華學術院中華戰史研究協會，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臺北。
- 黃嘉謨、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初版，臺北。
- 程天放《使德回憶錄》，正中書局，民國五十六年十月，臺初版，臺北。
- 程思遠《政海秘辛》，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一版一刷，香港。
- 鈕先銘《還俗記》，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增訂再版，臺北。
- 董昆吾〈虹橋事件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
-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佛之光雜誌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七月，未著版次地點。
- 蔣廷黻口述，謝鍾建譯《蔣廷黻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初版，臺北。
- 蔣夢麟《西潮》，中華日報社，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三版，臺北。
- 劉斐〈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
- 羅卓英〈作戰·訓練餘話〉，收入《羅卓英將軍紀念集》，編者自刊，不著出版時地。
- 顧祝同《墨三九自述》，國防部史政局，民國七十年十二月，臺北。
-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一）、（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初版，北京。

龔傳文《八一三淞滬抗戰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一〇〇輯。

(三) 近人著述：

上官百成編《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七月，臺北。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十年來的中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龍門書店，影印初版，香港。

王成斌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二）、（三），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一版一刷，南昌。

王曾才《西洋現代史》，東華書局，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四版，臺北。

申報年鑑社編《申報年鑑》（民國二十四年版），中國文獻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初版，臺北。

申報年鑑社編《申報年鑑》（民國二十五年版），申報年鑑社發行，民國二十六年，上海。

古屋奎二著，中央日報譯印《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中央日報社，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初版，臺北。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再版，臺北。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綜合月刊社，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初版，臺北。

吳相湘《歷史與人物》，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臺北。

李惠、李昌華、岳思平編《侵華日軍序列沿革》，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一版一刷，北京。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初版，臺北。

於憑遠，羅冷梅編纂，葉霞翟校訂《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臺北。

林石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初期陸軍作戰》（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臺北。

周開慶《四川與對日抗戰》，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一月，初版，臺北。

周開慶《抗戰以前之中日關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台三版，臺北。

胡璞玉編《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國防部史政局，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初版，臺北。

韋顯文、支紹曾等編《國民革命軍發展序列》，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版一刷，北京。

馬宣偉、溫賢美著《川軍出川抗戰紀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一版一刷，成都。

徐志耕《南京大屠殺》，綠洲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初版，香港。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版二刷，香港。

國民大會祕書處編印《第一屆國民大會逝世代表傳略》（一），該會發行，民國六十八年四月，臺北。

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聯合畫報社，民國三十六年，初版，上海。

曹聚仁《蔣百里評傳》，三有圖書文具公司，一九六三年八月，香港。

陳壽恆等編《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初版，臺北。

張其昀《黨史概要》，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初版，臺北。

黃月波、于能模、鮑整人編《中外條約彙編》，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三版，上海。

黃慶秋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國防部史政局，民國五十八年一月，初版，臺北。

越翁譯《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八八，文海出版社，臺北，未著原版出處。

董顯光《蔣總統傳》，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再版，臺北。

楊紀《滬戰秘話》，黎明書局，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漢口。

蔣緯國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五），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初版，臺北。

譚熙鴻編《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中華書局，民國三十七年，上海，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八三，文海出版社，臺北。

（四）論文：

王仁《兩年來的上海經濟動態》，《譯報週刊》310/11，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上海。

王家典《論國民政府抗戰前期的戰略得失》，收入江蘇省歷史學會編《抗日戰爭史事探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版一刷，上海。

辛達謨《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的探討》，收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四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民國七十五年。

- 吳首天〈德國軍事顧問與蔣介石政權〉，《民國檔案》1988:1。
- 吳相湘〈爲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進一解〉，《食貨》（復刊），3:10。
- 孫宅巍〈南京保衛戰雙方兵力的研究〉，收入《抗日戰爭史事探索》。
- 梁錫輝〈外國人對蔣中正先生的推崇——以法肯豪森將軍爲例〉，收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四冊。
- 許介鱗〈從盧溝橋事變論近衛內閣的戰爭責任〉，收入《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上），中研院近史所編印，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台北。
- 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收入《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上）。
- 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史傳〉，《傳記文學》23:3,24:1,25:1,2,3,6,26:5,28:1,30:2,33:6,46:6。
- 黎東方〈淞滬會戰〉（上）、（下），《傳記文學》41:2-3。
- 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五期，中國歷史學會刊印，民國六十二年，臺北。
- 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收入《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上），中研院近史所編印，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台北。
- 蔣緯國〈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7:9，民國六十四年七月。
- 蔣緯國〈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抗日戰爭關鍵性會戰〉，《中央月刊》8:6，民國六十五年四月。
-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民國十七年七月至二十六年四月〉，《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

文》，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中研院近史所印發。

鮑家麟〈列強對中國抗戰的態度〉，《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六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印，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臺北。

二、外文部分

(一) 史料：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註主要文書》，原書房，昭和五十三年二月，初版六刷，東京。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大本營陸軍部》，朝雲新聞社，昭和四十九年十一月，增刷，東京。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一)、(二)，朝雲新聞社，昭和五十年七月，東京。

白井勝美、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九(日中戰爭)(二)，みすず書房，昭和三十九年九月，一版，東京。

(二) 回憶錄：

井本熊男《作戰日誌で綴る支那事變》，芙蓉書房，一九七八年，東京。

石射豬太郎《外交官の一生》，讀賣新聞社，昭和二十五年，東京。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中央公論社，昭和六十一年十月，六版，東京。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六），岩波書店，一九五一年，東京。

Grew, Joseph C., *Ten Years in Japan* (Hammond & Company Limited, London, 1945).

(三) 近人著述：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第十二冊〈日中全面戦争〉，該社印行，昭和五十一年十二月，一刷，東京。

三宅正樹《日獨伊三國同盟の研究》，南窗社，昭和五十年，初版，東京。

日本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會編《外務省の百年》，原書房，昭和五十四年十月，再版，東京。

Martin, Bernd (ed.), *Die deutsche Bert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Dusseldorf, 1981).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1982).

Liu, 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上海南京保衛戰 / 李君山著. --初版. --臺
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7 [民
86]

面；公分. -- (軍事叢書；87)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08-519-9(平裝)

1. 中日戰爭(1937-1945) 2. 八一三事變

628.52

86009160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TEL: (02)396-5698

FAX: (0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戶名：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田文學】

- | | | | |
|-------|-------------|---------------|------|
| L1001 |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 朱天心 著 | 140元 |
| L1002 | 我的帝王生涯 | 蘇童 著 | 150元 |
| L1003 | 相思子花 | 鄭清文 著 | 160元 |
| L1004 | 燃燒之後 | 鍾曉陽 著 | 180元 |
| L1005 | 薩伐旅 | 劉大任 著 | 130元 |
| L1006 | 美國·美國 | 張北海 著 | 140元 |
| L1007 | 下午茶話題 | 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著 | 130元 |
| L1008 | 企鵝爸爸 | 小野 著 | 130元 |
| L1009 | 綠色陷阱 | 葉兆言 著 | 130元 |
| L1010 | 逐鹿中街 | 王安憶 著 | 130元 |
| L1011 | 青春小鳥：王洛賓傳奇 | 吳淡如 著 | 130元 |
| L1012 | 我是你爸爸 | 王朔 著 | 180元 |
| L1013 | 一個朋友在路上 | 蘇童 著 | 150元 |
| L1014 | 後青春期症候群 | 朱衣 著 | 130元 |
| L1015 | 初旅 | 東年 著 | 130元 |
| L1016 | 悲情布拉姆斯 | 雷驥 著 | 130元 |
| L1017 | 少年之城 | 王宣一 著 | 130元 |
| L1018 | 殞逝的英雄 | 葉兆言 著 | 140元 |
| L1019 | 藍色玫瑰 | 林宜濃 著 | 140元 |
| L1020 | 家庭之旅 | 陳黎 著 | 140元 |
| L1021 | 夢的攝影機 | 路寒袖 著 | 130元 |
| L1022 | 戲夢人生：電影分鏡劇本 | 侯孝賢、吳念真、朱天文 著 | 150元 |
| L1023 | 離婚指南 | 蘇童 著 | 140元 |
| L1024 | 走過蛻變的中國 | 劉大任 著 | 120元 |
| L1025 | 南方青春物語 | 童雲 著 | 140元 |
| L1026 | 食妻時代 | 羅位育 著 | 140元 |
| L1027 | 眼耳鼻舌 | 許悔之 著 | 130元 |
| L1028 | 薛理陽大夫 | 張貴興 著 | 130元 |
| L1029 | 斷掌順娘 | 彭小妍 著 | 140元 |
| L1030 | 武則天 | 蘇童 著 | 150元 |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LI031	詩生活	侯吉諒 著	150元
LI032	枕頭邊的音樂會	陳樂融 著	140元
LI033	帶隻杯子出門	喻麗清 著	140元
LI034	公開的情書	路寒袖 編	140元
LI035	是誰在唱歌	林俊穎 著	130元
LI036	光之留顏	羅任玲 著	130元
LI037	滄桑男子	張 錯 著	140元
LI038	活著	余 華 著	150元
LI039	雁行千山	楊 明 著	130元
LI040	X小姐·重新開始	姚一葦 著	130元
LI041	不談愛情	池 莉 著	150元
LI042	可愛的女人	小 野 著	140元
LI043	威尼斯日記	阿 城 著	130元
LI044	多桑：吳念真電影劇本	吳念真 著	150元
LI045	紅房子酒店	葉兆言 著	140元
LI046	十一擊	蘇 童 著	140元
LI047	采集陽光與閒情	劉靜娟 著	140元
LI048	香港情與愛	王安憶 著	130元
LI049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黃碧雲 著	140元
LI050	青銅小子	小 野 著	150元
LI051	輕少女薄皮書	小 野 著	150元
LI052	相思月娘	李 滄 著	140元
LI053	天生好男人	羅位育 著	140元
LI054	刺青時代	蘇 童 著	140元
LI055	風景明信片	路寒袖 編	150元
LI056	航向愛琴海	陳少聰 著	150元
LI057	旅行的顏色	黃雅欽 著	150元
LI058	桃花燦爛	方 方 著	130元
LI059	向日葵海城	楊 明 著	140元
LI060	今夜星光燦爛	葉兆言 著	220元
LI061	天空線下	張北海 著	160元
LI062	好男好女：侯孝賢拍片筆記，分場、分鏡劇本	朱天文 編著	150元
LI063	心事	童 雲 著	150元
LI064	城北地帶	蘇 童 著	190元
LI065	小野之家	小 野 著	150元
LI066	雜貨商的女兒	小 野 著	140元
LI067	把你的腳纏起來	蘇 童 著	160元
LI068	小小撒個野	小 野 著	130元
LI069	花影	葉兆言 著	190元
LI070	太陽哥哥·月亮妹妹	丁 瑰 著	150元

*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L1071	百年孤寂的台灣民主國	羊 恕 著	240元
L1072	長恨歌	王安憶 著	280元
L1073	尋找太平天國	吳念真 著	
L1074	第三代青春症	小 野 著	150元
L1075	寂寞的人收	十 方 著	160元
L1076	婦解現代版才子佳人	孔慧怡 著	150元
L1077	走看法蘭西	愛 亞 著	160元
L1078	我還是原來的我	小 野 著	150元
L1079	台北醫生故事	歐陽林 著	140元
L1080	春天底下三條蟲	小 野 著	140元
L1081	比聯考更無聊的事	李 中 著	140元
L1082	惡魚	林宜潔 著	150元
L1083	貓吃魚的夢	羅位育 著	150元
L1084	貓頭鷹家裏蹲	小 野 著	150元
L1085	台北醫生故事2	歐陽林 著	140元
L1086	醫院X檔案	歐陽林 著	150元

【子敏作品集】

L8001	小太陽	子 敏 著	180元
L8002	和諧人生	子 敏 著	180元
L8003	月光下織錦	子 敏 著	180元
L8004	陌生的引力	子 敏 著	180元

【念真作品】

L8101	台灣念真情之尋找台灣角落	吳念真 著	160元
-------	--------------	-------	------

【小說天地】

N1001	大河戀	Norman Maclean 著	180元
N1002	中國北方來的情人	瑪格麗特·芭哈絲 著	160元
N1003	傑克少年	丹·馬寇 著	140元
N1004	秋之傳奇	吉姆·哈雷遜 著	180元
N1005	小天才智多星	艾倫·奇威貝爾 著	160元
N1006	童年往事(Paddy Clarke Ha Ha Ha)	Roddy Doyle 著	260元
N1007	步步殺機	Arturo Pérez-Reverte 著	260元
N1008	諜海情迷(上)	Thomas Fleming 著	260元
N1009	諜海情迷(下)	Thomas Fleming 著	260元
N1010	西線無戰事	Erich Maria Remarque 著 蔡愷生 譯	180元
N1011	芮尼克探案系列——寂寞芳心	譚 天 譯	180元
N1012	芮尼克探案系列——狂亂人生	譚 天 譯	220元
N1013	芮尼克探案系列——刀鋒邊緣	陳佩君 譯	240元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N1014	芮尼克探案系列——迷蹤記	維亞	譯	240元
N1017	守靈夜的訪客	井上靖	著 劉慕沙	譯 180元
N1018	山國峽恩仇記	菊池寬	著 劉慕沙	譯 180元
N1019	活著的兵士	石川達三	著 劉慕沙	譯 160元
N1020	武士	遠藤周作	著 林水福	譯 260元
N1021	絕命追殺令	J. M. Dillard	著	170元
N1022	吸血鬼	Fred Saberhagen & James V. Hart	著 謝淑玲	譯 200元
N1023	化身博士	Valerie Martin	著 余國芳·王介文	譯 180元
N1031	祖先遊戲	Alex Miller	著 歐陽昱	譯 260元
N1032	塔尼歐斯巨岩	Amin Maalouf	著 吳錫德	譯 240元
N1033	青春的悲愴	Bao Ninh	著 褚士瑩	譯 180元

【日本女性小說】

N1201	寒椿	陳寶蓮	譯	150元
N1202	人偶姊妹	宮尾登美子	著 陳寶蓮	譯 150元
N1203	青燈綺夢(上)	圓地文子	著 陳寶蓮	譯 170元
N1204	青燈綺夢(下)	瀨戶內晴美	著 陳寶蓮	譯 170元
N1205	代嫁公主	有吉佐和子	著 陳寶蓮	譯 190元

【當代小說家】

N3001	花憶前身	朱天文	著	240元
N3002	紀實與虛構	王安憶	著	240元
N3003	遺恨傳奇	鍾曉陽	著	240元
N3004	封閉的島嶼	蘇偉貞	著	240元
N3005	禁書啓示錄	平路	著	220元
N3006	古都	朱天心	著	220元
N3007	天使的糧食	蘇童	著	220元
N3008	許三觀賣血記	余華	著	220元

【麥田人文】

H1001	小說中國	王德威	著	320元
H1002	知識的考掘	米歇·傅柯	著 王德威	譯 350元
H1003	回顧現代	廖炳惠	著	320元
H1004	否定的美學	楊小濱	著	280元
H1005	千古文人俠客夢	陳平原	著	300元
H1006	對話的喧聲	劉康	著	330元
H1007	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張京媛	編	380元
H1008	婦女與中國現代性	周蕾	著	320元
H1009	文化批評與華語電影	鄭樹森	編	340元
H1010	哈佛心影錄	張鳳	著	260元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H1011	重審風月鑑	康正果 著	320元
H1012	現代性的追求	李歐梵 著	460元
H1013	美國詩與中國夢	鍾玲 著	280元
H1014	書寫文學的過去	陳國球等編	380元
H1015	見證的危機	費修珊、勞德瑞 著	劉裘蒂 譯 390元
H1016	戲曲人類學初探	容世誠 著	260元
H1017	否想香港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 著	280元
H1018	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	伊絲貝塔·愛婷爵 著	蘇友貞 譯 190元

【文學叢書】

L9001	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	盧正珩 著	180元
L9002	楊逵及其作品研究	黃惠禎 著	180元
L9003	台灣新文學觀念的萌芽與實踐	莊淑芝 著	180元
L9004	生命情結的反思	林幸謙 著	220元

【大人物】

C1001	李登輝的一千天	周玉焜 著	250元
C1002	蔣方良與蔣經國	周玉焜 著	280元
C1003	誰殺了章亞若	周玉焜 著	150元
C1004	甘迺迪之死(上)	伊斯曼 譯	300元
C1005	甘迺迪之死(下)	伊斯曼 譯	300元
C1006	毛澤東大傳(上)	文林 譯	280元
C1007	毛澤東大傳(下)	文林 譯	280元
C1008	短暫的春秋	師東兵 著	450元
C1009	廬山真面目	師東兵 著	450元
C1010	李登輝和他身邊的人	周玉焜 著	280元

【運動家】

A1001	亞洲巨炮呂明賜	呂明賜、陳錦輝 著	200元
A1002	金臂人黃平洋	黃平洋、陳正益 著	200元
A1003	火車涂鴻欽	涂鴻欽、羅吉甫 著	200元
A1004	鬥魂林仲秋	林仲秋、黃麗華 著	200元
A1005	東方超特急郭泰源	黃承富 著	160元
A1007	空中飛人：麥可·喬丹	Bill Gutman 著	150元
A1008	無法無天：查爾斯·巴克萊	Charles Barkley 著	150元
A1009	點石成金的手指：魔術強生	Earvin "Magic" Johnson 著	150元
A1010	白色守護神：大鳥勒德	Lee Daniel Levine 著	160元
A1011	空中火力：大衛·羅賓遜	Jim Savage 著	150元
A1012	郭李建夫阪神日記	黃承富 著	130元
A1013	完美的籃球機器：天鈞賈霸	Kareem Abdul-Jabbar 著	150元

*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A1014	唐諾看NBA	唐 諾	著	150元
A1015	美式足球觀賞入門	陳國亮	著	130元
A1016	信不信由你：籃球篇1	Bruce Nash and Allan Zullo	著	130元
A1017	信不信由你：籃球篇2	Bruce Nash and Allan Zullo	著	130元
A1018	棒球經	瘦菊子	著	130元
A1019	諾蘭·萊恩 投手聖經	Nolan Ryan & Tom House	著	150元
A1020	棒球王子廖敏雄	廖敏雄、黃麗華	著	150元
A1021	鷹雄 時報鷹球迷手冊	李克、陳偉之編著	著	150元
A1022	洛基 林明佳	黃承富	著	130元
A1023	永恆的飛人：麥可·喬丹自述	Michael Jordan	著	350元
A1024	俠客出擊 歐尼爾自傳	Shaquille O'Neal	著	160元
A1025	世界盃足球大賽	Glen Phillips & Tim Oldham	著	220元
A1026	葉國輝開講棒球	葉國輝	著	150元
A1027	不滅的鬥志 莊勝雄	黃承富	著	150元
A1028	信不信由你：棒球篇1	Bruce Nash and Allan Zullo	著	130元
A1029	信不信由你：棒球篇2	Bruce Nash and Allan Zullo	著	130元
A1030	萬人迷：王光輝	陳芸英	著	170元
A1031	網球場上的百萬女孩	Michael Mewshaw	著	250元
A1032	古田敦也：瀟灑自在的智慧野球	古田敦也	著	180元
A1033	球迷唐諾看球	唐 諾	著	170元
A1034	郭源治：100勝的軌跡	黃承富	著	200元
A1035	強悍而美麗：劉大任運動文學集	劉大任	著	170元
A1036	不奪冠軍誓不回：曲自立談NBA	曲自立	著	170元
A1037	力學棒球：變化球如何投？如何打？	小岩利夫	著	170元
A1038	美式足球趣聞	陳國亮	著	150元
A1039	桑田真澄的獨白	認同桑田是巨人王牌投手的記者群	著	170元
A1040	清原和博的直球對決	永谷 脩	著	200元
A1041	棒球語錄	David Plaut 編著 王希一、唐諾	譯	220元
A1042	巨人軍之謎	椿泰行 著 章蓓蕾	譯	200元
A1043	喬·蒙坦納：我的美式足球生涯	Joe Montana and Bob Raissman 著 陳國亮	譯	200元
A1044	用心看球	陳正益	著	220元
A1045	鈴木一郎：20歲的挑戰	永谷脩 著 黃文君、孫慧敏	譯	200元
A1046	棒球視野：球感vs.筆感	黃承富	著	200元
A1047	落合博滿：勝負的方程式	落合博滿 著 章蓓蕾	譯	200元
A1048	奧運一百年	黃承富	著	200元
A1049	野茂英雄：渡海挑戰的強投	黃承富	著	200元
A1050	奇蹟之子：諾蘭萊恩	Nolan Ryan 著 林大容	譯	220元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軍事叢書】

M1001	身先士卒——史瓦茲柯夫將軍自傳(上)	譚天譯	280元
M1002	身先士卒——史瓦茲柯夫將軍自傳(下)	譚天譯	280元
M1003	飛堡戰紀	譚天譯	320元
M1004	中途島之戰	黃文範譯	280元
M1005	刀鋒飛行	伊斯曼譯	280元
M1006	山本五十六	陳寶蓮譯	280元
M1007	戰車指揮官	譚天譯	300元
M1008	最長的一天	黃文範譯	220元
M1009	奪橋遺恨	黃文範譯	380元
M1010	最後一役	黃文範譯	400元
M1011	希特勒征俄之役	鈕先鍾譯	240元
M1012	圖說偷襲珍珠港	林光餘譯	280元
M1013	少年布希的戰時歲月	林光餘譯	280元
M1014	鷲搏萬里	黃文範譯	320元
M1015	隆美爾傳(上)	譚天譯	260元
M1016	隆美爾傳(下)	譚天譯	260元
M2015	隆美爾傳(套)	譚天譯	520元
M1017	島嶼浴血戰	鈕先鍾譯	390元
M1018	福克蘭戰爭一百天	曾祥穎譯	290元
M1019	十九顆星	蘇維文譯	340元
M1020	二戰紀事	舒孝煌、耿直編著	260元
M1021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	鈕先鍾譯	320元
M1022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二)	鈕先鍾譯	360元
M1023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三)	鈕先鍾譯	320元
M1024	七海雄風	王鼎鈞譯	300元
M1025	長空戰士	王鼎鈞譯	190元
M1026	將軍之戰	林光餘譯	280元
M1027	坦克大決戰	程嘉文譯	280元
M1028	以色列空軍	曾祥穎譯	350元
M1029	超級空中堡壘	林光餘譯	220元
M1030	戰爭心理學	劉麗真譯	160元
M1031	偉大的時刻(上)	黃文範譯	280元
M1032	偉大的時刻(下)	黃文範譯	280元
M1033	美軍特戰奇兵秘辛	章柱譯	260元
M1034	巴頓將軍	譚天譯	280元
M1035	敦克爾克大撤退	張佩傑譯	340元
M1036	圖說諾曼第登陸	揭仲譯	280元
M1037	邱吉爾的將領	王佳煌譯	350元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M1038	海上悍將海爾賽	伊斯曼 譯	450元
M1039	尼米茲傳(上)	許綬南 譯	290元
M1040	尼米茲傳(上)	許綬南 譯	290元
M1041	雷伊泰灣之戰	易 鵬 譯	300元
M1042	F-16戰隼式戰機	張國立 著	250元
M1043	納粹飛鷹	施孝璋 譯	300元
M1044	核能潛艦之父李高佛	黃廣山 譯	390元
M1045	沙漠雄鷹	黎承開 譯	180元
M1046	奇襲	張佩傑 譯	300元
M1047	戰時將帥	黃文範 譯	380元
M1048	美國的軍事革新	蔡仲章 譯	360元
M1049	希特勒的將領	蕭有臨 譯	390元
M1050	台灣航空決戰	鍾 堅 著	340元
M1051	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1(上)	鈕先鍾 譯	300元
M1052	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1(下)	鈕先鍾 譯	300元
M1053	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2(上)	鈕先鍾 譯	280元
M1054	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2(下)	鈕先鍾 譯	280元
M1055	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3(上)	鈕先鍾 譯	320元
M1056	西洋世界軍事史 卷3(下)	鈕先鍾 譯	320元
M1057	裝甲先鋒古德林	施孝璋、王鼎鈞 合譯	270元
M1058	我從戰場歸來	譚 天 譯	390元
M1059	空中決勝	鄭 平 譯	430元
M1060	JG26：第廿六戰鬥機聯隊	李恕平 譯	380元
M1061	突出部之役(上)	許綬南 譯	270元
M1062	突出部之役(下)	許綬南 譯	270元
M1063	孤寂的將領	許綬南 譯	390元
M1064	Me 109戰鬥機	姚卿中 譯	240元
M1065	二十世紀名將評傳	鈕先鍾 譯	380元
M1066	萬里潛航	李宏偉 譯	270元
M1067	圖解世界軍用機史(上)	林大維 譯	300元
M1068	圖解世界軍用機史(下)	林大維 譯	300元
M1069	紐倫堡大審	劉 巍 譯	440元
M1070	隆美爾的北非戰役	張益慎 譯	270元
M1071	希特勒的閃擊戰	滕昕雲 譯	350元
M1072	閃電	王鼎鈞 譯	280元
M1073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顧與省思	鈕先鍾 著	320元
M1074	未來戰爭	許綬南 譯	200元
M1075	Fw190戰鬥機	施孝璋 譯	130元
M1076	零戰的命運	廖為智 譯	380元
M1077	幻象2000戰機	張國立 著	250元

*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M1078	世紀大決戰	曾祥穎	譯	280元
M1079	冬日之戰(上)	李恕平	譯	260元
M1080	冬日之戰(下)	李恕平	譯	260元
M1081	軍艦長門(壹)	滕若榕	譯	280元
M1082	軍艦長門(貳)	涂欽平	譯	280元
M1083	軍艦長門(叁)	蕭志強	譯	280元
M1084	帝國騎士	程嘉文等	譯	360元
M1085	聯合艦隊軍艦大全	陳寶蓮等	譯	?元
M1086	勇往直前	鄭平	譯	360元
M1087	上海南京保衛戰	李君山	著	290元

【戰略思想叢書】

M3001	戰爭藝術	約米尼	著	鈕先鍾	譯	280元
M3002	戰爭論精華	克勞塞維茨	著	鈕先鍾	譯	280元
M3003	戰略論	李德哈特	著	鈕先鍾	譯	480元
M3004	戰爭指導	富勒	著	鈕先鍾	譯	340元
M3005	戰略緒論	湯富爾	著	鈕先鍾	譯	160元
M3006	西方戰略思想史			鈕先鍾	著	450元
M3007	孫子三論			鈕先鍾	著	320元
M3008	歷史與戰略			鈕先鍾	著	260元

【歷史選書】

H3001	阿拉伯的勞倫斯	Jeremy Wilson	著	蔡憫生	譯	420元
H3002	長征	Harrison E. Salisburg	著	文林	譯	400元
H3003	杜魯門(上)	David McCullough	著	王凌霽、劉麗真	譯	400元
H3004	杜魯門(下)	David McCullough	著	王凌霽、劉麗真	譯	400元
H3005	革命與革命者	A.J.P. Taylor	著	李宛蓉	譯	190元
H3006	墨索里尼的帝國	Edwin Hoyt	著	李宛蓉	譯	340元
H3007	卡斯楚(上)	Robert E. Quirk	著	王凌霽	譯	380元
H3008	卡斯楚(下)	Robert E. Quirk	著	王凌霽	譯	380元
H3009	祕密德國	Baigent & Leigh	著	劉世安	譯	340元
H3010	一個騎士在中國	A.S.W. Wingate	著	陳君儀	譯	220元
H3014	極端的年代(上)	E.J. Hobsbawm	著	鄭明萱	譯	380元
H3015	極端的年代(上)	E.J. Hobsbawm	著	鄭明萱	譯	380元
H3016	東京玫瑰	上坂冬子	著	陳寶蓮	譯	170元

【歷史與文化叢書】

H5001	歷史的再思考	K.Jenkins	著	賈士衡	譯	150元
H5002	法國史學革命	Peter Burke	著	江政寬	譯	180元
H5003	製作路易十四	Peter Burke	著	許綬南	譯	300元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推理傑作：艾勒里·昆恩作品系列】

R1001	X的悲劇	唐 諾 譯	220元
R1002	Y的悲劇	許瓊瑩 譯	200元
R1003	Z的悲劇	林大容 譯	180元
R1004	哲瑞·雷恩的最後探案	林淑琴 譯	200元
R1005	希臘棺材的秘密	林淑琴 譯	220元
R1006	暹羅連體人的秘密	許瓊瑩 譯	200元
R1007	紅心四點	溫怡惠 譯	180元
R1008	另一邊的玩家	易萃雯 譯	200元
R1009	法蘭西白粉的秘密	顧效齡 譯	220元
R1010	災難之城	劉育林 譯	220元
R1011	昆恩探案系列	謝德湖 譯	200元
R1012	昆恩再次出擊	謝德湖 譯	200元

*本書目所列書價如與該書版權頁不符，則以該書版權頁定價為準。

100844565

中華民國捌拾柒年伍月卅壹日



作者簡介

李君山，一九六四年生。小時因一幀「火柴盒」小汽車的 T-34 圖片，迷上了「軍火」收集。小六「傾家蕩產」，買了本地第一部飛機圖鑑《戰翼》；國三開始依賴字典，翻譯《珍氏年鑑》；高一負責編寫校刊軍事專欄；大一首度發表「八一三」相關學術文字，後以該主題取得碩士學位。現於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肄業，從事抗戰史研究。

封面設計／

OLIVER CREATIVE DESIGN
& ADVERTISING GROUP

宇田村視覺設計工程

創意統籌／王振宇·視覺結構／吳蕙菁

E-MAIL/Oliver68@ms14.hinet.net

國家圖書館



001625420

上海南京保衛戰



民國 26 年秋天，上百萬國軍向上海集結，為的是參與一場近代以來規模最龐大、戰況最慘烈的會戰。戰鬥的結果，百萬之眾傷亡過半，並在撤退途中演成崩潰，最終以南京的失陷為落幕。

六十年後，作者重新探討斯役的前因後果，揭開抗日戰爭過程中，許多逐漸為人淡忘的真實圖像。謹願讀此書者深思，前人所走過的血跡之路。

ISBN 957-708-519-9 (628.52)



00290



9 789577 085191

M1087

定價:290元

cité 城邦